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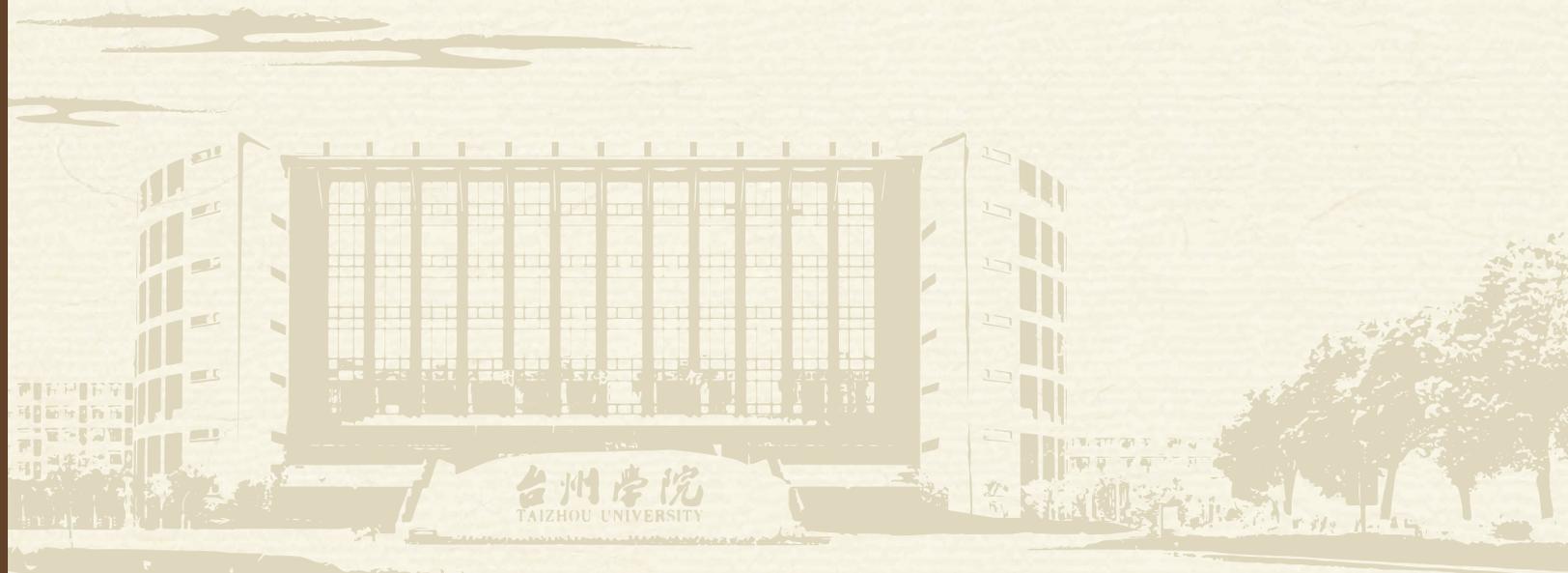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43期 | VOL.46 NO.1



1.2024

TAIZHOU XUEYUAN XUEBAO

台州学院·广文书院

书院简介

广文书院成立于2020年5月，是台州学院首批成立的两个书院之一，院名源于台州文教鼻祖、唐朝广文馆博士郑虔。书院是我校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设富有台州学院特色的“三全育人”学生教育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次探索和创新。



广文书院外景



广文书院启用仪式

书院立足台州地方文化和学校“应用型”办学特色，通过导师引领、通识教育、素质拓展，积极打造“广文课程”“广文讲坛”“广文沙龙”“广文足迹”等特色品牌，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达到思想铸魂、文化凝心、实践育人的



走访仙居籍晚唐诗人项斯故居

培养效果。书院导师为学生在学业发展、职业规划、社会实践、心理辅导等方面提供全天候、全过程、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做到引领有高度、教育有深度、服务有温度。

01

Vol.46 No.1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43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李钧敏
Editor-in-chief Li Junmi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317000
Postcode

网址 www.journal.tzc.edu.cn
The URL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 (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xbb@tzc.edu.cn
E-mail

电话 0576-85137169
Tel.

目次

红楼漫谈

《红楼梦》：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最美小说洪迪 | 01

诗学研究

综合诗学与象征主义乌托邦的建造李国辉 | 10

玫瑰之刺下的呼吸转换

——里尔克与策兰的诗与真郑家欣 | 18

两种“异域”

——论兰波与高更在同代人笔下的相遇王洪羽嘉 | 25

语言

“犬”“豚”辨异

——兼论勾践生育奖励政策中蕴含的性别观叶娇 | 33

新媒体语言中“一言不合就Y”的语义演变及功能解析

.....姜海艳 | 40

由匏到罍：合罍之礼的神圣信仰与礼制内涵张露雨 | 46

小微金融研究

普惠金融视域下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管理的SWOT分析

.....陈力扬, 彭明旭 | 52

教育 教学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改革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

——基于台州学院商学院的改革实践耿慧敏, 景刚 | 60

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及优化进路

——基于A省1642名辅导员的调查冯荣, 姜海燕 | 67

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养成路径思考谢志昂, 陈鸿胜 | 74

禁毒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施路径杨宇琦, 卢俊 | 80

传 播

截屏社交的“刺猬困境”

——聊天记录再传播中隐私边界的游移与重塑戴颖洁, 潘茹雪 | 86

CONTENTS

<i>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Most Beautiful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Combining Tragedy and Epic</i>	Hong Di		01
Symbolist Synthe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topia	Li Guohui		10
To Take a Breath Above the Thorns of the Rose			
— Poetry and Reality in Rilke and Celan's Rose Poems	Zheng Jiabin		18
Two Approaches to the Exotic			
— On the Encounters Between Rimbaud and Gauguin by Contemporaries	Wang Hongyujia		25
Differentiation of "Dog" and "Piglet"			
— Also on the Gender View Contained in Gou Jian's Fertility Reward Policy	Ye Jiao		33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Yiyan buhe jiu Y" in New Media Language	Jiang Haiyan		40
From Gourd to Nuptial Cup: the Sacred Belief and Connota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Wedding Ceremony	Zhang Luyu		46
SWOT Analysis of the Grid Management of Luqiao Rural Commercial B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Finance	Chen Liyang, Peng Mingxu		52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New Business Reform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Business School of Taizhou University	Geng Huimin, Jing Gang		60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ptimization Approach of Career Identity of New College Counselors			
— Based on a Survey of 1,642 New College Counselors in A Province	Feng Rong, Jiang Haiyan		67
Reflec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Xie Zhiang, Chen Hongsheng		74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rug Control Education	Yang Yuqi, Lu Jun		80
The "Hedgehog Dilemma" of Screenshot Social Networking			
—The Migration and Reshaping of Privacy Boundaries in the Secondary Dissemination of Chat Records	Dai Yingjie, Pan Ruxue		86

《红楼梦》：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 于一体的最美小说

洪迪

(台州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红楼梦》属于地久天长的地球村里的全人类。在两个半世纪红内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其现实主义的基底与因情而幻的变形相统一的特创的情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途径,更进而切实评价其为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伟大的最美小说。

关键词:《红楼梦》;情幻现实主义;悲剧;史诗;最美小说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1

《红楼梦》属于地球村,属于地久天长的全人类。

自1754年(乾隆十九年)甲戌本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问世以来,红学、红楼梦研究,发展至今已逾两个半世纪,已成国学中的泱泱显学。然而,倘若我们正视历史与现实,便显见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红内学的成绩远不如红外学;二是《红楼梦》的传播,在国内更年轻的一代,在世界各国,其读者人数几乎与小说的艺术文化价值成反比。为此,不断提高国内外读者的中国文化、语言和小说艺术水平是重要方面,而正确且到位地阐释评价《红楼梦》是一部人类史上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伟大的最美小说,尤为广大红学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赏识与评价的历史演进

第一个评论《红楼梦》者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在小说开卷第一回便有“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

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①紧接着便用“梦”“幻”之笔写道:“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

^① 本文使用的《红楼梦》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若无其他说明,本文使用的《红楼梦》内容,均为该版。

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随后还说:“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本人将此书的缘起、要旨、人物、方式、心思、心血等等,全都坦白交代出来了。第二个当数曹雪芹的绝世知音脂砚斋,她应该是头号大红学家。她在雪芹创作过程中协助誊清,随读随评点。她的精湛评点已另作专文研讨,兹不赘。

1904年(光绪三十年),红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部红学专论,即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此书洋洋17万言,共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余论等五章。他首先论曰:“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且“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1]2-3}。继而说美,“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1]6}于是他论及《红楼梦》本身。他说:“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1]10}但惜春、紫鹃的“解脱”,是“超自然的也,神秘的也”;宝玉的“解脱”,是“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而“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发挥之。我辈之读此书者,宜如何表满足感谢之意哉!”^{[1]11-12}因而他更进一步论述《红楼梦》之美学上的价值。他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1]13};更“可谓悲剧

中之悲剧也”^{[1]15}。他终于断言:“苟如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1]28}

胡适为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自1921年起,他陆续发表关于《红楼梦》考证的论著。他对《红楼梦》有这样的评价:“《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2]98}“《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2]99}“《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2]108}他在论到该书的好处时说:“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地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2]117}他在《答苏雪林书》中说:“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猻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2]278}他在《与高阳书》中则说:“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2]290}不过,他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介绍原藏书人刘铨福时转述了刘的一番跋语:

《红楼梦》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学梵夹书。今则写西法轮齿,仿《考工记》。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戊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秋记。

对此,胡先生算是下了“能欣赏《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一句断语的^{[2]341}。

鲁迅从不以红学家自居,但他在小说史与杂文中关于《红楼梦》的评论非常精到。他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

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350}且“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3]195}。“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束又稍振。”^{[3]195}他又就《红楼梦》分析了文学中的人性与伦理性。“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4]这对于将人写活是极其重要的。他又从人物对话的个性化极赞《红楼梦》。他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都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5]其实就此而言,我们敢说《红楼梦》实乃世界小说之最。鲁迅还从接受美学来说,指出:“《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人,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6]鲁迅先生对贾宝玉的人物评论是全面、深刻而精到的。

毛泽东喜爱《红楼梦》,高度推崇。他说:“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7]竟将《红楼梦》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列,作为中国“骄傲”的资本。

初版于1959年的蒋和森《红楼梦论稿》,如今已成红内学的经典。它的开篇《红楼梦引论》说:“时间——这位最公正的批评家向人们指出:《红

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与伦比的杰作。它对全人类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辉煌而又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贡献。”^{[8]1}“《红楼梦》的最大价值是表现在文学上。离开这一点,就谈不上真正了解《红楼梦》。”^{[8]8}且更指出:“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称《红楼梦》为‘宇宙之大著述’。《红楼梦》确是一部长留天地之间的大书,但它之所以‘大’,并不只是因为表现了王氏所说的‘生活之欲’,而是表现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大就大在这‘人生’二字。”^{[8]38-39}“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红楼梦》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8]39}

冯其庸在《千古文章未尽才》中作了如此评论:“《红楼梦》是一首无韵的《离骚》,也是一部‘说’家之绝唱”“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9]421}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最高综合”^{[9]438}。而且一再重申:“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它精确地反映了我国清代康、乾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特别要指出的是它比欧洲最早的现实主义大师法国的司汤达(1783—1842)、福楼拜(1821—1880)要早出整整一个来世纪,比巴尔扎克(1799—1850)要早出80多年,比俄国的现实主义大师果戈里(1809—1852)和列夫·托尔斯泰(1817—1875)要早出将近一个世纪或更多一点。也就是说,世界文学史上的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文艺的强烈光芒,是由东方的中国遥遥领先地放射出来的。”^{[9]439}

总之,两个半世纪来的红学研究,为我们奠定了全面深入地赏析与评价《红楼梦》的坚实基础。我们的任务是循此阔步前进。

特创的情幻现实主义

鲁迅说《红楼梦》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涵意十分深广。其最要者可说是两点:一是特创的情幻现实主义;二是融悲剧与史诗于小说而自成一统。

“情幻现实主义”一词是我的杜撰。然而这顶帽子对于表征《红楼梦》的创作方法和途径,正好适切而冠冕。我们理解这个词,主要有二元要素:一是现实主义的基底;二是因情而幻的变形。用作者书中的话来说则是:一方面是“至若离合悲欢,

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也就是“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另一方面则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而且“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或者说,“一把辛酸泪”是现实主义实质;“满纸荒唐言”是情幻表现。

现实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将人写活,昭示“活人即典型”的小说艺术真理。曹雪芹的生花妙笔,将人写活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并映比照,概说细描。元、迎、探、惜四春姐妹,状貌、性格、处境、命运,差距甚大,而在相互映照中更显满目琳琅。钗黛是最怵目的对比。一样美貌而风情各异。一样才学超群,而一以学胜,一显才长。说话本领各造其极,而受者的好恶几成天壤。因而钗婚黛死必成宿命。加上天真朗健的憨湘云,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恋着衔玉而生终日一起玩耍的宝哥哥(或宝兄弟);缠上特富于仁爱、爱情、亲情的“情不情”的贾宝玉,于是三角、四角的悲喜剧的纠葛,怎一个“情”字了得!更加上栊翠庵槛外人18岁的带发修行的冷美人妙玉,偏面冷如冰而时被多情的玉石不时撞击而心火暗燃,且三“玉”偏有相赏相亲之共鸣,这一来竟成浓淡恋情的五角星,实在好看煞人也。而怡红院里晴雯、袭人、麝月等几个大丫头,再加紫娟、莺儿等各为其主子助阵。如此,便有晴雯是副黛,袭人是副钗,而晴、袭又相互对立而映衬,直闹到这位“绛洞花主”恨不得“焚花散麝”。好一个重重包围着怡红公子的大观园女儿国,吟诗斗草、争风斗嘴,啼笑成无常之常,香艳乃前生所生。其间有扑蝶、葬花、联诗、制谜、踏雪、啖臙、醉卧、撕扇、结络、补裘、听曲、品茶、寻梅等等,多少风雅香艳的日常细事,在这真善美信的如梦若幻的大观园里生发,于是袅娜于其间的女儿们,自然个个生鲜雅丽,个个“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一个‘这个’”^{[10]673};“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683}。

心理分析是现代小说塑造人物的高级手段。曹雪芹有自己中国式的绝活。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中,当宝钗与众姐妹“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时,她便只身去“叫林姑娘去。在往潇湘馆的路上,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

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毕抽身回来。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举扇,“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她“在亭外听见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听见了小红与另一个丫头在谈手帕子的事,且警觉地要开出窗子来。“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觉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这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接下写“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还说:“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

这段文字真是精练、精彩、精妙极了。作为人物心理分析,它是随着人物行动写,贴着人物性格写。而且一石四鸟,写了宝钗、红玉、坠儿,尤其是不在场的黛玉。它激起红玉赞钗贬黛:“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被完全凭空捏造出对林的因惧而恨,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在宝钗心底里,“金玉良姻”与“木石前盟”是你死我活的零和争斗,绝对的势不两立。她深知,论才、论貌、论亲,她都稍逊一筹;唯家财占压倒优势。她要取胜唯有二术:一以贤惠博取贾府上下的赞赏;二是造谣中伤黛玉。但她不是处处亲近关爱黛玉的吗?难道她日常对黛玉的“好”,都是装好作假吗?非也。在显意识的层面,贤宝钗几乎对人人都好,而对这位绝代佳

人的表妹，更是好上加好。但在她无意识的深层，则近乎本能地待之为死敌。就说这番扑蝶吧，去找黛玉原是无歹意的。但一见宝玉进潇湘馆时，便有了想法，不自觉地想起黛玉的“好弄小性儿”。进而就给她泼脏水了，什么“多有不避嫌之处”，后面联系到红玉，竟近乎“那些奸淫狗盗的人”了。她的折身去扑蝶原属无意，“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亦系偶然。但她为什么要“煞住脚往里细听”呢？不细听不就可以悄悄地走了，什么事都没了？这一“细听”就显露出她平日行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最让人吃惊的是当她判定说话的是“素日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红玉，为避祸使个“金蝉脱壳”，喊声“死丫头，看你往那里跑！”匆匆追赶过去不就完事了？她却偏“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尤其是“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这一句，不就是证死了你俩这背人的私房话，从头至尾全被“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的林姑娘听去了吗？这是十足的凭空捏造、嫁祸他人的卑劣勾当。也许她当时并未细想，但无意识的即兴表演，更足证在她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心底里，无时不在必置黛玉于死地而后快！

就“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这项绝活来说，曹雪芹更在中外古今的大小说家中算得上一等一的了。且举第七十三回中围绕着攒珠累丝金凤展开的充满火药味的一番对话为证。参加“群聊”的先后有绣桔、迎春、王住儿媳妇、司棋、探春、平儿、宝琴、黛玉、宝钗等九人。本来，当事人是迎春和王住儿媳妇两个。迎春是主子小姐又是金凤的失主，但她最是不闻不问的样子；甚至受到“我们供给”“少说些也有三十两了”的污蔑也只当没听见。在最后平儿征求她的处理意见时，正和宝钗阅“感应篇”的迎春道：“问我，我也没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们要问，我可以隐瞒遮饰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瞒不住，我也没法，没有个为他们反欺枉太太们的理，少不得直说。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总不知道。”这位“二木头”心里还是明白的，且自有底线：“不使太太们生气”；又连“偷”字也不说，称作“私自拿去的”。王住儿媳妇简直是个刁奴。她不仅不肯赔补金凤，倒反咬主子姑娘让她多“供给”了“少说些也有三十两了”。又要迎春为她婆婆去讨情，弄得绣

桔跟她争辩，连司棋也来帮腔。更逼得迎春忙道：“罢，罢，罢。你不能拿了金凤来，不必牵三扯四乱嚷。我也不要那凤了。便是太太们问时，我只说丢了。”可巧宝钗、探春等人来看迎春，接着探春又暗使人找了平儿来，谈话的主角便成了探春和平儿。探春先是对着司棋、绣桔和迎春等人说：“我才听见什么‘金凤’，又是什么‘没有钱只和我们奴才要’，谁和奴才要钱了？难道姐姐和奴才要钱了不成？难道姐姐不是和我们一样有月钱的，一样有用度不成？”在司棋、绣桔作了“究竟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的回答后，探春笑道：“姐姐既没有和他要，必定是我们或者和他们要了不成！你叫他进来，我倒要问问他。”迎春阻止道：“这话又可笑。你们又无沾碍，何得带累于他。”探春笑道：“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样，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他说姐姐就是说我……咱们是主子，自然不理论那些钱财小事，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累丝凤因何又夹在里头？”那王住儿媳妇生恐绣桔等告出她来，遂忙进来用话掩饰。探春因笑道：“你们所以糊涂。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求二奶奶，把方才的钱尚未散人的拿出些来赎取了就完了。比不得没闹出来，大家都藏着留脸面；如今既是没了脸，趁此时纵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罚，没有砍两颗头的理。你依我，竟是和二奶奶说去。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探春又道：“我不听见便罢，既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探春说话有两个优点或曰厉害处：一是贵族大家的“礼”字当头，封建社会的合情合理；二是随机改变说话人身份。她既然同迎春是姐妹，且同为主子姑娘，“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是受侵犯的事主；又代犯事人王住儿媳妇着想，如何更有利些；再当个裁判者“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但她深知，刁蛮的王住儿媳妇真要起无赖来，她一个姑娘家到底没奈何。她的撒手锏便是将平儿搬出来。

平儿一来，她便先声夺人：“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涂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们受这样的委屈。”又说：“我且告诉你，若是别人得罪了我，倒还罢了。如今那住儿媳妇和他婆婆仗着是妈妈，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儿，如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饰去赌钱，而且还捏造假账折算，威逼着还要去讨情，和这两个丫头在卧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辖治，所以我看不过，才请你来问一声：还是他原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谁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真正是超

级高明的讼师,探春将被告王住儿媳妇竟换成“你奶奶”内管家王熙凤,案由则由盗窃金凤等扩大成“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这平儿毕竟是“泼辣货”手下的强将,则来个滴水不漏,从容应对。平儿一来便借着住儿媳妇赶着叫:“姑娘坐下,让我说原故请听。”正色道:“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我混插口的礼!你但凡知礼,只该在外头伺候。不叫你进不来的地方,几曾有外头的媳妇子们无故到姑娘们房里来的例。”绣桔道:“你不知道我们这屋里是没礼的,谁爱来就来。”平儿道:“都是你们的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去才是。”于是王住儿媳妇红了脸退出去。平儿说话的守“礼”的分寸感是很强的。说“没有你我混插口的礼”,把自己包括进去了,“我”也是奴才。“打出去然后再回”的是“太太”,真正管家的是“太太”,二奶奶只是受命代管干事。当探春指控二奶奶之后,她便得体地应战,忙赔笑道:“姑娘怎么今日说这话出来?我们奶奶如何当得起!”到底怎么处理金凤事件,她径去征求迎春。把探春压过来的大帽子,轻松闪避过去了。“群聊”中还有旁观者三人。忽见平儿进来,宝琴拍手笑说道:“三姐姐敢是有驱神召将的符术?”黛玉笑道:“这倒不是道家玄术,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谓‘守如处女,脱如狡兔’,出其不备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宝钗便使眼色与二人,令其不可,遂以别话岔开。而当迎春回答了“任凭你们处治,我总不知道”之后,众人都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这一家上下若许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况我哉。”总之,在这番关于金凤的“群聊”中,每个人的性格、身份、才智、关系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活泼。而《红楼梦》的个性化对话与心理分析则为其“活人即典型”的小说艺术真理,立下头等汗马功劳。

融悲剧与史诗于一体的最美小说

鲁迅说得好:“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1]而尼采则说:“悲剧以其形而上的安慰在现象的不断毁灭中指出那生存核心的永生。”^[12]两者都在根本精神上指认悲剧,而且所见略同。亚里士多德则从

另一维度说明悲剧:“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13]²¹更“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3]¹⁵。《红楼梦》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它在艺术精神上乃至在形象、性格、情节、言词上都是悲剧性的。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罕见的。《红楼梦》是四重悲剧的叠合与融合。

第一重是在情幻宿命上的悲剧性。第一回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云云,乃确指这位“空一空”道人正是《红楼梦》或曰《情僧录》的精魄。这“道人”即“情僧”乃是假宝玉,真石头。这“空……空”十六字乃恰红公子一生宿命真传。进而“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的纠缠与争斗,便成宝、黛、钗的悲剧宿命。而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则扩展至五个十二的正钗、副钗、又副钗、三副、四副等六十人的宿命悲剧,人人都有诗画与歌曲,揭示其一生悲苦薄命,而归总为“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第二重是宝玉与诸钗群芳在大观园中真实鲜丽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这是《红楼梦》故事情节中的主体部分,有山石、花草、飞鸟、鸣虫,有诗酒、歌笑、口角、缠绵;而在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及以后,霜天肃杀,草木凋零,死的死,嫁的嫁,遣的遣,遁的遁。到第一〇一回“大观园月夜感幽魂”中,凤姐在往秋爽斋的路上,竟撞见秦可卿的阴魂,吓得逃回去睡觉,又孩子闹,竟说起“明儿我要是死了,剩下这小孽障,还不知怎么样呢!”

第三重是“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宁、荣二府必然败亡的悲剧性。这贾府“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第二回“演说荣国府”中冷子兴说的。第十三回中,秦可卿仙逝时给凤姐托梦中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又说:“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

散’的俗语。”再就是警幻新制《红楼梦》词曲。其结束〔收尾·飞鸟各投林〕云:“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四重是以贾、史、王、薛四大权贵家族为代表的康乾盛世必然没落的封建社会历史的悲剧性。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来看,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以来,经历汉、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至清世祖顺治,已悠悠临近1900年。清王朝康、雍、乾的盛世,实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特别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农耕的封建帝国的大门一被外洋工贸资本主义帝国的铁舰巨炮所轰开,更成雪崩冰解之势,为列强所瓜剖狼吞。一部《红楼梦》正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封建贵族一齐崩塌败亡的鲜活生动景象,征指着2000年中国封建社会终于坠入“食尽鸟飞独存白地”的惨境。总之,《红楼梦》融合着情幻宿命上的、大观园里群芳日常悲欢中的、宁荣贾府“树倒猢狲散”无奈败亡的,与象征着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四重惨境的“悲剧中的悲剧”。

同时,就艺术精神而言,真正的史诗与悲剧则是基本同一的。马克思在评析斐·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时说:“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10]553}但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珂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的唐·吉珂德”^{[10]554}。深刻地揭示:真正的悲剧冲突必深植于历史矛盾与历史规律,必然富于史诗性。文学作品的史诗性与悲剧性在实质上是基本同一的。而亚里士多德亦早已指明,“悲剧具备史诗所有的各种成分”^{[13]105},具体到这部“悲剧中的悲剧”《红楼梦》来说,在它四重合一的悲剧性中,无论大观园里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与贾府“树倒猢狲散”的必然败亡,都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气数已尽,而所谓“因空见色……自色悟空”,只不过是悲剧性的深植于社会历史根源的一种情幻现实主义的梦幻性变形表达而已。

一切文学创作的最大成就与最高境界是美的

创造,是达致“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是成就“美的文学”^{[10]556-558}。纵然《红楼梦》的作者与续作者皆具有自己的文化知识思想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但对于自己笔下的小说,都是苦心孤诣地力求创造出创作方法上的美和创造成品上的美,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作品美与方法美更互为因果,相得益彰,妙不可言。不仅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且更创造了超时空的文学美的永久的魅力。《红楼梦》所创造的小说艺术美,大要可归纳为三美。

一曰人物美。一部《红楼梦》所写到的人物共计975人^{[9]449}。其中写得活生生的圆形典型人物,作粗略点数,情榜上有名的约25人,宁荣贾府及其亲友约15人,共计不下40人。大约略超过《水浒传》。但《红楼梦》所写的典型人物却在人类史上特别真,特别活,尤其是特别美。别说其所赞颂的正面人物,如宝玉、黛玉、晴雯、紫娟等,都是貌美、心美、一颦一笑皆美,连黛玉葬花的歌哭也美得绝伦。宝玉叩别父亲时穿着大红猩猩毡斗篷,确也略损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其视像的画面则是美的。《红楼梦》写人,不仅“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且更对反角也写出其某种美来,而不是单调地去“审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辣子”王熙凤,可算是反角中的女一号了,但她又是个地道的大美人。她聪明透顶,说话随机而风趣,协理宁国府的管家才干令人叹为观止,近于文盲却能脱口吐出“一夜北风紧”这开首好诗句来。让人痛恨得咬牙切齿,而其聪明才干与稍带风骚的美貌,又禁不住令见者不暗生几分倾慕。有人说:“曹雪芹对赵姨娘贾环是一点好印象都没有,写到别人的时候都是比较细,比较立体客观,但一写到他们,一句说得合适的话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动作都没有,他们所有的话语、所有的举止都不成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曹雪芹肯定有过被庶出兄弟或是被姨娘欺负的经验,他写这个并不冷静超脱,而是带着很大的厌恶。”^{[14]248}别的且不说,只是赵姨娘的优点,曹雪芹是写到了的,她的外貌是漂亮的,至少是比王夫人、周姨娘漂亮,所以道貌岸然的贾政在妻妾中最宠爱的是她。她是拥薛斥林的,迫害黛玉致死的角色中,她的作用几乎是最重要的。她的床头风天天吹进贾政的耳朵里,再传进宫里给掌握主要决定权的贾妃元春。相对年轻貌美受宠确

是她的优点、美点,所以这个人物还是有她的真、活、美。刘姥姥虽然是个结构性人物,却更是个真正的圆形典型人物。她的结构性作用,不仅贯串于故事情节的编排上,也深入到人物性格与形象的凸显上。第四十回写她甘当“女篋片”,以被取笑来逗笑贾府上下:

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

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天下还有这样的妙文的吗?一个笑写出如此千姿百态,各各凸显其身份、关系、体质、脾气、性格。独有捉弄者凤姐、鸳鸯不笑,刘姥姥“自己却鼓着腮不语”,准定在心底里偷笑。针对这场笑,王蒙“产生一个想法、一个判断:谁耍谁的猴?”^[14]¹⁰⁴实则双方都以为耍了对方的猴,都以为自己是胜利者。归根是刘姥姥得了实利,大打了一场“抽丰”。这就成了这个老实而世故的老农妇的圆形多面性。这是长期苦难的生活教会她的真聪明。但她的基质是泥土般的厚实农妇,最终还是在巧姐身上报了凤姐的恩。

二曰诗美。主要是寓于日常生活情节中的抒情诗美。《红楼梦》不像中外大多经典小说,着重靠书中大小故事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红楼梦》虽然也讲了大观园万艳同悲、宁荣贾府没奈何的衰颓败亡,却从根本上主要地靠大氛围的浓郁诗性诗美让人着迷、流连忘返。周汝昌先生说:“读《红楼梦》,当然是‘看小说’,但实际更是赏诗。没有诗的眼光与‘心光’,是读不了的。所谓诗……是指全书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诗的,所现之情与境也是诗的。”^[15]这是很有见地、极中肯的。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红楼梦》的诗美,主要是寓于日常生活情节的抒情诗美。当然,书中大量的诗、词、歌、赋,是

其重要的诗美呈现。周先生举到的诸如“粉墙环护,绿柳周垂”“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一日清晓,宝钗春困已醒,拈帷下榻,微觉轻寒。启户视之,见园中土润苔青,原来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只见赤日当空,树阴合地,满耳蝉声,静无人语”“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轩窗寂寞,屏幃翛然。……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得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等等令人满口生香的清词丽句,当然也是其又一类重要的诗美呈现。但我们更认为《红楼梦》的诗美最主要的则是寓于众多日常生活情节中的抒情诗美。书中许多日常生活情节,或交谈或斗嘴,或嬉戏或诗酒,或红白喜事,或死别生离,无论大中小事件情节,皆因其行动鲜活细致,情景交融味永,实质上是一首首参差不齐的散文式抒情诗。长的如秦可卿之死之丧、贾宝玉的挨打、黛玉焚稿与宝钗成礼等各占数回,然“花解语”与“玉生香”则为一回中的两则,而在情趣上又显对比相映。“茶品梅花雪”“病补雀金裘”“醉卧芍药裯”等等皆为诗味盎然的绝妙小品。一部《红楼梦》正是这些长短散文式抒情诗编组成的悲剧性史诗。

三曰文章美。想必天才的曹雪芹曾暗自立志,誓将笔下的长篇小说从卑俗消闲的境地,拾入高雅的文章艺术殿堂。他果真以做大文章的气度与才华,“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成此绝世大块文章。《红楼梦》的文章美,大要有三:一为高度融合的跨文体的体裁美。书中几乎出现了诗、词、歌、赋、柬、笺、谏、故事、笑话、酒令、灯谜、琴操、对联、匾额、偈语、药方等等所有文体,而且既贴切其作者,又各尽其体裁之妙。二为全书谋篇结撰的建构美。对此脂砚斋曾作多方揭示,例如“甲戌本”第一回“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原误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处有[朱眉]曰:“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原误传)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原误不复)少。”^[16]脂砚斋又指出:“《石头记》用截法、岔法、突然法、伏线法、由近渐远法、将繁改简(原作俭)法、重作轻抹法、虚敲实应法,种种诸法,总在人意料之外,且不见一丝牵强。所谓‘信

手拈来无不是’是也。”^[17]在创造建构美时,更设置了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警幻仙姑、甄士隐、贾雨村、冷子兴、刘姥姥、甄宝玉等结构性人物,在通篇大块文章中起到特殊的指示与建构作用。而其中的贾雨村与刘姥姥同时是书中重要角色。三为语言文字美,这更为历来的红学家与广大受众所赞扬。《红楼梦》的语言文字,是最基本的洁净、生动、通而不俗的现代汉语,而且融和了大量的成语、谚语与趣语。而在这体裁美、建构美与语言文字美三者合之中,更统之以气,大胸怀、大智慧、大情感的浩然文气。

结 语

总之,在两个半世纪红学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具体探究了《红楼梦》特创的现实主义的基底与因情而幻的变形相统一的情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途径;更进而体认其将悲剧与史诗与长篇小说三合一的独特艺术创造,从而成就了人类史上伟大的最美小说,永远为地球村全人类所珍爱。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3]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 [4]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64.
- [5]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429.
- [6]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419.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287.
- [8]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9] 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10]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97.
- [12] 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30.
- [13] 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4] 王蒙.王蒙的红楼梦:讲说本[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
- [15] 周汝昌.红楼十二层[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99.
- [16] 曹雪芹,脂砚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82.
- [17] 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57-35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Most Beautiful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Combining Tragedy and Epic

Hong Di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longs to all human beings in the global village. Based on its research for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and meanwhile from the basis of its realism and the unique way of the creation of emotional-illusory realism with the deformation of illusions due to emotions, the novel can be evaluated as the greatest and most beautiful on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combining tragedy and epic in one.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emotional-illusory realism; tragedy; epic; the most beautiful novel

综合诗学与象征主义乌托邦的建造

李国辉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受到瓦格纳美学的影响,以威泽瓦、莫里斯、迪雅尔丹等人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者提出综合诗学的理论,他们主张综合多种文体,以表达整体的生活。综合诗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强调纯粹人性内容是艺术的本源,另一方面探索艺术门类或者文体的居间状态。这种诗学对情感和文体的特性存在误解,是一种虚构的诗学。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综合诗学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象征主义者希望利用综合诗学在多种文体内部建造有一定封闭性的文本结构,达到远离理性和现实内容的目的。综合诗学是象征主义乌托邦的缩影。

关键词:综合诗学;象征主义;乌托邦;纯粹人性内容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2

综合(La Synthèse)是法国象征主义提出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1889年,象征主义理论家莫里斯(Charles Morice)在《近来的文学》(*La Littérature de tout à l'heure*)中系统地总结了这种诗学,而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四年前象征主义杂志《瓦格纳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一篇匿名文章曾指出:“综合(它必定会发生)的时代到来了,完整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时候一定会建立起来。”^[1]在象征主义语境中,综合主要指的是多种不同艺术的结合,这种理念直接的源头其实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瓦格纳在19世纪中期要求艺术“应该与邻近的艺术握手”^[2]。

象征主义小说家亚当(Paul Adam)很早曾认为创造艺术的综合是“象征主义的任务”^[3],可见综合与这个流派的关系重大。当代学者也有人把综合视为象征主义的基石^[4],这说明如果建造象征主义的大厦,牢固的综合诗学是必须要依赖的。这些观点都充分尊重、维持了象征主义者的主张,并最终将综合诗学作为一种事实确定下来。然而对综合诗学进行反思,可以发现这个基石并不“牢固”。本文尝试说明,所谓的综合诗学来自人为营

造的情感危机论,是一种虚构的诗学,它的真正目的在于建造与世隔绝的精神乌托邦。

一、何谓综合?

文艺的综合貌似言简意明,实际上含义复杂。在瓦格纳那里,综合的必要性从戏剧与小说的对立可以看出来。戏剧和小说的对立,既是文体上的,又是时代上的。文体上的对立容易理解,时代上的对立指的是近代文学与古希腊文学的对立。因为古希腊戏剧本身就是综合艺术(综合了舞蹈、音乐和文学),所以综合诗学包含着与文艺复兴相同的复古冲动,以及对当前文艺的怀疑。当然,瓦格纳的关注点并不只在宏观层面,他发现戏剧和小说在情感和表现力上迥然不同:“在戏剧中,一位强健的、完全自我发展的个体丰富了环境,在小说中,环境养成饥饿的、空虚的个体。因而戏剧给我们袒露有机的人类,因为它展示作为种族的本质的个体,而小说则展示了机械的历史,根据这种历史,种族变成个体的要素。因而,戏剧的艺术手

收稿日期:2023-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影子’与法国象征主义大众化转型研究”(22AWW008)

作者简介:李国辉(1979—),男,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诗学、现代主义诗歌。

法是有机的,小说的艺术手法是机械的。”^{[5]172}如果文艺作品要表达强健有力的人物,那么戏剧自然是不二之选。瓦格纳似乎在强调文艺作品的人物形象,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吸引德国音乐家的,是古希腊戏剧洋溢的情感力量,综合诗学的第一个含义就在这里。不论是情节的冲突,还是合唱队的旋律,古希腊戏剧似乎总能表现深沉的、真实的人性,而近代小说、中世纪的基督教音乐却无法做到。综合诗学表面上是一种艺术手法,实际上涉及的是艺术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的“酒神”精神,大体可以概括它。综合诗学要求在新的艺术精神下,恢复“纯粹人性内容”(purly-human content)的力量,而它暗含的先锋性就在这里,因为人性的力量要求有新的适应它的文艺。如果诗、音乐、舞蹈之类的艺术,都在表现人性的力量上获得成功,那么它们的结合将会产生更大的力量。这是综合诗学的第二个含义。综合并不是近代以来的文艺的综合,它们已经丧失了人性的力量。综合第一步是复古,然后才是重新结合。

瓦格纳的理论在象征主义者中得到了响应,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象征主义理论家威泽瓦(Téodor de Wyzewa)。威泽瓦不太关心戏剧和小小说的对立,他注意到瓦格纳偏好用音乐来传达有力的情感,但他更热衷德国音乐家综合各门艺术的学说。威泽瓦表示:“它(瓦格纳的作品)意味着三种艺术形式自然的、必然的联合:造型艺术、文学艺术和音乐艺术,这三种艺术形式共有一个相同的、独特的目的,即创造生活,激发心灵创造生活。”^[6]威泽瓦不像瓦格纳那样强调人性的力量,他的综合诗学承认现实的生活,像小说这种被瓦格纳放逐的文体在他的理论中也有一定地位。但是这可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因为文学本身与音乐以及带有合唱队的古希腊戏剧不同。文学中多种文体的综合,需要考虑语言艺术的特殊情况。当时机成熟时,威泽瓦同样会显露他瓦格纳主义者的姿态,例如他将诗定义为“情感性的音乐”^{[7]162},他赞美马拉美“寻求一种纯粹情感性的诗的理想形式”^{[7]163}。尽管可以利用瓦格纳批评的文艺,威泽瓦理想的艺术仍旧是“纯粹人性”的。

莫里斯的综合诗学与威泽瓦的非常接近。他在大的方向上要求综合:“最近的文学是综合的文学:它梦想着通过所有的艺术启发所有的人”^{[8]269}。既然要利用“所有的艺术”,那么与音乐、诗距离较远的自然主义小说,就是他综合王国的构成部分。

但是在字里行间,莫里斯常常流露出对“纯粹人性”的侧重。他认为音乐比绘画更优越,因为音乐与情感的本源“更为接近”^{[8]281}。在对综合进行形而上学的总结时,莫里斯表明了他与瓦格纳最终的一致,这时他相信“这种向纯粹性的回归,属于所有的艺术”^{[8]355}。拉弗格(Jules Laforgue)是英年早逝的瓦格纳主义者,他像前面两位一样,保留了综合诗学的基本内容,但并不过于强调古今文艺的对立,他看到当时的颓废文学的重要性。他借用瓦格纳的“交响乐”的概念,陈述自己对文艺综合的理解:“不再有孤立的旋律,一切都是一种交响乐,这种交响乐是生动的、变化的生活,就像瓦格纳理论的‘森林的声音’为了森林中宏大的声音在竞争”^[9]。

象征主义者想实现的艺术综合,就技法来看,只是把原本就已经存在的艺术组合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折中的做法,没有什么先锋可言。拿瓦格纳的歌剧来说,它综合的要素,例如舞蹈、歌唱和交响乐,都是已经成熟的艺术,瓦格纳并没有带来新的技法。拿交响乐来说,贝多芬已经做了许多开拓的工作,不用等瓦格纳来革新它。这种思考似是而非。艺术综合并不仅仅是艺术的综合,必须要看到综合诗学带来了新的写作。瓦格纳提出的“纯粹人性内容”,要求对艺术本源进行重构,即恢复人的无意识冲动。象征主义者受到启发,他们的综合诗学主要诉诸无意识写作。威泽瓦推崇“语言音乐”(une musique verbale)。在具体的语境中,“语言音乐”容易被理解为形式的音乐性。“语言音乐”本身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或者说它是一种无形式,它的本源就是无意识的冲动。威泽瓦进而要求把无意识的情感流动引入诗中,让诗的语言和形式都随之而改变。就语言来说,它的语音的部分居于核心地位。这种改变的结果,就是纯诗,它的目的是“想用音乐来清除语言的表意成分”^[10]。在具体的诗作中,是不可能完全有纯诗的,这不是理念的问题,而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因而纯诗的内容就与其余的内容构成了综合,这就是威泽瓦更改瓦格纳的地方。威泽瓦在《瓦格纳文学评论》(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wagnérienne)中提倡将诗的形式与叙述(小说)的形式“融合起来”^{[7]170},诗的形式是主体,叙述的形式是它的辅助、补充。就形式来说,语音原本的秩序将会占据诗律固定的秩序,这产生了自由诗。而自由诗则和格律诗的残留部分构成了综合的诗体。如果撇开表面的差异,直取本

质,自由诗、纯诗和综合诗学互为表里,构成了统一的诗学体系。

拉弗格不像威泽瓦那样是个理论家,但他是无意识写作的杰出实践家。综合诗学在诗歌中的成绩,以他为代表。拉弗格这样总结他的创作:“艺术并不是初学者的修辞作业,它是完整的生活,就像爱情是所有的爱情,它必须还原为无意识,而无意识的发展要离开、蔑视我们的分类法的樊篱。”^[11]488“完整的生活”,就是综合诗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实现它需要无意识的心理力量。拉弗格做到了威泽瓦倡导的纯诗与非纯诗内容的组合,他还在纯诗的部分有更多的探索。无意识的含义在他那里扩大了,可以指本能的冲动,也可以指回忆、即时的感受、印象。这些不同的心理内容交织在一起,给人印象主义绘画、交响乐、回忆录、诗、散文综合在一起的繁富体验。

在小说中实践威泽瓦理想的是迪雅尔丹(Édouard Dujardin)。迪雅尔丹和威泽瓦都是《瓦格纳评论》的撰稿人,他们在角色上有分工,前者是刊物的负责人,也是活动家,后者则是理论家。迪雅尔丹的综合诗学很多是从他的同行那里借来的。迪雅尔丹明白真正诗的内容应该在“无意识的最深处”^[12]。这一部分内容就是诗的内容,但是它还需要非诗内容的辅助,迪雅尔丹用一种独特的名称称呼它——“内心独白”(le monologue intérieur)。它其实就是威泽瓦所说的诗的形式和叙述的形式的综合:“这种构造的诗闪电般地进入散文中,尤其是进入到小说中,这些正是内心独白的深层原理。”^[12]

不同的文体涉及不同的内容,有些与情感有关,有些不是这样。它们为什么可以综合呢?综合的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呢?这里可以尝试用迪雅尔丹提出的“喷涌”(le jaillissement)的概念来解释。喷涌不仅是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原则:非理性的结构方式。作为一种结构方式,喷涌可以打破理性的框架。叙述的、解释的内容,尽管与情感没有关系,只要进入人的意识中,并被编入非理性的思绪中,这也属于喷涌的特征。象征主义者与瓦格纳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象征主义者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叙述的、解释的内容存在,而且给他的内容找到一种非理性的结构。换句话说,要把无意识内心冲动,与无意识思维方式区别开。前者是瓦格纳所说的纯粹人性内容,这种内容不涉及艺术创作。但当艺术家进入艺术创

作阶段后,他就利用非理性思维方式来处理更多的内容,这些内容以纯粹人性内容为主体,也含有叙述的、解释的东西。各门艺术、各种文体变成了这种喷涌的最后的管道。但是在此之前,喷涌的活动早已发生,艺术家的任务并不是对它进行抽象,或者用隔热的材料重新组织它,这是理性的做法。艺术家只需要让这种喷涌的活动进入与它相适的各种管道中,于是它就具有了各种自然的形式。因为不需要人用逻辑分析来预先寻找什么管道,所以喷涌的最后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可以跨越不同的艺术门类或者文体。这些艺术门类或者文体类似于意义模糊的词语,当某种感触无法形容时,人们找不到固定的词语。当某些感触自然而然地流动时,人们也找不到固定的艺术门类或者文体。这带来了艺术门类或者文体的居间状态,综合诗学所指涉的,正是这种居间状态。可以给综合作一个评判了,综合指的是伴随着艺术本源标准的断裂而带来的艺术门类或者文体的居间状态。

二、虚构的综合诗学

综合既然含有对艺术本源标准重构的含义,那么就需要对这种重构进行反思,从而明确综合是一场闹剧,还是真正严肃的艺术活动。按照象征主义者的理解,这种本源就是真实的情感,一种无意识冲动,它容忍在理性程度上较低的叙述的、解释的内容,但它在原则上把理性的、国家的、历史的观念当作它的对立面。这种理论对情感存在重大误解。

首先,综合诗学过度缩小了情感的定义。

无意识冲动确实影响情感,但它只是情感的一种构成力量,情感真正形成还依靠人与现实的接触。也就是说,情感是现实中的情感,它不仅隐藏着无意识心理,更重要的还有意识、理性等心理力量。法国哲学家萨特强调:“情感涉及它指示的东西。它指示的东西是人的实在与世界的关系的整体性。”^[13]这种看法有参考价值。情感是人在现实关系中的情感,脱离了现实,单纯依赖那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情感的贫血症。但这种贫血症,被瓦格纳和后来的象征主义者所渴求。瓦格纳的歌剧偏好神话的题材,例如取材北欧神话故事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神话中的冲突就是人类原欲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乱

伦、仇杀之类的题材。这是最纯粹的内容,它不需要现实生活的材料。象征主义者也有这种倾向。拉弗格的代表作《最后的诗》(*Derniers Vers*)多是意识流式的诗句,迪雅尔丹的《被砍掉的月桂树》(*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则是意识流小说的先驱。意识流小说诞生于象征主义文学不让人感到意外,这是情感简化为无意识后的自然结果。无意识的表现扩大了文学的领域,值得肯定;但认为纯粹的情感就是无意识冲动,舍此之外,就都是无益的抽象概念,这就以偏概全了。

其次,综合诗学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

情感与理性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融合的,理性可以与情感结合,例如“科学精神”;情感也多利用理性,否则情感就容易陷入迷狂。从原理上看,只要感触面向现实,它就会与时间、空间、因果律等理性原则结合起来,就是理性化的情感。这种情感就不是纯粹的无意识冲动,而是社会性的情感。瓦格纳对一切社会的情感怀有敌意,认为它们破坏了“纯粹人性内容”。在讨论声音激发的情感时,他要求“摆脱历史—社会和政府—宗教关系、条件的重负”^{[5]256}。拉弗格的无意识的对立面可以扩大为整个文明,诗人们如果想赢得无意识的力量,就要与整个文明为敌:“文明破坏我们,让我们不再有平衡状态,违反天性。这与我们无关。无意识在它想要的地方自由地吹拂着”^{[11]484}。这种思想自浪漫主义以来在非理性主义思潮中是屡见不鲜的,象征主义者多信仰非理性主义。威泽瓦就是如此,这位理论家相信人们不是通过理性、而是借助直觉来认识世界,他曾回顾道:“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厌恶科学,与其说是因为它虚假,不如说它所谓的知识的无用,它借此困扰了我们的精神。”^[14]

情感与理性对立的变体,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19世纪中叶,非理性主义夸大了时代的危机,认为情感被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和政治话语所窒息,人们正在丧失自我,成为理性的奴隶。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确实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工业革命遇到了好时机,同时工人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也呈星火燎原之势。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一个理性压制情感的悲剧绝对出现了。列文(Miriam R. Levin)在讨论共和派的艺术时,发现第三共和国的官方艺术将情感与理性、经验活动结合在一起^[15],人们在工业艺术品中看到的是这种情感:它是舒适的、秩序井然的,来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安全关系。再来看政治话语,盛行于19

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渴望恢复君主政体,废除国民议会,它似乎与人们内心的情感冲动无关,属于具有高度理性的东西。但事实上,民族主义的倡导者正是出于民族情感建立他们的纲领的。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就是其中重要代表,他将民族性放在血统上,放在对土地和历史的感情上。民族主义要诉诸理性,但它更重要的是面向一种集体的、原始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一定是后天教育形成的,只要人生活在法国,他的父辈们就在他身上生活,“我是他们”^[16]。

最后,除了艺术本源的标准外,综合诗学本身也存有误解。

综合诗学假定存在文艺门类或者文体的居间状态,它具有丰富的可能性,一旦与声音结合,就具体化为旋律,音乐于是产生;一旦与形象结合,就具体化为图像,绘画于是出现;一旦与语音结合,随之产生文学。将不同的艺术类型结合起来,就能还原最初的心灵状态。但是这错解了文体,它把文体视为被动的、完全可塑的材料了,没有看到文体本身具有的独立的地位和规范性。就像在情感与理性的对立中,理性被异化为一种异己的事物一样,在综合诗学中文体被异化,它和无意识冲动形成灵魂与肉体、质料与形式的关系。质料与形式是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一直活跃的思维方式。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提出“第一质料”(materia prima)的概念,认为:“第一质料并不是凭借自身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中,因为它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潜能的存在”^[17]。说质料是“潜能的存在”,是因为它自身无法存在,需要借助本原性的力量。被动的质料遇上本原性的力量,具有形体的事物就产生了。综合诗学将这种中世纪神学思想继承过来:无意识冲动就是最高贵的本原,各种文艺好像是潜在的、处于中间状态的质料,在无意识冲动的决定作用下,并凭借不同的媒介,最终形成有相互关联性的文艺作品。象征主义者没有看到各种文艺具有它独立的规则。它并不是“潜能的存在”,而是事实的存在。这种事实性,体现在规则上,不是体现在具体的形式上。虽然音乐、文学、绘画的规则不同,但是它们都需要有呼应和对照的组织,有一种发展这种组织的理性框架。在音乐中人们可以看到音乐动机的发展,在文学中存在着各种逻辑关系。不同的文艺还有篇幅、长短的要求,传统于是加入到规则的建造中。这些规则并不会轻易随着某位艺术家的内心冲动而改变,它们大体上

是固定不变的。文艺创作的过程是情感、思想与文艺体式的相互调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力量是主宰性的,不同的力量需要相互协调。最终产生的作品,因为经过了多次调整,就是多种意图、思想、情感的混合物。

综合诗学一方面用文艺体式的居间状态替换了文体本身,另一方面又用它的纯粹人性内容替换了现实的情感。情感与其说是变得狭隘了,还不如说变得空洞了。综合诗学抽去了情感原有的此时、此地的属性,让它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代数。就像通过分析的手段,将水等同于氢原子和氧原子的化学公式一样,在这个超越性的公式中,人们难以感受到水的温度和甜度。瓦格纳和象征主义者一再指责政治和宗教破坏了情感冲动,实际上他们才是情感的破坏者。他们用纯粹人性内容建造了真正的牢狱。这样做的原因,在于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新的文化现象:颓废。很多艺术家出于逃避现实,或者畏惧现实,逃遁到艺术中。瓦格纳生活的时代,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受到镇压,国内政治迫害屡见不鲜。而巴黎的象征主义者与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关系紧密,他们对大屠杀记忆犹新。美国历史学家宋(Richard D. Sonn)说:“大多数加入它们(象征主义、后期印象主义等)阵营的年轻人,出生在19世纪60年代,正好成年,他们急切想废除统治性的艺术信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巴黎出生,对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怀有童年的记忆。”^[18]在现实生活绝望后,就要在艺术中寻找寄托。为了保证这种寄托的有效性,象征主义者像他们的先驱波德莱尔一样,必须要开始一种造园运动,即虚构一种纯粹的、理想的乐园。青年学者郭淳在调查瓦格纳美学的社会功能时认为:“他们(瓦格纳与德国浪漫派)都是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宗教权威的瓦解等因素带来的社会整体性丧失的对抗,现实的失落使他们转而在艺术中重现人的完整性。”^[19]这种心理补偿的解释,对象征主义者同样适用。不过,这里“人的完整性”的提法可能仍旧是一种“幌子”。它和纯粹人性内容一样,都是文艺家们建造乌托邦的工具。在实际生活中越是受到压抑,对乐园的纯粹性就越重视。出于不得已的偏激心理,政治、宗教就成为这个乐园的对立面,甚至是它的威胁。因为政治、宗教在象征主义者眼中是个体梦幻的敌人。出于这种乐园的建设,综合诗学精心设计了一场情感危机论的审判。这种审判一旦完成,所谓的理想世界就有望

虚构成功。

综合所要求的艺术本源标准的断裂,并不是自然的、客观的断裂,而是人为发生的。综合所依赖的这个客观条件,实际上是主观设置的,而且也是通过主观想象而满足的。象征主义者是一切的主导者。这种断裂说因而和情感危机论一样都是虚构。事物总要分两方面来看的,虽然象征主义者编造了这个“谎言”,但是还要看到这种“谎言”的内在真实性:它满足了象征主义者对理想世界的虚构,解决了因为革命遇挫或者工业进步而撕裂的社会中某些阶层的心理寄托问题。于是艺术本源标准的断裂发生了,尽管发生地不是在实际的社会,而是在一些艺术家的主观思想中。从某种内在的视角来看,综合诗学有一定必然性,它成立的条件部分具备了;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果综合诗学是为了满足理想世界的虚构,那么艺术的综合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

三、文体与乌托邦

不少象征主义诗人虚构过精神的乌托邦。波德莱尔在他的散文诗中描述了一个未知的国度,它的周围笼罩着“北方的浓雾”,诗人梦想着和一位女友在那里“放飞这么多热切、放任的幻想”^[20]。在作品中想象一个异域的空间比较常见,象征主义者们完全可以利用想象力满足自己的目的,一般而言,文体主要是承载内容的框架,不涉及具体的内容,与乌托邦没有直接关系。对于象征主义文学家来说,文体的综合凭什么成为建造乌托邦的必要条件?

如果艺术家已经拥有了他所虚构的乌托邦,也就是说,他已经找到了纯粹人性的心理内容,下一步就要喷涌,即具体化,形成艺术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哪怕它有多么纯粹,都不免要形成某种态度,产生某种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纯粹人性内容完全是抽离现实处境之后的感触,这种感触只要具体化,就要产生文体的基质。艺术理论家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认为装饰的基本材料是“传到我们手上的装饰图的原始元素(les éléments primordiaux)”^[21]。就装饰艺术而言,原始要素是摆脱现实的、理性的内容东西:象征主义文体的基质和装饰艺术中的原始要

素因而具有相同的存在状态。这里借用维尔德的概念将这种基质也称为原始要素。

原始要素是片段性的,还未经过理性的加工、调整,还未成为真正的文体、具有理性的结构。原始要素是中性的,象征主义者寻求的文体的居间状态,其实是心理内容的片段化。如果这些片段含有连续的情思,那么它就有成为散文的可能,可以称之为散文的原始要素。如果它含有断裂的情思,那么它就有成为诗歌的可能,可以称之为诗歌的原始要素。如果它以连续的声音为主,那么它就有成为音乐的可能,可以称之为音乐的原始要素。如果它以固定的形象为主,那么它就有成为绘画的可能,可以称之为绘画的原始要素。这四种原始要素只是常见的代表,还存在雕塑的原始要素、舞蹈的原始要素等,这里不再详细分类,只用这四个代表来分析综合诗学。

这四种原始要素一旦与理性结合起来,最终的文体就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它们分别产生散文、诗歌、音乐、绘画。从四种原始要素到最终的文体,一方面是纯粹人性的弱化,另一方面则是理性的加强。在最终的作品中,纯粹人性内容可能仍旧存在,但它只是隐藏在里面,就像盐分隐藏在冰里面一样。现在理性来处理这些冰块,让它们形成理性可以处理的结构。纯粹人性内容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它第一步不得不把自己交给原始要素,第二步又不得不把自己交给理性的结构。而现实的一切理性的观念,都会通过这些内容与纯粹人性内容结合。纯粹人性就像是不得不袒露自己的海贝,现实的内容就像它的天敌一样,通过打开的贝壳伤害它、破坏它。

象征主义者们必须要保护他们的纯粹人性内容,不想让理想的、纯粹的世界受到现实的干扰。可是,中间层的原始要素,最后层的理性结构是他们必须要利用的。如果拒绝了它们,那么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艺术家可以安稳地在他的阁楼沉醉于梦幻之中,只要他愿意,没有现实的力量能够扰乱他的清梦;可是他如果想形成作品,他就不得不利用那些让他不安的东西。那么,能否出现这种可能呢?即让作品只表示纯粹感触性的内容,尽量减少理性分析。就像避免现实的摹写,只用纯粹的颜色来画画一样。虽然任何一种颜色都可以在绘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没有人会用一种颜色(没有区别的一种颜色)来画画。读者也不会接受这种绘画。绘画如果要想有意义,就必须在象征画家主观

情感的颜色之外,用其他的颜色以及线条来给它解释。拿梵·高的《星空》来说,哪怕那黄色的星光,那梦幻的、遥远的情感是画家真正醉心的,但是他必须要使用深绿色(植物)、黑色(山岳)、灰色(房屋)来解释那种无限的情感,来给它打上某种人间的、现实的色彩。

如果把感触与现实性的内容进行结合,并生成具体的作品的过程,称为“纵向实现”(这是从内心向现实世界的纵向发展),那么纯粹人性内容似乎无法避免这种“纵向实现”。只要纯粹人性内容面向观众,它就必须完成这种纵向实现。但有没有一种方法尽量减少这种纵向实现,让纯粹人性内容向其他方向发展呢?也就是说利用原始要素,但尽量减少现实语境的成分。如果艺术家不能使用一种颜色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么他能否使用多种颜色,而且还不让它含有过多现实的气息呢?这就是装饰性的艺术,上文引用维尔德的理论用意也在这里。美国学者辛普森(Juliet Simpson)指出:“装饰的综合,是象征主义美学理论的深层问题。”^[22]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性。可以借助它作更进一步的判断。象征主义者使用装饰艺术的形式,来避免纵向实现。这一方法可以通过塞尚的画作《加尔达纳》(*Gardanne*)来说明。画作仍旧有现实的因素,但是已减至最少,画面上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绿色(植物)、浅黄色(院墙)和淡红色(屋顶)。它们代表了内心温馨、宁静、喜悦的感触。这种通过不同的中间层媒介来建立一种文本结构,减弱最终层的解释内容的做法,可以称为“横向实现”。它是通过内心的不同状态与中间层媒介的契合来创作作品。

纯粹人性的横向实现,其特点在于在保留一定的解释的语境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中性的原始要素,一方面具有艺术作品的本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象征主义者寻求的封闭世界。纯粹人性内容看到了一些异质性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像镜子一样,映照的是它自己的光影。纯粹人性内容所在的内在世界扩大了,有了现实的边界,但同时这种边界更有力地守住了那原本脆弱的内在世界。

所谓艺术的综合,并非完全体的多种艺术门类或者文体的综合,而只是半成品的原始要素的组织。威泽瓦最早提出将不同的文体在作品中综合起来,例如小说与诗,但真正发生综合的,并不是小说与诗,而是还未固定为特定文体的材料。综

合的并不是最终的文体,而是类似文体的内容,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四种原始要素。但是它们与通常意义的诗和小说不同,具有跨文体(文体不明确)的特征。迪雅尔丹的《颂扬安东尼娅》(*A La Gloire d'Antonia*)就是一次可贵的尝试。作品的框架是小说,但是中心内容则是诗的内容,是意识的流动。不论是内心独白(类诗)的部分,还是类小说的部分,现实的内容都被小心地提防。作品看上去是完整的,但就像塞尚的画作一样,具有相对独立的世界。这里可以引用一段原文:“周围是美好的平静;半明半暗;音乐重新在远处响起;阴影在爬动着;空气温和;她把头转向我;她的眼睛看着我;她对着我笑;苍白、纯真,特别温存,她对着我笑……”^{[23]93}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为了让语言一直与感受结合,同时避免语言将解释的语境带到作品中、并取代感受,作品使用了大量的碎片式的句子,它们是断裂的,可以归在诗歌的原始要素下。但是作品中还存在连续性的情思,例如下面一句:“在一个小时的寂静中,某个人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女性的名字;我听到了这个名字,我听到了您的名字。”^{[23]81}这属于散文的原始要素。它们都在一个作品中,形成了局部的综合。作品中所有这些不同的原始要素的结合,于是产生了整体上的文体的居间状态的综合。

所谓艺术的综合,并不是真正完成体的作品的综合,而是半完成体的中间层的组合。象征主义者通过将半完成体的语言、符号组织与文体进行类比,从而建立了一种感受的结构。这种结构无法完全被逻辑的结构所改变,虽然在具体的作品中,逻辑的结构是多久会存在的。中间层的感受结构,就能给象征主义者提供一个把作品与现实和理性隔开的半独立空间。

如果说波德莱尔、雷泰等人想象的梦幻的北方,是内容上的乌托邦,那么综合诗学则是那种乌托邦在文体上的缩影。象征主义者利用装饰的模式,将不同的类似文体(多为诗与小说,或者散文与诗)组合起来,形成了有一定封闭性的文本结构。因为这种文本结构很大程度上拒绝意义,它在情感上具有同质性,因而这种文本结构也可理解为向情感开放的、透明的内在空间。他们设想这种空间是纯粹的艺术,是不朽的杰作;这个空间之外的现实,则是短暂的、嘈杂的、令人不安的。这个内在空间是可塑的,与艺术家、文学家的情感是相感应的;而那个外在的、坚实的现实空间,则是陌生

的、异质性的。

结 语

象征主义者的综合诗学并没有真正产生多少不朽的作品。迪雅尔丹的《被砍掉的月桂树》和《颂扬安东尼娅》都是平庸之作;威泽瓦带来了综合的理论,却基本没有付诸实践;吉尔(René Ghil)的语言配器法以失败告终;可能例外的是拉弗格,他的《最后的诗》给象征主义带来了一些荣光。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排斥理性和意义,综合诗学只能造成装饰性的艺术,而无法让思想的光芒真正点燃作品,并在读者的心中燃烧。从文学作品层面看,综合诗学是失败的;但是从文化史的层面看,这种诗学又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综合诗学建立文体间的封闭结构的做法,和通感诗学、纯诗理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是同一种情感本原的关切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异枝而同根的。这三种诗学的目的不在异域的乌托邦上,而在感受、情感的乌托邦上。但综合诗学与后二者相比,要更为隐晦、费解一些,它对文体综合提出的新要求,涉及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对20世纪的跨文体写作和意识流的探索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 [1] ANONYME. Richard Wagner et Victor Hugo [J]. *Revue Wagnérienne*, 1885, 1(5): 130.
- [2] WAGNER R. Une lettre sur la musique [M] // WAGNER R. *Quatre poèmes d'opéras*. Paris: Librairie Nouvelle, 1861: xx.
- [3] ADAM P. M. Paul Adam [M] // HURET J. *Enquête sur l'évolution littéraire*. Paris: José Corti, 1999: 89.
- [4] OPIELA-MROZIK A. Teodor de wyzewa face à ses maîtres [J]. *Quêtes Littéraires*, 2019(9): 77-89.
- [5] WAGNER R. Opera and drama [M] // WAGNER R. *Richard Wagner's prose works: Vol. 2*.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1900.
- [6] WYZEWA. Peinture wagnérienne [J]. *Revue Wagnérienne*, 1885, 1(5): 154.
- [7] WYZEWA.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wagnérienne [J]. *Revue Wagnérienne*, 1886, 2(5).
- [8] MORICE C. La littérature de tout à l'heure [M]. Paris: Librairies Éditeurs, 1889.
- [9] LAFORGUE J. Origine physiologique de l'impressionnisme [M] //

- LAFORGUE J. *Mélanges posthumes*. Paris:Mercvre de France, 1923: 137.
- [10]李国辉. 纯诗理论源流考[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0(6):45.
- [11]LAFORGUE J. Notes d'esthétique [J]. *La Revue Blanche*, 1896, 2(84).
- [12]DUJARDIN É. *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 suivi de le monologue intérieur*[M]. Roma: Bulzoni Editore, 1977: 257.
- [13]SARTRE. *Sketch for a theory of the emo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63.
- [14]WYZEWA. *Nos maîtres* [M]. Paris: Perrin et Cie, 1895: iii.
- [15]LEVIN M R. *Republican art and ideolog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M].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6: 11.
- [16]BARRÈS M. *Scènes &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 [M]. Paris: Félix Juven, 1902: 18.
- [17]AQUINAS T. *Summa theologiae*: Vol. 13 [M]. Lander: The Aquina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acred Doctrine, 2012: 61.
- [18]SONN R D. *Anarch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fin de siècle France*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182.
- [19]郭淳. 瓦格纳“整体艺术品”的社会隐喻与美学内涵[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23(1): 123.
- [20]BAUDELAIRE C. L'Invitation au voyage [M] // BAUDELAIRE C. *Œuvres complètes*: Vol. 3.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45.
- [21]VELDE. *Une Prédication d'Art* [J]. *La Société Nouvelle*, 1895(132): 736.
- [22]SIMPSON J. *Symbolist aesthetics and the decorative image/text* [J]. *French Forum*, 2000, 25(2): 193.
- [23]DUJARDIN É. *A La Gloire d'Antonia* [J]. *La Vogue*, 1886, 2(3).

Symbolist Synthe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topia

Li Guo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Wagnerian aesthetics, the symbolists, Téodor de Wyzewa, Charles Morice, Édouard Dujardin, etc, advocated the poetics of Synthesis, suggesting uniting various literary genres for expressing total life.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Synthesis consisted of two parts : one was Puly-human Content; the other was intermediateness of art categories or literary genres. The Synthesis, due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feeling and literary genres, however, was a fictive poetics. Neverthel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Synthesis has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values. By means of the Synthesis, the symbolists desired to construct among literary genres a certain degree of closed text structure, and to achieve the aim of keeping away from the rational and realistic world. The Synthesis was the epitome of symbolist Utopia.

Keywords: Symbolist Synthesis; symbolism; Utopia; Puly-human Content

玫瑰之刺下的呼吸转换

——里尔克与策兰的诗与真

郑家欣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里尔克和策兰两位现代诗巨匠在面对各自的语言困境下,都尝试寻求诗歌语言在再现现实上的突破,诗风趋向晦涩玄奥,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在里尔克影响下,策兰的不少诗作与里尔克有互文性关系,玫瑰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两者的玫瑰诗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艺术与现实、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张力。里尔克的诗歌组接意象构筑了一个无时间性的、封闭的美学空间;而策兰的诗歌构建的文本现实承载历史记忆,重新激活诗歌再现现实的可能性。

关键词:里尔克;策兰;玫瑰意象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3

晦涩性和陌生化是现代诗的两大特征。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概括现代诗的结构为:“中性的内心性取代了心绪,幻想取代了现实、世界碎片取代了世界统一体、异质物的混合、混乱、晦暗和语言魔术的魅力,还有可以与数学相类比的、让熟悉者异化的冷静操作。”^{[1]15}现代诗“真正的内涵存在于外部与内部形式力量的戏剧效果中”^{[1]4}。而拉姆平(Dieter Lamping)以“陌生化”(Verfremdung)描述现代诗的特征,“陌生化”首先指文学内部的创新,即摒弃18、19世纪的诗歌传统^[2]。现代诗人面对文学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现实处境,都在努力寻求诗歌语言在再现现实上的突破。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和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都是德语诗歌史上在各自语言困境下作出重大美学突破的巨匠,他们的创作都面临地域上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时代上前辈诗人影响的焦虑:都不是在德国出生但坚持用德语创作,都要面对强大的德语文学传统。策兰从中学开始就深受里尔克影响,出道之初就引用并转化他的诗歌^[3]。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的可能性

广受质疑之下,策兰后期面临的语言困境比里尔克更加艰难。他作为犹太人自身经历了集中营的苦难,本是母语的德语(策兰从小在母亲那里受德语教育)成了“弑母之语”(父母都被纳粹所杀)。里尔克后期的诗歌摒弃了浪漫主义无节制的情感爆发,尝试把孤立的意象叠加堆砌,构筑一个整全的、封闭的美学空间。策兰延续里尔克提纯诗歌语言的路径,重新组接意义已被掏空的语言残片,努力再现出具有某种意义统一性的文本现实。本文尝试从两者诗歌的互文性对话切入,探讨两者如何在不同语言困境下开拓出各自诗学革新路径,如何谱写出诗歌史上恒久经典的诗与真命题的现代变奏。

在文本选取上,本文以两者的玫瑰诗为例。玫瑰是西方抒情诗中的经典意象,在诗歌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诗人那里的象征意义或隐喻意义异彩纷呈。面对强大的文学传统,里尔克以玄奥晦涩的诗风革新了玫瑰意象的再现功能。受此启发,策兰诗集《无人玫瑰》(Niemandrose)(1963)中的《诗篇》(Psalm)转化了里尔克的《墓志铭》,取其诗中的“无人”和“玫瑰”自造新词和

收稿日期:2023-11-30

作者简介:郑家欣(1986—),女,广东广州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德文化关系。

新的意象:“无人玫瑰”。在策兰的所有诗歌中,玫瑰并不是出现最多的意象,但在诗集《无人玫瑰》中出现了6次^[4],其中《诗篇》的玫瑰意象是全诗核心,因此本文选取此诗作重点分析。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把两位诗人诗歌中的玫瑰意象放在德语文学传统中考量比较,分析两者诗风的陌生化以及诗歌中体现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从而管窥从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二战后的现代诗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艺术与现实、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张力。

一、晦涩性和陌生化

里尔克早期诗歌中的玫瑰并没有固定的象征含义,有时只是民间风俗和日常生活中的装饰物,有时又继承了中世纪诗歌传统,玫瑰花园成为沉静冥思的地方,而大部分诗歌中的玫瑰是爱情的象征^[5]³⁰⁶。到了中期和晚期,诗中玫瑰的象征意蕴则与文学传统相去甚远,不能满足约定俗成的意义期待,显得晦涩难解。这些玫瑰意象成了各种矛盾的集合体:生与死的矛盾、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精神与物质的矛盾……玫瑰是二元对立的统一体,也体现了诗人对整全性的追求。在完成巨著《杜伊诺哀歌》和《商籁致俄耳甫斯》之后,里尔克从1922年2月到1923年9月间有长达20个月的“卡壳”期,没有任何创作。可能是因为继续用德语创作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他人期望和自我期望过高,他转向用法语写诗,尝试打开新局面,在此期间他也受法国象征主义代表瓦雷里的深刻影响。里尔克此时正与德语诗坛流行的表现主义和新事实主义格格不入,反而在以法国文学杂志《新法国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为中心的作家圈中备受尊崇。因此1923年到1926年间,他不仅把自己的德语诗翻译成法语,也同时创作《玫瑰集》等法语诗^[6]。在法语组诗《玫瑰集》(*Les Roses*)(1927)中,诗人多次把玫瑰描述为“完满的”(complète)、“完美的”(parfait)、“充盈饱满的”(replir):“玫瑰,你哦,卓越完满的事物”“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玫瑰/而这一朵:她无可替代,/她就是完美”“完美的玫瑰”“是否我们能像玫瑰一样充盈”;玫瑰“在花茎上绕着自己旋转”“在花蕾中忘却自我”“这是个绕圈打转的世界/为了它宁静的中心敢于/圆形玫瑰般的

圆满休憩”^[7]⁸⁶⁻⁸⁷。这里的玫瑰是圆满的、自足自为的存在。玫瑰处于“无穷尽的状态”“身处在一个万物皆相融的混沌中”“虚无与存在,这无法言语的协调/我们竟一无所知”^[7]⁹⁷。从时间维度看,玫瑰一开始绽放,就已经步入枯萎的进程,尽管这个进程缓慢,但它的诞生也意味着有一天会死亡。无数的玫瑰花瓣一层一层展开,又一片一片凋零,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生,又包含着无穷无尽的死,是生与死、虚无与存在的混合。这种混沌是难以用理性去认识、用语言去表达的,超越语言的逻辑性,但是却相互协调。里尔克《墓志铭》中的玫瑰除了体在场与缺席、生与死的矛盾、“纯粹的矛盾”外,还体现其“纯诗”的诗学理念追求。

玫瑰,啊纯粹的矛盾,乐欲,

无人之睡眠在这众多的

眼睑下。

Rose, oh reiner Widerspruch, Lust,

Niemandes Schlaf zu sein unter soviel

Lidern.^[8]

这三行诗由五个核心名词组成,除了“眼睑”与“睡眠”意义关联稍强之外,“玫瑰”“矛盾”“乐欲”和“睡眠”之间意义关联松散;除了“是”(sein)放在“睡眠”之后表示状态,其他名词之间没有谓语连接,因此整首诗显得晦涩难解。这五个意象又构成一个意义整一的封闭空间,一个埋葬诗人/诗歌的坟墓。里尔克的墓志铭是他自己撰写的,一年多后他就因白血病突然恶化而病逝了。据说发病前一天,他为一个少女采摘玫瑰时被刺扎到了手,加重了病情。里尔克墓志铭中一双双眼睑就像玫瑰花瓣,虽然死亡被唯美美化,但这些死人都成了无名氏,不被纪念,谁也不是,有一种生命虚无的意味。有学者留意到,Niemandes本来在逗号后面应该为小写开头,这里反而用大写开头,表示了对特定的某人Jemand的否定^[9]。玫瑰美丽绽放,让人愉悦,闭上的眼睛却无法欣赏这种美丽,让人忧伤,体现了生与死的悖论。这些诗歌的在场和诗人的缺席也构成了矛盾:这里的“纯粹的”(reiner)和诗人的名字赖纳(Rainer)正好同音,而眼睑(Lidern)与歌(Liedern)同音。玫瑰也象征着诗歌,虽然诗人长眠,但是诗歌仍然继续被传唱。而“纯粹的”一词有“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的意思,强调玫瑰就是自足自为的存在,玫瑰这个能指与所指的关联不再是固定的、约定俗成的,玫瑰意象不再简单指向以往诗歌传统中任何一

个特定意义。就像《杜伊诺哀歌》第一首所提到的：“不再将人类未来的意义赋予/玫瑰，以及其他的特意允诺的事物。”^[7]⁸⁵²法国象征主义“纯诗”理念主张绝对的、完美的、纯粹的诗歌语言，高举形式，否定内容和意义的重要性，甚至主张诗歌不传达任何意义。里尔克的诗歌写作实践实际上没有达到如此激进的程度，但仍可看出他后期诗歌追求提纯炼净诗歌语言而不惜牺牲诗歌的可理解性。然而，当一切坚实固定的意义都烟消云散之后，那么从这种封闭诗中复活、再生成新的意义的可能性也同时被埋葬了。

这个纯诗理念的困境在策兰那里有了新的突破。策兰的诗集《无人玫瑰》中的《诗篇》可看作是里尔克墓志铭的转意改写，策兰把“玫瑰”与“无人”结合，“无人”的否定性使得诗歌语言摆脱了传统的意义期待，诗歌因此显得晦涩难解，但也重新生成一种另类的文本现实。以下翻译主要参考了王家新译本并有部分改动^[10]¹⁴¹⁻¹⁴²。

诗篇

无人再次用淤泥和粘土捏造我们，
无人对着我们的尘埃念咒。
无人。

赞美你，无人。
因你之名
我们要绽放。
向着
你。

一个无
我们曾是，现在是，将来
依然是，绽放着：
这无一，这
无人玫瑰。

有着
那灵魂明亮的雌蕊，
那天国废墟的雄蕊，
那花冠之红
被紫词所染，那我们所唱过的
越过啊越过
那刺。

Psalm

Niemand knetet uns wieder aus Erde und
Lehm,
niemand bespricht unsern Staub.
Niemand.

Gelobt seist du, Niemand.
Dir zulieb wollen
wir blühn.
Dir
entgegen.

Ein Nichts
waren wir, sind wir, werden
wir bleiben, blühend:
die Nichts-, die
Niemandrose.

Mit
dem Griffel seelenhell,
dem Staubfaden himmelwüst,
der Krone rot
vom Purpurwort, das wir sangen
über, o über
dem Dorn.^[11]

策兰的《诗篇》是对希伯来文学传统和犹太人宗教传统的颠覆。从文体学角度看，雷伊(William H. Rey)认为这首诗集合了戏仿、渎神、埋怨和赞美于一体^[12]。杜特(Carten Dutt)也看出这首诗没有沿用《圣经》中《诗篇》哀痛、抱怨、祈求、感恩和赞美的模式，而是颠覆《圣经》《诗篇》文类的“反诗篇”(counter-psalm)，也是一首关于诗的“元诗”(meta-poem)^[13]¹⁷²。从宗教角度分析，不少学者关注到策兰身为犹太人在宗教立场上的可疑性。策兰诗的法译译者马丁娜·贝达(Martine Broda)认为策兰诗中的花与上帝的缺席相关，这首诗具有反叛特质，策兰的宗教态度体现出“渎神与祈祷”之间深刻的矛盾性与双重性^[14]。哈特(Kevin Hart)评论这首诗“横跨否定神学与无神论的边界之间，前者的神呈现为‘超越的存在’，后者认为神根本不存在”^[15]¹⁸¹。前人研究大多从形而上的维度解读此诗的神学意味，本文则尝试把此诗歌文本放在与《圣经》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上考量诗人的宗教立场。这首诗的第一句可以看作作

者对圣经文体的戏仿,开篇第一句是对《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上半节的改写:“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没有再提及后半节“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根据这一章的原意,神把自己的灵吹进人里面,使这个受造物成为人,这灵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等其他受造物的根本特征。“无人再次用淤泥和粘土来捏造我们”,既可理解为第一次神已经创造了我们,不会有人再次创造我们了;也可以理解为这位“无人”取代神的位置,再次施展创造神功,再次用泥土来捏造我们,但没有把神的灵赋予这个生命。有学者也认同诗人在此并非与上帝对话,而是与“无人”对话,并把“无人”理解为“存在之虚无”^[16]。但如果“虚无”是“存在”的对立面,那么“虚无”并不能造人,并不能说话,“我们”唱赞美诗也没有对象。笔者认为,这里“无人”(Niemand)是“某人”(Jemand)的“反词”,“无人”作为某个位格取代原来某个位格所发出的行动或所处的位置,自身也具有位格。诗人在诗句中用“无人”替换耶和华的名字,是针锋相对地对这位神作出绝对否定,语气强烈并坚决,表达对诗篇文体传统的激进的反叛。《圣经》中的《诗篇》第90篇的作者摩西慨叹生命的虚无,人出于尘土又终有一天归于尘土。诗人否定的是被造物,以被造物的有限反衬神的无限,以人生命的短暂反衬永生的无限,以人生的空虚反衬永生的充实。而策兰这首诗则彻底否定创造者,全诗“无人”(Niemand)出现5次,“无”(Nichts)出现2次,这种否定的坚决语气贯穿始终。然而这个“无人”并不是虚空,而是一位与诗人面对面、有位格、实在的对象。诗人用“你”(du)而不是尊称“您”(Sie)来称呼“无人”,暗示了诗人与“无人”处于平等地位,相互认识。诗人不仅要敬拜这位“无人”,要取悦它,要走到它面前,与它面对面相遇;甚至要跟它一起成为“无”,在“无”里合一,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赞美你”(Gelobt seist du)相当于希伯来语“baruk attah”的德语翻译^[13]¹⁷⁴,诗人用这句犹太教传统赞美神的话来赞美“无人”,具有深刻的反讽性。策兰借这一玫瑰意象也传达出对宗教的深深失望:《圣经》文本中这一位声称创造生命的神,并没有阻止大屠杀的发生,对祂所拣选子民的死亡置之不顾。现实的残酷让策兰对《圣经》文本不再信任进而深深怀疑。陈芸认为,“反对上帝的策兰其实仍继承了犹

太人的传统与诫命”“还要将对话固执地继续下去”^[17]。笔者认为,策兰颠覆了犹太文学和宗教传统,并通过用虚无的“无人”位置代替神的位置,他与自造的偶像“无人”对话,而非与神对话。诗人通过对诗篇文体的彻底颠覆而反叛犹太宗教传统,从而批判宗教的荒谬性。诗集《无人玫瑰》的第一首《在他们里面曾是泥土》(*Es war Erde in ihnen*)也表达了这种对宗教的批判,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日夜挖着坑(实际是自己的坟墓),不赞美神,而且没有歌、没有语言。诗人通过对神、歌、语言的绝对否定,表达出一种生存的荒谬感和虚无感,而诗中犹太人挖坑的场景也呼应着《死亡赋格》中掘坟墓的场景。

另外,这首诗的玫瑰也让人联想起17世纪巴洛克诗人西里修斯(Angelus Silesius, 1624—1677)《基路伯式的漫游者》(*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 1675)一诗中的名句:“玫瑰不问为何,它绽放毫无缘由,它并不注目自己,它不问是否有人观赏。”(*Die Ros ist ohn warum; sie blühet weil sie blühet, Sie acht nicht ihrer selbst, fragt nicht, ob man sie siehet.*^[18])海德格尔在他的演讲《论充足理由律》(*Der Satz vom Grund*)里面解释了这首诗:玫瑰代表所有花,代表所有生长的东西及其生长过程。植物学告诉我们一切植物生长需要的原因和条件。而诗人在这里说玫瑰生长不需要问“为何”(warum),它绽放“因为”(weil)它绽放。“为何”(warum)和“因为”(weil)与原因的关系不同,“为何”(warum)是问原因,寻找原因,而“因为”(weil)包含着对原因的回答式的提示,引出原因。人类存在需要充足理由律,而玫瑰的绽放不需要支持它存在的理由,它绽放的原因也没有要求性、强制性。如果玫瑰是我们想象的对象,我们要追寻玫瑰绽放的条件和原因,那么充足理由律在玫瑰那里生效;如果玫瑰只是自为自足的存在,玫瑰只是玫瑰,那么充足理由律在玫瑰那里并不生效^[19]。与西里修斯句中的玫瑰类似,策兰的玫瑰绽放也不需要理由,而这“无人玫瑰”,由“无人”创造,归于无有,抽象晦涩的诗句产生一种否定性力量,拆解人类理性的因果逻辑链,从而激发人们对存在的深刻思考。

综上所述,里尔克的《墓志铭》与策兰的《诗篇》具有互文对照关系,两者的玫瑰意象都与德语诗歌史上的传统玫瑰意象在意义指涉上区别明显。而《诗篇》既颠覆了德语文学传统,又颠覆

了犹太文学和宗教传统,这样的双重颠覆使得文本更加晦涩玄奥,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让读者惊异,释放出一种新的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二、内在空间与历史记忆

里尔克中期和晚期的创作着意以诗的语言营造一个“世界内在空间”(Weltinnenraum),将外部世界的事物转化为自己内在世界的事物^{[20]198-106}。这个空间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时间的流逝被悬置。诗人在这个空间内经验世界内部与人心内部的隐秘和谐相融、协调一致^{[5]166-176}。《新诗集》中的《玫瑰花碗》(Die Rosenschale)描绘了饱满的玫瑰花骨朵像一个圆碗,是一个装满外部之物和“纯粹内部之物”的空间。这个空间与外在世界有清晰的界限,有内与外的明确区分。“而这:一片花瓣张开如脸,/下面纯然卧着片片眼睑,/闭合着,仿佛十倍地沉睡着。”^{[21]678}与墓志铭类似,这里也提到玫瑰花瓣一片片张开像沉睡者闭合的眼睑。玫瑰花瓣过滤、阻隔了外在现实的光,“致使那些姿势始终不可见,/发出的射线也不四散进入世界万有”^{[21]678}。里面幽暗的内在世界在玫瑰花瓣内充分展开,在封闭的内在空间里一切都不可见,甚至发出的光也不会射出来。外面世界的一切,包括自然现象(风、雨、大地的幽暗)和人类生活的不愉悦经验(罪恶、不安、被伪装的命运),都卸下重担,脱去外在服饰或伪装,“它们所脱下的,那轻的、重的,/可能是一件斗篷、一个负担、一个翅膀、/一张面具”,都转化成内在的东西,储存在“自我包含的”玫瑰内部空间内。“最终在云端的幻化、逃逸与飞来之上,/最终在遥远天星的模糊的入口处/化入满手的内在。”^{[21]678-679}几个月后写的《玫瑰内部》也体现了这种外在物质世界到内在精神世界的转换。“哪里是相对这个内部的/一个外部?哪种痛上/铺张了这样的亚麻布?/哪些天空倒映在/这些敞开的玫瑰/这些无忧无虑者/内湖的里面。”^{[21]767}外部世界带来的伤痛转移到内部,玫瑰花瓣像亚麻布一样层层缠裹着伤口。玫瑰花层层花瓣中间仿佛包含着一个内湖,湖面平静如镜,倒映着天空变幻的风云仍保持安静,外部世界的忧虑到了玫瑰内部全被化解。“它们松散地在松散中/安卧,似乎一只颤抖的手/从未能够将它们覆盖。”^{[21]767-768}玫瑰

绽放的生命力如此旺盛,花苞膨胀、花瓣散开,以至捧着这朵的手也颤抖起来。玫瑰内部的东西“过度充满”“过度流溢”“从内部空间进入那些日子,那些日子/越来越满地合拢自己,/直至整个夏天变成一个房间,一个梦里的房间”^{[21]768}。玫瑰意象代表着里尔克诗学的精神路径,外在事物转到内部精神世界,然后从内部超越出来,生长出一个圆满的诗的世界,这个世界像梦一样充满各种想象的可能性。而诗人就是这双捧着玫瑰花碗的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经营诗歌,让各种想象力绽放。另外一首诗《今天我欲博你欢心》(Heute will ich dir zu Liebe)中的玫瑰也是这样的私密的内部世界:“玫瑰空间,诞生在玫瑰里,/在玫瑰里被秘密地培养/大如心之空间,于是我们即使在外/也可以感觉在玫瑰的空间里。”^{[22]870-871}“玫瑰空间”(Rosenraum)就是一个内心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可以用心感受外面的事情。“玫瑰空间”内部装满了外部世界的事物,而这些事物进入这个内部空间后就变得安静,仿佛静止不动,不再变化,不再消逝,被“去时间化”^{[20]103},成为永恒的存在。

与里尔克的“世界内在空间”的无时间性相反,策兰认为“诗歌不是没有时间性的”“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而不是跳过”^{[23]177},每首诗都可以说是1月20日写下的,诗歌的新意就在于尝试惦记这样的日子^{[23]191}。1月20日是他获毕希纳文学奖的日子,1942年的这一天,纳粹在万湖会议上决议了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这个日子对策兰来说有特别的悼念意义,他的诗歌就是为了见证犹太人受难的历史时刻。《诗篇》中的“无人玫瑰”也穿过并把握时代,具有永恒的悼念意义,它“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绽放着”。策兰用语言构筑的诗学世界有历史纵深感,带着对当下的反思纪念过去,而这样的历史记忆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性。

以《诗篇》为代表,策兰诗中的玫瑰迥异于德语诗歌传统中玫瑰的象征含义,是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载体。旧约中的《雅歌》第二章第一节:“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雅歌》是圣经中一首新郎新娘对唱的情歌,这里新娘自比玫瑰花,而新娘在新郎眼中也如玫瑰花般美丽。哈特(Kevin Hart)把《雅歌》中的男女爱情关系解读为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因为犹太教经典《卡巴拉》(Kabbalah)作者在《光明篇》(Zohar)一开篇就把

玫瑰(实际上是红白相间的法国蔷薇)比作以色列民族^{[15]182}。《诗篇》的最后一节以“Mit”(具有)开头唤起读者注意,让读者跟随诗人目光逐一注视这朵“无人玫瑰”的各部位——雄蕊、雌蕊、花冠和刺。Griffel既可以指花柱,又可以指一种古老的书写工具石笔,这双重含义也暗示着策兰的写诗过程就如他的笔在纸上绽放出一朵花(正如“妙笔生花”)。这朵花就是“无人玫瑰”,诗歌文本就是这朵玫瑰,诗人写诗的过程亦即被“无人”点亮灵魂的诗人自己赋予玫瑰生命的过程,就是诗人用诗歌语言再现具有某种意义整一性的文本现实的过程。第三行的花丝(Staubfaden)也是词语的隐喻,诗歌词语就是用天国废墟(himmelswüst)的尘埃(Staub)凝聚成的线(Faden)而构成的。红色血液和蓝色墨水混合成紫色,紫色又染在红花冠上,诗人唱着诗歌的“紫词”,越过创伤之刺。策兰所有诗作中约1/8都有提到歌唱、歌曲这类主题,在诗集《呼吸转换》中占比甚至达到1/6^[24]。一方面,歌唱主题在策兰的诗中被质疑、被解构;另一方面,诗人仍坚信歌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仍要承担歌唱的重要使命。《诗篇》中的歌唱主题跟策兰的“元诗”对语言的反思有密切关联,“我”和“无人”合一成为“无”,“我们”的同声合唱是朝地而不是朝天,因为“无人”用地上的泥土捏造了“我”。泥土塑造的人依然与大地有紧密联结,肉身依然沉重,但这歌唱能超脱地上沉重的肉身束缚而向上飞越,超越玫瑰的刺,即超越伤痛和苦难,是人类历史记忆的升华,直达苍穹。里尔克也曾用向上的空间移动轨迹来表达音乐这种时间艺术的超越性,如《致俄耳甫斯十四行》:“此刻升起一棵树。啊纯粹的超升!啊俄耳甫斯在歌唱!啊高树在耳中!”^{[22]903}还有《杜伊诺哀歌》中的第七首:“音乐/依然继续向上伸展,将我们超越。”^{[22]880}里尔克《墓志铭》中的刺成为了诗人死亡的预兆;而策兰《诗篇》中的刺成为整首诗/乐曲的结束音,也是主音,“Dorn”就像一声钟鸣“当”,铿锵有力,坚硬响亮,隐喻苦难为全诗主题。刺(Dorn,有时指荆棘)在策兰其他诗歌如《旷野之歌》(Ein Lied in der Wüste)、《谁把他的心》(Wer sein Herz)、《安静》(Stille)、《布列塔尼的质料》(Matière de Bretagne)、《昂代伊》(Hendaye)、《白日涂墙》(Tagbewurf)、《想你》(Denk dir)中也是创伤和苦难的隐喻。在这些诗中往往同时出现玫瑰和血的意象,意味着记忆深处的死亡、伤口还像

荆棘一样时常萦绕于心并刺心锥心,伤口流出的血像红玫瑰一样绽放。《诗篇》中的歌声越过玫瑰的刺而向上飞升的画面,像《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中如歌吟诵的诗从米拉波桥向上起跳飞升逃离伤痛,离开桥上的“界石”展翅高飞。在《无人玫瑰》中的另一首诗《从加冕中出来》(Hinausgekrönt)中,“犹太—玫瑰”(Ghetto-Rose)也有着尊贵的帝皇的血色(Königsblut),在这里血红的玫瑰也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下受难的纪念物,“从每一朵/犹太聚居区硕大的玫瑰花萼里,你/看着我们,你在如此多/死于晨起而作的死中永生”^{[10]138}。《羽扇豆》(Wolfsbohne)中的“屋里的七朵玫瑰”就是“屋里的七烛台”,而七烛台是犹太教宗教仪式的常用器具,诗中提到的米哈伊洛夫卡(Michailowka)是父母遭杀害的地方,全诗不断呼唤着“母亲”,玫瑰在全诗首尾呼应,诗人借此表达对母亲受难的哀悼。德里达在《示播列——保罗·策兰》中指出:“日期激发诗歌,但诗歌自己在言说!诗歌谈论着发生在那个日期的激起诗意的事件,因此诗歌被相同日期的再来召唤,换句话说,被其他日子的重返召唤。”^[25]策兰诗歌的历史纪念意义不仅在于以玫瑰意象指涉民族创伤记忆,或者直接以日期或地点标识出历史事件,他的诗歌通过重构某种文本现实,召唤读者不断返回特定日期的历史现场。

综上,里尔克和策兰的诗歌革新路径在时空观上有所区别:里尔克的玫瑰是一个内部自足、完满、无时间性的审美空间;而策兰《诗篇》中的“无人玫瑰”是承载过去历史记忆、批判现在、开启未来的有机体。

结 语

里尔克晚期诗风有破碎化的倾向,但依然尝试对已被损坏或肢解的东西进行重新建造,用诗歌语言营造一个无时间性的、超验性的内在空间,把残破的东西变成具有美学整体性的东西。但对于这种封闭性的诗歌而言,它的意义究竟是藏在内部深处,还是已被彻底掏空^{[26]?}

里尔克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一首诗《此刻时候该到了》(Jetzt wär es Zeit)结尾为:“世界与你们一同站起,开端闪着光,/在我们的失败所有的断裂处……”^{[22]1023}该诗呈现出一种中断目前现

状、开启新未来以及作出诗学转折的姿态^[27]。在其影响下,策兰在其毕希纳奖获奖致辞《子午圈》中阐释其诗学突破的理念,提出类似“呼吸转换”(Atemwende)的诗学理念,七年后策兰出版诗集《呼吸转换》(Atemwende)。福乐堡(Ulrich Fülleborn)认为,策兰诗集《呼吸转换》的题名正好呼应里尔克的《此刻时候该到了》中的“一片新的呼吸领域”(ein neues Atemfeld),也表明了策兰在语言困境下作出诗学转折的志向^{[22]1203}。如果说,里尔克之后的现代诗已经成为一片意义被掏空的虚无之地,那策兰的“无人玫瑰”正是要在这片土壤上开出诗歌之花。“呼吸转换”是一种濒死经验,也是死而复生。集中营的伤害给策兰留下的内心隐痛让他在诗歌创作中面临艰难的语言困境:“选择词语的困难,句法急剧的坡度或为了省略句所作的清醒的感觉,——诗歌显示,显而易见,一个朝着沉默的强烈的倾向。”^{[23]193}但是他没有紧闭双唇,而是张开嘴深呼吸一口气,说出难以启齿的历史真相。他在《子午圈》中提到毕希纳的小说《棱茨》,棱茨倒立着走,天堂成为脚下埋葬死者的深渊。策兰正是采用这种写作姿势,用反常的视角看寻常事物,用反常的表达和词语搭配,甚至自造新词,激起人们对已被政治化的日常语言和沦为意识形态视觉机制的意象表征进行重新反思。“呼吸转换”为现代诗开辟出一条新路,让诗歌在奥斯维辛之后能够继续走下去。策兰破碎的诗句释放出对话语霸权的解构力量,穿透日常语言的陈词滥调,摆脱传统诗歌的隐喻负累,真实地操演着对苦难的体验,为历史见证留下真相的痕迹。

然而,借助“无人”的生命力绽放的玫瑰,最终是否也难逃被虚无之力所埋葬的命运而香消玉殒?

致谢:感谢下列各位老师和同学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指导(排名按时间顺序):陈郁忠(中山大学)、杨劲(中山大学)、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范劲(中山大学)、杨景丹(北京大学)、李国辉(台州学院)、陈芸(浙江外国语学院)。同时感谢 Björn Spiekermann(海德堡大学)和秦思斐(上海外国语大学)提供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

情诗[M].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2]LAMPING D.Moderne Lyrik [M].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2008:26.

[3]BOLLACK J.Dichtung wieder Dichtung Paul Celan und die Literatur[M].Göttingen: Wallstein,2006:227.

[4]WINKLER M.On Paul Celan's Rose Images[J].Neophilologus, 1972(1):72-78.

[5]BOLLNOW O F. Rilke[M].Stuttgart: W.Kohlhammer,1951.

[6]ENGEL M. Rilke 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M].Stuttgart: J.B.Metzler,2013:435-436.

[7]里尔克.里尔克诗全集:第4卷[M].陈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8]WOLFF J.Rilkes Grabschrift Manuskript-und Druckgeschichte, Forschungsbericht, Analysen und Interpretation [M].Heidelberg: Lothar Stieh Verlag,1983:24.

[9]GÜNTHER G.Rilkes Grabspruch Versuch einer Deutung [J]. Monatshefte,1964(2):75.

[10]策兰.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M].王家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11]CELAN P.Gesammelte Werke [M].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2003:225.

[12]REY W H.Paul Celan:Das blühende Nichts [J].The German Quarterly,1970(4):756.

[13]DUTT C.Celan's Counter-Psalms:Religious Negativity,Paradox, and the Freedom of Poetry [J].Religion & Literature, 2016(1).

[14]贝达,张何之.无人的玫瑰[J].世界文学,2019(2):250.

[15]HART K.On Paul Celan's "Psalm" [J].Religion & Literature, 2016(1).

[16]张子帆.保罗·策兰的对话诗学[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1.

[17]陈芸.复生与寂灭:里尔克与策兰的玫瑰诗比较[J].国外文学,2020(1):128.

[18]SILESIUS A.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 oder Geist-Reiche Sinn-und Schluß-Reime [M].Buchdruckerey:Jgnatij Schubarthi Anno,1675:292.

[19]HEIDEGGER M.Vortrag-Der Satz vom Grund [C]//JAEGER.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d.10).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2003:55-73.

[20]魏育青.空间与界限: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八首中的“敞开者”[J].外国文学,2016(1).

[21]里尔克.里尔克诗全集:第1卷第2册[M].陈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2]里尔克.里尔克诗全集:第3卷第3册[M].陈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3]策兰.保罗·策兰诗选[M].王家新,芮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4]NEUMANN P H.Lieder Jenseits der Menschen Das Motiv des Singens bei Celan und in Neuerer Deutscher (下转第32页)

两种“异域”

——论兰波与高更在同代人笔下的相遇

王洪羽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兰波与高更在米尔波艺术评论和谢阁兰美学理论中的两次相遇,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展现了兰波与高更“异域”思考的演变。1891年,米尔波在艺术评论中称高更为“图像艺术的兰波”,暗示了两位创作者跨越不同艺术壁垒的特点;1904年,谢阁兰发表《两个兰波》与《高更在他最后的布景里》,并在两人离开欧洲的行为中受到启发,提出“多异美学”。从米尔波的评论出发,诗歌与绘画互为艺术的“异域”。兰波与高更从探索“姐妹艺术”及“姐妹艺术”的语言开始,以跨艺术的理念创作,促进主体在对话中实现自我更新。从谢阁兰的评论入手,对话的态度进一步促使他们离开欧洲,从时空的“异域”反观欧洲社会现代性的发展,寻找两种文明的对话互利性。兰波与高更利用艺术“异域”和时空“异域”的多元性警惕同质化,至今具有意义。

关键词:兰波;高更;诗画关系;“异域”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4

19世纪下半叶,法国诗人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和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先后离开欧洲,一时掀起热烈讨论。在米尔波(Octave Mirbeau)笔下,兰波与高更第一次“相遇”,这是一次诗画艺术的相遇。米尔波是第一位将两人相提并论的评论家,1891年2月18日,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称高更是“图像艺术的兰波”^[1]。米尔波的文章写于高更前往塔希提之际,旨在帮他提升知名度,刺激画作销量,达到筹款的目的,因此文章的重点是艺术品而非远游,“图像艺术的兰波”这一评价也主要针对画家的艺术观点而非离开欧洲的行为。评论发表时,兰波还没有被大众熟知,但已经通过颓废派和象征主义者的争锋进入文坛视域。1883年,米尔波已经以笔名或匿名的形式评论兰波的诗歌作品,说明他较早对兰波产生认识,甚至发现其“追求未知”的诗学。米

尔波在艺术维度找到兰波与高更“追求未知”的共同点以及高更如诗人一般的想象力,进一步评价高更“心怀忧虑,追求未知”^[1]。文章引起兰波的至交魏尔伦、诗坛领袖马拉美等人的共鸣,令人不禁追问,兰波与高更是否确有相似之处。西方早有“姐妹艺术”的传统,将诗人和画家进行类比原本不具有特殊性,但兰波是“语言炼金术”的提出者,高更是后印象主义的代表,他们对艺术语言的更新在诗歌史、绘画史上意义重大,推动了艺术现代性的进程,直接启发了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融合各种艺术的抽象语言,因此在他们身上,“姐妹艺术”的相遇进一步与现代艺术的语言创新结合在了一起。

通过法国诗人、汉学家、考古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著述,高更和兰波又一次在文艺创作中被并提。高更1903年去世时,谢阁兰在塔希提发现了他的遗作,大受启发,着手写作《高更在他

收稿日期:2023-11-30

基金项目:2021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拔尖人才培养项目“19世纪下半叶法国诗坛的诗画融通研究”(AC9103-21-368012310)

作者简介:王洪羽嘉(1995—),女,安徽黄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国文学、比较文学。

最后的布景里》(*Gauguin dans son dernier décor*),于1904年6月发表。谢阁兰也是兰波的追随者,在写作纪念高更文章的同时,也在法国本土发表了《两个兰波》(*Le Double Rimbaud*,1904),探讨兰波离开欧洲前后的身份关系,也就是兰波身上“我”与“另一个”的关系。不仅如此,谢阁兰一离开塔希提,就前往吉布提探访兰波的非洲踪迹,他对兰波与高更的思考是同时进行的。依旧是在1904年,谢阁兰在前往爪哇岛的道路上,提到要“写一部有关异域情调的著作”^{[2]223},讲述时间与空间上的“异域”、视听觉等官能的“异域”,以及性别的“异域”。1908年,谢阁兰正式提出“多异美学”,将“异域”概念扩展为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将异乡人的特征定义为“自由的态度”^{[2]257},并强调“对‘多异’的感知,是对与自己相异的‘另一个’的认识,而异域情调也就是能够构想异己的力量”^{[2]225}。根据谢阁兰1904年的创作活动,“多异美学”,尤其是其中关于官能“异域”、时空“异域”的思考,应该很大程度受到了兰波与高更的启发,因此谢阁兰的“多异美学”可以被看作兰波与高更的第二次“相遇”。

两位评论者并非随意促成了兰波与高更的比较,高更自己也对兰波怀有亲近和尊敬之情。1898年,高更获知兰波的噩耗,便在塔希提的《黄蜂》(*Les Guêpes*)杂志上写下缅怀文字,并以纪念兰波为名讨论殖民地现状。^①可惜的是,此时距离兰波逝世已经七年。就在高更离开欧洲的那一年,兰波已经身染重疾去世,前往塔希提的高更远离巴黎的艺术中心,信息相对不畅。不过,在兰波生前,高更认识兰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他在艺术圈崭露头角时,兰波已经彻底放弃艺术,前往非洲,高更应该是在与马拉美等诗人的相处中了解了兰波。^②在《黄蜂》上,高更将早一步离开现代城市的兰波唤作“朋友”^[3]。他将兰波深入非洲殖民地的生活作为主要内容,讨论诗人、艺术家离开欧洲的“有用”与“无用”、欧洲政府对殖民地的“征服”与“疏离”。在逐渐“文明化”的塔希提海岛上,以这样一篇探讨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文章纪念同样去国离乡的兰波,高更的做法有现实性的考量。兰波曾说“我是‘另一个’”^{[4]304},而他对诗歌的彻底放弃表明,对他来说,诗歌语言的“另一个”已经从跨艺术的语言转变为跨生活的语言,他也为此踏进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另一个”,也就是与他所生活的现代法国相对的“异域”——非洲。现代文明与

原始文明、欧洲与殖民地互为“异域”,高更从与现代法国相对的另一处“异域”——塔希提对艺术语言进行反思,也对西方文明的现代性进程进行反思。

一、跨越艺术:

“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

米尔波将高更与诗人进行类比不无道理,因为高更在创作中主动挖掘诗意,他甚至自述:“任何事情都有诗意,都存在于我有时觉得神秘的心灵的角落里,而我正是从这种神秘中感觉出诗意。”^{[5]92}波德莱尔在1868年《哲学的艺术》中谈到:“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画家把音乐的声音变化引入绘画,雕塑家把色彩引入雕塑,文学家把造型的手段引入文学。”^[6]当时的文学艺术总体上具有“侵犯邻居艺术”的倾向,这也打开了不同艺术主体间对话的巨大空间。兰波就吸收图像视觉性的效果,在《元音》一诗中“发明了元音的颜色”^{[4]189},将色彩、声音所带来的官能体验融为一体。可以说,早在走进时空概念上的“异域”之前,兰波与高更最先进入的是“姐妹艺术”的“异域”,从“姐妹艺术”的对照中思考他者的问题。他们的创作为“侵犯的欲望”所推动,但不同于普通的互相模仿,他们总是以消解原作、重新创造为前提,这种对“新”的追求也预示着后来他们离开法国的选择。

兰波以诗歌的形式在《巴黎战歌》(*Chant de*

① 文章题目“Rimbaud et le Marchand”为后人所加。

② 在1881年2月的家信中,兰波提到想要离开哈勒尔,并解释说一旦巴拿马运河的项目顺利开展,他就立即前往巴拿马。学者让·沃尔米注意到这一点,提出如果兰波当时曾经去过巴拿马,他有可能在当地与高更相见,但这只是沃尔米一个可能性很小的猜想。(VOELLMY J. Les Lettres de deux solitaires: Rimbaud et Paul Gauguin [J]. Parade Sauvage: Revue d'études rimbaldiennes, NO.16(2000): 135-145.) 1891年他们都返回了法国,但当时兰波正在进行最后的治疗,如果这时高更见到兰波,不太可能在1898年才获知兰波去世的消息。所以笔者认为,高更所说的“朋友”有可能只是将兰波看作精神上的知己,他极有可能在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口中听说过兰波,或在一些沙龙聚会上听到过友人分享兰波的诗句片段。高更绘画作品和回忆录中的一些片段体现出和兰波相似的想法。此外,苏珊娜·贝尔纳在第十一届A.I.E.F大会上曾简单提到高更受过兰波影响,但并未具体解释这一说法。(Compte Rendu des discussion du XIe Congrès, Cahier de l'A. I.E.F., NO.12(1960): 287-301.)

guerre Parisien)和《冬季的节日》(Fête d'Hiver)中回忆柯罗(Corot)和布歇(Boucher),在《彩图集》(Illuminations)中创作“彩色的版画”,绘画元素大量参与了他的诗作。早期诗歌《巴黎战歌》是他融通诗画的代表作,描绘了镇压巴黎公社期间,巴黎城硝烟四起、满目疮痍的图景。一方面,这是一首典型的如画诗,其描绘“如绘画般生动”(enargeia)^①。兰波在诗中写道:“我们再不能寻欢作乐。”^{[4]74}“寻欢作乐”一词的法语为bambocher,名词bambochade有“田园风俗画”的语义。因此可以推测“我们再不能寻欢作乐”暗示原本“田园风俗画”般和谐美好的巴黎风貌已经被销毁。诗歌表明“绿色的造物主心中”那轻快和谐的田园生活不再,柯罗笔下田园牧歌式的巴比松风光惨遭破坏,城市里寻常巷陌的风俗景象更已被“血红的湖泊”替代,诗人讽刺梯也尔和底卡尔之流用战火重新绘制了一幅最写实主义的“柯罗的油画”。所以另一方面,这也是一首非典型的“艺格符换”(Ekphrasis)^②题画诗。柯罗的风俗画虽然出现,但诗歌已经不指向柯罗的原画,这在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是标准的“艺格符换”。通过戏谑的模仿,诗人借柯罗之名“改写”了战争时期的写实画作,以烟焰烈火替代了和谐美景。兰波以想象置换具体艺术参照的手法不仅不依赖,甚至能够超越现成的艺术参照的表现力,实际上是将绘画的视觉性内化于诗歌中,使诗歌在尊重诗画差异性的基础上,具有画面感,借助诗画的良性互动推动自身的创作。

高更的诗画融通同样不依赖于“姐妹艺术”的现成品,因为在当时的现代派画家看来,文学故事和典故在一定程度会强化作品的说教观念;而过于关注意义可能会分散画家对绘画语言与技术的重视。只不过高更天生具有获取诗意灵感的天赋,能够培育绘画本身的诗意,诗意又与其技巧巧妙结合在一起。高更以冉·阿让为原型的自画像有意反典故,与兰波一样,他在此与彼的共存之间保留了两者的“差异性”,将文学的观念内化于新的创造之中。就这幅自画像而言,由于它与冉·阿让已经相去甚远,所以一旦离开高更的解释,多数观画者就根本无法在画作中找到冉·阿让的身影。借这幅画,高更玩起了文字的游戏,他在致埃米尔·舒芬尼克尔的信中说“这是一个歹徒的脑袋”^{[5]102},在给梵·高的信中说这是“一个小偷的面具”^{[5]97}。实际上,这既是苦役犯冉·阿让,又是“落选者沙龙”画家们的“悲惨”形象,还是城市游荡者的众生相。

同时,画作中饱经沧桑的男子被置于一个温馨舒适的少女房间中,这和冉·阿让的苦役犯境遇形成反差,男子对社会繁华和温馨表象进行审视,使画作的诗意溢出《悲惨世界》原作。

《巴黎战歌》虽销毁了布歇的绘画,却绘制了一幅真实的巴黎图景。高更的自画像虽始于“姐妹艺术”,但又是一道新的谜语。从审美层面,两位创作者的“侵犯的欲望”以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为基础,但他们不仅利用了眼耳感官互通、“侵犯邻居艺术”的横向应和,还在纵向上分别突破柯罗和雨果已经建立的象征通道,创造新的指涉关系,于是“姐妹艺术”的原型不仅不再是表现对象,还是颠覆和解构的对象。正是从这个层面开始,诗与画形成了彼此尊重的平等对话,兰波与高更之间也第一次发生隔空的理念对话。他们通过破坏现成作品与现成话语方式的单一性和同一性,使诗画主动打破自身的疆界,与对方相遇,从而寻求主体间对话的机会,这种理念又强化了“应和”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对话总是通过语言实现的,若两个主体期待彼此分享,则首先要打破语言壁垒。

二、跨越媒介:寻找常新的语言

现代艺术的奠定与诗歌、绘画语言的更新紧密相关。兰波与高更并未止步于使用现成艺术语

① 该词最早为修辞术语,指演说家能够将听觉转换为视觉,使倾听者获得视觉感受,比较早的记述有古希腊学者迪奥尼索斯(Dionysus of Halicarnassus)对吕西亚斯(Lysias)的评论、狄奥尼索斯及普鲁塔克对修昔底德风格的评论等。后语义逐渐扩大,指文学像绘画般生动地描绘。从词源学来看,这一术语强调描述的生动性和能量感。

② 20世纪以降,Ekphrasis的概念在文学批评领域不断获得新的阐释,国内学者对其界定尚存争议。欧荣赋予这一术语以广泛内涵:“指不同艺术文本、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动态转换”,包含“不同艺术文本之间相互影响转换以及持续的、动态的双向/多向影响的内涵”。(欧荣:《语词博物馆:当代欧美跨艺术诗学概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8期。)王安、程锡麟则强调Ekphrasis的界限应当有所规范和约束:“其概念的界定当以赫弗南和米切尔等人的表述为妥,即它的核心内容是‘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更确切地说,是文字表述出来的视觉艺术效果,是文学与作为他者的视觉艺术之间的交融和博弈。文学不仅可以描述艺术作品,展示其视觉效果,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借鉴视觉艺术(如绘画、摄影、电影等)的创作技法,实现文学的技巧创新。”(王安、程锡麟:《西方文论关键词:语象叙事》,《外国文学》2016年第4期。)综合国内学界的不同主张,《巴黎战歌》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典型的“艺格符换”诗作。

言来描述“姐妹艺术”的已有成果,相反,他们从“姐妹艺术”中获得启发,广泛收集跨艺术的语言工具,以此丰富本艺术的表达体系。于是在他们笔下,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姐妹艺术”不再是各自独立乃至对立的集合,而是互相开放的符号场,能够有效地更新对方的语言系统,打通语言的“异域”边界。

兰波代表作《元音》对波德莱尔的突破能说明不同艺术符号,如声音、色彩对诗歌语言的改造。从句法结构上,兰波的《元音》仿照了波德莱尔的《灯塔》(Phares)^[7]。波德莱尔以一个画家或雕塑家的姓名引导一节诗歌,用相应的一节诗代表该名字所令人联想到的景象和空间,比如达·芬奇之名对应“深邃幽暗的镜映照着迷人的天使笑意浅浅”^{[8]22}。兰波则用一个被颜色定义的字母引导两行或三行诗句,而这两到三行诗的描述实际上都是所指字母的同位语,是字母的音素和颜色符号唤起的一连串图像。比如“E白”^{[4]102}所指向的诗句:“阴暗的海湾;E,汽船和乌篷的天真,/巍巍冰山的尖顶,白袍皇帝,伞形花的颤动”,从E对应的“白色”延展开来,“天真”“冰山”“白袍皇帝”“伞形花”等词汇都是引起读者感官感受的形象。波德莱尔选取了八位艺术家,对八位艺术家的描绘几已囊括世间诸景,故其诗歌的终点是“悠悠永恒的边境”^{[8]24}。兰波同样展现了世界的景象:“A黑”是腐烂的景象;“E白”代表天真;“I红”指向笑;“U绿”为和平;“O蓝”则是毁灭与新一轮循环的开启。但是,即便可以证明兰波仿照了波德莱尔建立的指代关系,他的手法也比波德莱尔要专制得多,因为波德莱尔利用的是已经经典化的艺术家及其现成作品,《元音》依靠的却是“差异性”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当艺术家的姓名从听觉和视觉上出现的时候,受众眼前能够直接浮现出艺术家的作品,感受到作品的氛围,并产生更广阔的联想,这种联想是作为文字符号的姓名能够自然而然唤起的。但一旦画家、雕塑家被替换成了字母—颜色的抽象组合,联想就不易实现,诗人“定义”起来的景象根本上是围绕着一个抽象的概念展开,不合读者的认知习惯。所以兰波所完成的,是从具象联想到抽象定义的过渡,他将原本文字符号的象征任务交付给了更丰富的符号场,而在符号场中纳入原本从属于其他艺术的符号,如颜色,从根本上更新对语言的思索,即是一种“语言炼金术”。

高更也在探访邻居艺术时将其语言用于本艺

术符号的改造,通过模糊不同艺术符号的边界,更新绘画的表达手段。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夏尔·乔治·施皮茨(Charles Georges Spitz)展出了他的摄影作品《瀑布边的萨摩亚人》(Samoan at a Waterfall),照片主角是一位在山间瀑布弯腰喝水的男子。高更的《神水》(Pape Moe)就以这张照片为原型。摄影是一种将“再现”水准推向极致的艺术门类。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即便以模仿论为核心,在具体创作中,也只是有选择的模仿,而摄影术则无法挑剔表现范围内的一切对象,真正将所见之物搬到艺术中。当绘画走到印象主义之后,“再现”到达了一个瓶颈期;摄影术的出现更是给绘画沉重一击,它意味着无论绘画能模仿得多逼真,其存在的意义都已经遭到质疑。高更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新绘画语言,并强化诗意感受的维度,既是创新之举,又是出路所在。画作参考了照片擅长的细节描写,却最终带来了照片未带来的心灵震撼。一方面,这幅塔希提时期的画作是一个白人对毛利人的刻画,对他身上自然属性的赞美;另一方面,正如略萨在这幅画中看到了“双性人的神秘象征”^[9],高更的绘画改变了照片上的人物,原本完全背对摄影镜头的男子偏过头来,隐约露出女性化的柔和和五官,于是画中的人物仿佛是二元关系的中间地带,是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发生对话,实现交融的中间地带。摄影术在当时常被看作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威胁,高更的《神水》却是艺术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更何况它在绘画中找到了摄影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就是通过性别隐喻、自然隐喻产生的诗性意蕴和哲学沉思。于是艺术的边界被再次扩展,诗歌、哲学、绘画乃至摄影的语言优势都集中在这幅画作上,画作成为各种领域、各种符号对话的场所。

从《巴黎战歌》《自画像》挪用和颠覆“姐妹艺术”,再到《元音》《神水》集各种语言符号之优势更新表达手段和作品意涵,兰波与高更早已脱离简单模仿的范畴。他们表达了一种先进的理念,即各种艺术可以不再独立占据旧有的语言系统,而是利用协作构建一个语义开放的符号场,共享跨艺术、跨媒介的语言系统。他们探索语言的“异域”,促使原有语言扩展疆域。善用这种语言观能给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带来革新,推动现代社会跨文化对话的发展。跨文化对话的理想,如赵汀阳的解释,是要利用文化的相互发现,“以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共同创作一种新文化”^[10]。因此,跨文化对话

并不仅仅是文化对话,还要求从对话中获得现实意义,从实践中产生实际效果。兰波指出,诗歌的目的是“改变生活”^{[4]186},也就是说,诗歌不能只为艺术本身增添荣光,不能只在审美领域产生价值。在“改变生活”的导向下,他出走非洲,在“异域”文化中思考欧洲文化,尤其是文化现代性和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悖论。

三、跨越时空:

超越两种现代性的悖论

在兰波与高更的时代,法国经历着大革命以来的制度变迁、国家内外的征战,同时也感受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见证了这些变化作用于建筑、交通、科技、消费等方面的效果。一系列日新月异的变化成为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抑或是反抗对象。在以镇压巴黎公社为背景的《巴黎战歌》中,诗人描述打击异己的战争,认为暴力的征服扩大了文明,却也使文明的扩张染上了血腥的色调。高更则通过《自画像》讽刺文明,华丽房间里粗野的男性就是在攻击文明世界的虚假成分。可同时,画面的意义也为这种“聚焦”和“瞄准”所限,无法跳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否定。如果资产阶级社会里的文学艺术只以目之所见的资产阶级现代性为反思的对象,它也同时束缚住了自己的想象力和表现的边界。

自波德莱尔以来,艺术寻求自主性。但它以“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11]为前提,它便必须依赖于资产阶级现代性而存在,两种现代性的分裂其实是以共存乃至相互影响为基础。所以对于以波德莱尔文化现代性为特征的艺术而言,其自律不乏虚假的成分。兰波认为抛开这种交缠的困境,抛开对特定价值标准的绝对否定和厌弃,艺术反而有可能避免因无法超越这种程式化的排斥而陷入的危机。更何况,文艺和社会结构之间还存在另一重悖论: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过速发展,就有可能在无休止的更新中变成一个难以自控的漩涡,导致畸形发展的悲剧。可是,如果艺术的更新能保持其对于社会结构的相对独立性,从“此时”与“此处”中离开,那么更广阔的时空不仅是其描摹的对象,更是一道确保它不因迅速触界而脱轨的闸门。同时,这样的作品又能从更开阔的视野上反观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种种发展问题。

从《巴黎战歌》《自画像》等作品看来,诗人与画家都是“以促进社会变革为目的”^[12],甚至要寻找“‘改变生活’的秘诀”^{[4]186}。可是,在看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困境以及其中裹挟的文艺困境后,直接的冲突已不再是兰波与高更唯一的斗争方式,“在濒临绝望的边缘,(艺术家)能够做的,只是用解放的艺术抵御这个枷锁重重的社会”^[13],他们迅速打开了新的场域,从“异域”凝视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悖论。1872年,兰波离开法国诗坛,远赴非洲,高更则于1891年前往塔希提。非洲和塔希提相对于法国而言均是被打开的另一个时空,有着自己的发展节奏和频率。同时,作为殖民地,它们也代表着欧洲文明的背面,与之对话能够促进欧洲文明的自我理解。兰波在非洲经商并从事科学工作,从艺术转向生活,做非洲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记录者和参与者。高更到达塔希提,见证了当地现代工业发展的痕迹,他虽心存不满却不能完全与之隔离,甚至主动投身报刊事业,促进当地文明开化。可见兰波与高更的跨时空探索并未对欧洲现代文明弃绝。只不过,在文明与落后、现代与原始的碰撞中,非洲和塔希提为来自欧洲的诗人 and 艺术家提供了自我审视的距离,他们在这一背景下融入其中。自维庸(Villon)始,法国传世的抒情诗就常常围绕着城市,尤其是巴黎而展开。在兰波与高更所处的时代,虽然帕纳斯派也欲将眼光投向古老的“异域”,波德莱尔也曾描摹遥远的东方,但这群自诩为波西米亚人的作家几乎只在城市流浪。同样,画家们笔下的东方也大多只建立在想象之上。兰波与高更彻底转向东方,将波西米亚人的流浪姿态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他们摆脱了欧洲大陆对东方的刻板印象,通过将东方作为西方文化的对话者,在东方的视野中观照欧洲社会内部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对抗与对话。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是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为基础,反映人性的真实,通过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改变社会。但正因很大程度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社会环境,它的表现场域也受到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制约。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描写、对揭露人性和社会黑暗的强调,也不同于唯美主义对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厌弃,兰波以不再一味反抗现代性来理解现代生活本身,他直接写作现实性的文本,记录非洲社会的生活,沟通法国社会与远方文明。他的写作与传统的写作、反抗的写作同时具有差异性,从

反抗到融入,好比否定之否定,是否定精神的延续。因此,尽管非洲兰波的融入与诗人兰波的反抗形成了差异,却与他追求自由、接受未知的态度一以贯之,非洲的兰波也不断在离开所到之处,探索新的领域。高更亦然,他的初衷是远离资产阶级文明做个“野蛮人”,但看到南太平洋的现状之后,他并没有闭目塞耳地为艺术而艺术,而是通过创作绘画、编辑报刊,记录下了原始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并为塔希提岛献计献策。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他内心仍然好斗,但此时他的画作已不为反抗欧洲社会而作。高更在兰波身上找到共鸣,借他自己的表达,在“异域”的一切选择已经摆脱现代性的矛盾,只抒发内心的“善意和自由的向往”^[3]。在兰波与高更的观察中,原始文化和现代文化、异域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客观差异都得到了保留,创作依旧以差异性为前提,却更彰显对话的包容性。

四、边界开放: 谋求对话的态度

对于高更离开法国的选择,兰波的“异域”转向尽管不起决定作用,却很可能是触媒之一。因为兰波虽远离了巴黎的艺术圈,却一直活跃在魏尔伦等人的口中。高更离开法国时,法国本土已经有很多关注“异域”的作家,但高更在对殖民主义发起进攻时,却只忆及放弃写作的兰波,在《黄蜂》上发表悼文,将兰波看作一同反思殖民话语的“朋友”。实际上,从雨果、戈蒂埃,到凡尔纳、洛蒂的“异域”书写,都是基于认识经验的创作,往往具有想象和建构的倾向。这种西方视角下变异的东方形象极易使东方沦为西方自我抒发的工具。“东方主义”则演变为欧洲中心主义对其他文化的建构,“是一套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成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4]。高更对殖民主义的攻击却表达出对差异性对话的渴望。差异性对话超越了殖民主义的基本逻辑,要求各主体放弃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分,抛弃异域情调的定见,以平等姿态进入对话场域。

高更和兰波的异域探索经验启发了谢阁兰“多异美学”的理论总结与发展。谢阁兰认为,西方狭义的“异域”书写是“平庸的游客或观光者的万花筒”^{[2]238},或是以现代文明的特定眼光投射的带有贬义色彩的幻景。他认为无论是探险者、游客,还是以殖民者眼光进入“异域”的洛蒂之流,都是

“假异乡人”,是“给异域情调‘拉皮条’的人”^{[2]248}。但兰波与高更打破白人身份进入异域的行为却令他深受触动,他花费大量时间探索他们的足迹,并将兰波与高更定义为“超越规则的创作者”(les hors-la-loi)^[15]。结合他异域情调论的起点:“唯有‘个性’强烈的人才能感觉到‘差异’”^{[2]238},兰波与高更的个性精神保证了他们能够感知到“我”与“另一个”的差异,而不是急于同化“另一个”。无论是跨越艺术和艺术语言的“异域”,还是超越古老与现代、东方和西方向的物理性限制,其实都是以自由开放的心态,容纳并学习与自我相区别的他者,这就涉及谢阁兰宏观上的“差异的概念”,即“对‘多异’的感知,是对某物与自己相异的认识”^{[2]235}。

对原始文化与欧洲白人文化相异性的认识,启发高更思考不同种族、不同地域同样面临的终极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从画面来看,《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D'où venons-nous? Qui sommes-nous? Où allons-nous?*)完全是一幅具有异域情调的作品。然而与西方常见的东方描绘相比,蓝绿的色调和扭曲的枝丫产生了诡异的粗糙感,代替了西方进行东方书写时常用的旖旎风光。它已区别于彼时西方化东方形象的变形或重组,不再是迎合西方异域情调想象的作品。高更在画面上题写下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代表回归人类最初的状态;“我们往何处去”则是打破当下格局的可能性;“我们是谁”没有答案,但绘画的原始主义特点开阔了文明社会原本被自我欣赏限制住的文化视角,为欧洲现代文明拉开了易于自我批评的距离,为回答“我们是谁”提供了宽阔空间。画作超出了审美的范畴,以谜语的形式呈现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画面形象看似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但并不与文明的价值形成冲突,高更此作是提倡以二元的张力弥补同一性文化的不足,鼓励人们以改变视角的方式返回最初的思考,进而打开思路,“改变生活”。以毛利人形象构成的画面是高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他实际是启发人们时刻以差异性的思维方法重审谜题,答案就是接受差异本身,这也呼应了兰波“我”是另一个”的诗歌主张。“我”以“另一个”为参照、超越的工具,从而通过“异域”摆脱束缚着自身的成规,促进自身的更新。在此过程中,“我”与“另一个”交织着,也被“另一个”利用着。正如海德格尔的诘问:“诗意

创作的男人们已经更坚决地远离故乡。船夫们必须还要勇敢地置身于遗忘之中。但是他们在对故乡的最大远离中不是更亲近于本己之物吗?”^[16]亲近“异域”实际上也是在向自我回归,兰波与高更跨越艺术语言和文明,在重层的“异域”中探索,有利于更新自我。与此同时,“另一个”存在之必要不仅在于它与“我”的自我超越构成一个循环,更在于二者共同的向上运动能够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兰波与高更的“异域”探索对今日的主体间对话依旧有所启迪。

总体上,兰波与高更在米尔波艺术评论和谢阁兰美学理论中的两次相遇,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展现了兰波与高更“异域”思考的演变。受到时代的诗画互动氛围以及波德莱尔打通官能的“应和”理论影响,他们最先触及的是艺术的“异域”,也就是“姐妹艺术”的场域。在打破艺术语言窠臼的愿望下,他们都从关注艺术的“异域”转向关注艺术语言的“异域”,在实践中促进了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在艺术中的相互转化,这也预示了20世纪以来艺术语言边界的进一步打破。美学现代性起源于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美学现代性如果只观照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视野总是受限。两位艺术家不约而同地离开欧洲,将对现代艺术的思考扩展到世界化的场域里,并在“异域”中识别自我。

结 语

从语言符号的创新看,诗画虽被称为“姐妹艺术”,却不可避免地具有竞争性,诗与画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展各自内部的表现空间,正是因为在其外部有来自“姐妹艺术”、摄影术等领域的威胁。可也正是在被“入侵”的危机之下,它们自身表现出“侵犯的欲望”。在此基础上,诗画,乃至更丰富的艺术门类,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时,也通过对“他者”“另一个”的发现返回自身、超越自身,各艺术从而以多样互动的面貌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面对所处时代两种现代性的悖论,艺术语言层面的创新已不足。突破白人创作者的身份,以全新身份进入异质的文明,不失为更新思路、摸索出自我超越的途径。兰波与高更从改变生活的理想出发,无论是对跨艺术的探索,还是对多元文化的思考,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差异性对话的作用,通过跨越

相异双方的边界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杜亚泉曾说:“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17]他针对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对立争辩的历史局面高声呼喊,其目的还是处理异质文化该“战”或“和”的问题。如今,走向“异域”寻求对话的经验已经越来越丰富,但人类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复杂,从先行者在社会现代化初期的先进探索中汲取养分、感受初心,依旧有助于在更高层面思考当代文明的对话之道。兰波与高更的经验不仅对东方主义的旧程式提出挑战、对一味强调优越性的对立格局提出挑战,更有助于在更加开阔的全球化发展空间中警惕文化同质化与绝对的文化普遍性,推动新形势下不同地域、民族跨文化对话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MIRBEAU O. Paul Gauguin [N]. Le Figaro, 1891-02-18.
- [2] 谢阁兰. 画&异域情调论 [M]. 黄蓓,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 [3] GAUGUIN P. Rimbaud et le Marchand [N]. Les Guêpes, 1898-06-12.
- [4] 兰波. 兰波作品全集 [M]. 王以培,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 [5] 高更. 高更艺术书简 [M]. 张恒, 林瑜,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 [6]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M]. 郭宏安,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347.
- [7] STEINMETS. Des "Phares" aux "Voyelles": entre visible et lisible [C] // LOUVEL L, SCEPI H. Texte/Image: Nouveaux problème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5: 263-264.
- [8] 波德莱尔. 恶之花 [M]. 郭宏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9] 略萨. 天堂在另外一个街角 [M]. 赵德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64.
- [10] 赵汀阳. 乐比雄. 一神论的影子 [M]. 王惠民,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1.
- [11]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43.
- [12] 李建英. 兰波诗学的现代性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6): 17.
- [13] ADORNO T. Philosophy of New Music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2006: 82.
- [14] 宋敏生. 从东方主义到世界主义: 纪德的东方旅行与书写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3): 109-110.
- [15] FORSDICK C. Victor Segalen and the Aesthetics of Diversity: Journeys between Cultur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 [16]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文集: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65.
- [17] 伦父. 东西文化批评: 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5: 10.

Two Approaches to the Exotic

—On the Encounters Between Rimbaud and Gauguin by Contemporaries

Wang Hongyu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two encounters between Rimbaud and Gauguin in Mirbeau's art criticism and Segalen's aesthetic theory, seemingly unrelated, in fact demonstrate the evolution of Rimbaud's and Gauguin's thinking of the exotic. In 1891, Mirbeau called Gauguin "the Rimbaud of pictorial art" in an art review, suggesting that the two creators crossed the barriers of artistic disciplines. In 1904, Segalen published *The Double Rimbaud and Gauguin at his Last Setting* and was inspired by their departure from Europe to develop his "Aesthetic of Diversity". From Mirbeau's commenta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language of poetry and the language of painting are mutually foreign. Rimbaud and Gauguin began exploring the "exotic" territory of arts and art languages and created arts from a trans-artistic perspective, advocating that different subjects would renew themselves in dialogue. From Segalen's development, this dialogical attitude later led the creators to leave Europe and reflec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social modernity from an exotic perspective, searching for the mutual benefits of dialogue between two civilizations. Rimbaud and Gauguin's exploration across art and space and time, warns against homogenization, and still has cultural significance nowadays.

Keywords: Rimbaud; Gaugui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exotic"

(上接第24页) Poesie [C]//DANUSER H, MOTTE-HABER H, LEOPOLD S, et al. *Das musikalische Kunstwerk Geschichte-Ästhetik-Theorie*. Lilienthal: Laaber Verlag, 1988: 770.
[25] DERRIDA J. *Schibboleth pour Paul Celan* [M].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86: 22.

[26] 瑞安·里尔克: 现代主义与诗歌传统 [M]. 谢江南, 何加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255.

[27] FÜLLEBORN U. *Rilke und Celan* [C]//SOLBRIG I H, STOCK J W. *Rilke heute Beziehungen und Wirk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urkamp, 1975: 50.

To Take a Breath Above the Thorns of the Rose

—Poetry and Reality in Rilke and Celan's Rose Poems

Zheng Jia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Rilke and Celan, the two masters of modern poetry, tried to seek a breakthrough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their poems facing their own language dilemm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ilke, many of Celan's poems have an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with Rilke's. Their rose poems are one of the typical examples, which present the tension between art and reality, poetry and history in different ways. Rilke's poems combine images to construct a timeless and closed aesthetic space, while Celan's poems construct a textual reality that carries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activates the possibility of poetry to reproduce reality.

Keywords: Rilke; Celan; rose image

“犬”“豚”辨异

——兼论勾践生育奖励政策中蕴含的性别观

叶 娇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传世名篇《勾践灭吴》中有关生育奖励的措施影响深远,但生男生女分别奖励犬豚的做法却广受争议,颇多分歧。从语言、历史、文化多角度辨析“犬”“豚”之异,明确先秦时期犬、豚同为重要肉食来源,但越人纵狗行猎,在越国,犬的地位高于豚;犬阳豚阴的动物阴阳观念乃汉人习气,并不适用于当时的越国;勾践分别奖励是出于犬、豚的不同文化蕴含,体现的是男尊女卑思想下男女分工的不同。勾践各尽其用的性别观对当今社会亦有借鉴启示意义。

关键词:《勾践灭吴》;犬;豚;先秦;越国;生育奖励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5

随着近年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国家二孩、三孩政策的相继出台,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想起古人的生育激励措施,其中印象深刻的莫过于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的人口增长策略。《国语·越语》载,越王勾践为鼓励人口生产,“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1]294}。以这一国策为基础,短短20年,越国人口飞速增长,越国迅速强大,最终成功灭掉吴国。

越王勾践激励生育之成功毋庸置疑,但其为了增加人口而采取的奖励制度,尤其是生男生女分别奖励犬豚的做法却引发了后人的诸多疑惑,不明勾践为何要以犬豚奖励,为何以犬奖励男子、以豚奖励女子?特别是《勾践灭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以来,更是聚讼纷纭,有从上古时期“养一只豚(猪)远比养几只鸡狗难得多”角度入手,得出“足以证明勾践对‘生女子’的重视”^[2];也有从犬

豚的食用和祭祀作用指出“犬明显要比豚珍贵一些”^[3],勾践“没有违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4];亦有从动物阴阳属性探讨,认为勾践分别奖励是出于犬豚的阴阳属性:犬豚分别对应阳阴,对应男女^[5];更甚者,提出“豚不是猪”^[6]。

诸多纷争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完全对立,但其实多因各执一点、立论片面而致。综合各家看法,联系上古的语言运用、生产生活、民族习性和文化象征等方面,不难探得勾践分别奖励犬豚的真正用意。

一、“犬”“豚”并举之俗

《说文解字·犬部》:“犬,狗之有县蹄者也。象形。”^{[7]473}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县蹄’,盖指猎犬言。南海曾氏刳曰:相犬之法,必验其蹄。凡犬蹄四趾,惟猎犬足上有一趾不履地。此所谓‘县蹄者欤。’”^[8]即是说,“犬”为象形字,特指猎狗。但实际使用中,犬、狗往往浑然无别。《礼记·

收稿日期:2023-12-30

基金项目:台州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变更研究”(TG23440)

作者简介:叶 娇(1974—),女,浙江临海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语言学。

曲礼上》“效犬者左牵之”下孔颖达疏：“然通而言之，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则大者为犬，小者为狗。”^[9]^[1244]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浑言则狗亦为通名矣。”^[10]由此可见，犬特指猎犬，也可泛指各种犬。

《方言》卷八：“猪……其子或谓之豚。”^[11]《广韵·魂韵》：“豚，豕子。”^[12]表明豚是小猪。《说文·豚部》：“豚，小豕也。从古文豕。从又持肉，以给祠祀也。……豚，篆文从肉、豕。”^[7]^[457]进一步告诉我们豚指小猪，但有两种字形，其共同点是都从“肉”（月）。从肉显示出小猪之特点：一是肉肥，二是肉嫩。由此，豚自然就成了祭祀的上品，馈赠的佳品。《周礼·天官·豕宰》：“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郑玄注：“羔豚，物生而肥。”^[13]^[661]《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14]实际语言运用中，豚也可泛指猪，但未如犬狗之浑言不别，泛指时亦专指肥猪、肉猪。

犬和豚是古人较早驯化的家畜，很早就居于六畜（马牛羊鸡犬豕）之列，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加之体型大小相类、不如马牛，又均为杂食，因此犬、豚在语言使用中多相连并举。如《国语·楚语上》：“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1]^[251]《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曹公望权军”下，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胡冲《吴历》“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15]。豚犬连用。

犬、豚可泛指，由此古籍中犬豚之异名连用的不少。犬，别称狗；豚，又称豕、猪、彘等；故文献中颇多犬豕、猪犬、犬彘、狗彘、狗豕连用之例。据方一新、王云路两位先生考证，“上古时期，狗与猪并称，以‘狗彘’为最常见，此外也有‘狗豕’‘狗豨’‘狗猪’‘犬彘’‘犬豕’‘犬猪’等；一般不作‘豕狗’‘豕犬’‘猪狗’”^[16]。

犬（狗）、豚（豕）不仅常常连用，还经常对文出现。如《诗经·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毛传：“三物，豕、犬、鸡也。民不相信则盟诅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鸡。”^[17]又《搜神记》：“《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贾；掘地而得豚，名曰邪。’”^[18]《北史·高丽列传》：“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与豕，豕不食。”^[19]至今对人谦称自己的儿子，还称作“犬子豚儿”，犬、豚对文并举。

语言的使用具有延续性，从先秦到中古，犬与豚或连文，或对文，关系紧密。如此勾践既言到犬，自然易涉及豚，因此这个“豚”绝无可能指比鸭子

肥壮的家禽——鸭豚或是鱼类的河豚^①。

二、“犬”“豚”地位之辨

明确了勾践奖励的物品分别是猎犬和小猪，就可以进而分析勾践心中男女的地位高低了，这也正是学界历来争论的焦点。是男尊女卑，还是重视生女，我们可从当时犬豚的价值和越人习俗入手进行探讨。

（一）犬豚同是先秦重要肉食

犬和豚都是先秦古人重要的肉食来源。春秋战国时期，经常有肉吃的被称为“肉食者”，但一般老百姓只有逢年过节或古稀之后才能享受，所以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20]。鸡、狗、猪被视为同级的供肉食之动物。大约同时代的《周礼·天官·豕宰》，说“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13]^[667]，提出了肉食与主食搭配的膳食模式。《礼记·内则》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足见时人对肉食的合理性已有充分认识，并被大家共同采纳、遵守。

犬豚虽珍贵，但地位逊于牛羊。《礼记·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9]^[1337]这和《礼记·玉藻》“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9]^[1474]的提法完全一致。无故，谓非祭祀与宴享时，对于士而言，犬豕是比较贵重的食物，平时不得食用。

同为士一级享用的犬豕，孰贵孰贱，一直以来颇多争议。有认为犬贵于豕的，多以《礼记》为证。《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食麻与犬。”^[9]^[1373]“仲秋之月”中，也有天子“食麻与犬”的记载，可见周天子对狗肉的钟爱。又《礼记·坊记》说：“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9]^[1622]不坐，谓不能吃其肉，坐其皮，说明只有大夫平日才有可能吃狗肉，反映出狗虽不如羊，但亦非凡品。因此有学者得出：“由此来看，犬是周代贵族祭祀或宴享时的重要食物，贵于豚。”^[21]^[50]汉代枚乘《七发》：“犒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

^① 阳飞前认为“豚”不是猪，而是鸭豚或河豚。参见阳飞前：《从“豚”探究越国的人口政策》，《新课程》（教育学术）2011年第1期。

肤。”^[22]“犒牛”“肥狗”是吴客向没有食欲的太子推荐之美味佳肴，此将“狗”与地位显赫的“牛”对举，可证汉人仍以狗肉为美。

犬也用于祭祀。《礼记·曲礼下》云“凡祭宗庙之礼……犬曰羹献”^[9]¹²⁶⁹，《周礼》中《地官·司徒》载“馗人……掌豢祭祀之犬”^[13]⁷⁵⁰，《秋官·司寇》载“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凡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政治”^[13]⁸⁸²，皆说明周人非常重视祭祀用犬，认为肥狗肉做的羹很美，设馗人专司喂养，设犬人专司相犬牵犬。后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到汉代的祭祀用牲，富者“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芳”^[23]，似乎也证明豕确实列于狗之下。

然亦有认为豕贵于犬的。前举“春行羔豚”“馈孔子豚”等记载明言豚之美味和受人欢迎。同是《礼记》，除记录犬用于祭祀外，书中又有“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9]¹³³⁷。所谓“牢”，《周礼·天官·冢宰》“凡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下郑玄注：“三牲牛羊豕具，为一牢。”贾公彦疏：“一牛一羊一豕一称牢。”^[13]⁶⁵⁶又《左传·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大：即太的古字。）杜注：“太牢，牛羊豕也。”孔颖达疏：“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为大牢，……以羊豕为少牢，以牲多少称大少也。”^[24]¹⁷⁵⁰皆言“牢”中豕不可或缺。豕用于祭祀和朝觐会见，与牛羊等列，其地位不能说不高。

看来，仅从食用和祭祀价值看，先秦人们对犬豚的喜好不一，二者之高低贵贱难以遽断。我们或可联系当时当地越人饲养犬豚的目的再加探析。

（二）越人走犬之风

查检《国语》，及记载吴越历史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发现犬在越国，并非以食用为目的，而是以田猎为主。那个时期，“田犬的勇猛形象常见于史册”“饲养壮犬最大的目的，多是由于攻击敌人、田猎和守护主人”^[25]。

《国语》中，表动物之“犬”共出现6处。除本文讨论例之外，其余5处仅“土有豚犬之奠”句说明犬用于祭祀食用，另4处凸显的都是“田犬”（猎犬）形象。如卷八晋语：“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卷十五晋语：“赵简子田于嬖，史黯闻之，以犬待于门，简子见之曰：‘何为？’曰：‘有所得犬，欲试之兹囿。’”同义的“狗”出现4处，亦未见有食狗之载。《越绝书》中，“犬”共出现12处，无一表食用，皆为田猎之犬。如卷二记载吴王的重

大行动，有“射于郛陂，驰于游台，兴乐越，走犬长洲”^[26]⁹之语。卷八有越王“走犬若耶，休谋石室”^[26]⁵⁹之言，“走犬”谓纵狗行猎。又卷四：“旁军见弱，走之如犬逐羊，靡从部分，伏地而死。”^[26]²⁹卷十：“入门见两釜炊而不蒸，见两黑犬嗥以北，嗥以南。”^[26]⁷³其中卷八所载“犬山者，勾践罢吴，畜犬猎南山白鹿，欲得献吴，神不可得，故曰犬山。……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26]¹⁶¹，更言明越国养犬之目的是为田猎，而养猪之目的则为食用。汉赵晔《吴越春秋》一书亦然，“犬”共出现9处，同样皆为田犬，后世广为流传的“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27]之语（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作“狡兔死，走狗烹”）就出于此书。

联系同时代的《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语：“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28]¹⁰⁰《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29]《吕氏春秋·不苟论》：“田猎驰骋弋射走狗，贤者非不为也。”^[30]均可见犬在先秦时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田猎^[31]。因此有学者指出：“尽管食用犬肉在早期社会里相当普遍，得到犬肉也是人们养犬的不期而期的必然目的，但这却不能如同饲养羊、猪等草食性动物一样，是专为吃肉。”^[32]养犬只是附带成为肉食来源，物以稀为贵，犬肉在当时必然更受欢迎。

犬较之于豚，功能上更胜一筹，越人自然更为偏爱。上举“走犬”诸例，都是君王贵族的行动，也表明犬更为不同寻常。另据学者研究：“当时于越部族过着的是‘人民山居……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刀耕火种的迁徙农业和狩猎业并重的经济生活。狩猎业在越人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较前期加大，狗的作用增强，这必然会促使越人对狗的珍视。”^[33]不仅如此，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骸骨中绝大部分头骨被原始人击破，完整的很少，但唯独狗的头骨，却完全是一种例外。“在15个狗的头骨中，完整的有10个，破开的有5个，但是不像有意打开的，而是沿骨缝脱开的。其它动物的头骨，基本上被击破。”^[34]可见在河姆渡人心中，狗比其他动物更珍贵、更令人崇敬，越人是河姆渡人的后代，应继承了这一遗风。

结合犬豚的食用价值和越人走犬之风，不难看出，越王奖励人口繁衍的政策中，狗是更为上等的奖赏。

三、“犬”“豚”阴阳之说

犬尊豚卑也罢,犬贵豚贱也好,当时或尊卑分明,但今人辨识起来着实不易,不禁疑问,为何勾践不用同样常见、对比更为鲜明的犬和羊,犬和鸡,或豚和鸡来赏赐,而非用犬和豚?

关于此,前贤往往会提及一个观点:犬为阳畜,豚为阴畜。此论源自三国时吴国的韦昭注,韦昭在“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下注:“犬,阳畜,知择人。豚,主内,阴类也。”^{[1]296}即认为勾践选择用犬奖励生男子,用豚奖励生女子和时人的阴阳认识有关。因韦昭注本最早,且保存了不少现已亡佚的古注,所以后人治《国语》者,莫不径取韦注。“犬阳畜豚阴畜”的说法也就历代相沿。

从先秦时起,古人就有狗为阳畜之说。学者李璇、陈开林曾举《礼记·乡饮酒义》“烹狗于东方,祖阳气发于东方也”及《史记·秦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的记载,并辅以严陵方氏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解释,明确指出古人“祈雨时也就常宰杀作为阳畜的犬,用以祭祀,这种风俗直到现在还为一些少数民族所保留”^[35]。不仅如此,秦德公“狗为阳畜,能辟不祥”的做法影响很大,后来演化出的夏至杀狗的习俗,一直在广东一带传承。如清代,《广东通志·风俗》记:“夏至日,擘荔荐祖考,磔犬以辟阴气。”^[36]

后人对犬阳豚阴之说亦多有附会、解析。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十九:“狗阳畜,肾又其阳精之舍。”^[37]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四:“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下注:“豕水畜,其性则属乎阴。豚则豕之未大,所谓阴中也。春行羔豚,则以阴中之气配阳中之气故也。”^[38]明董说《七国考》卷九“伏祠狗御蛊”条:“《左传》云:‘皿虫为蛊’,《汉书解诂》曰:‘狗阳畜也,以狗祭社以辟不祥。’”^[39]现代学者也有将动物加以阴阳分类的,如“从阴阳学说,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的鼠、虎、龙、猴、狗皆五指,而马单蹄也属阳;丑、卯、巳、未、酉、亥属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的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属阴”^[40]。

然而,阳畜阴畜之说在当时的越国并不成立。阴阳学说对国人影响很大,早在春秋时期的《易

传》以及老子的《道德经》都有提到阴阳,但阴阳配物的观念却是出现在汉代。“西汉前期的《银雀山汉简·禁》是目前所见最早将动物分类、物种精华以及阴阳学说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文献。”^[41]《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谈到六畜时,明确说“六畜牛羊,阴也;马犬彘鸡,阳也”^[42],说明早在西汉初年,人们确已试图将动物分类法与阴阳学说结合。但本文讨论的背景是吴越争霸时期的越国,还是春秋时期,而“以阴阳解经,乃汉人习气,似与当时礼仪及越地风俗无关”^{[43]66}。因此,若据韦注或后世观点认定当时已存在犬阳豚阴对应男女的认识,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在那个时代,只能说犬豚易使人联想到男外女内、男刚女顺。吕思勉先生曾对古代乡礼用犬的“理由”做出推测:“古男子多畜犬,女子多畜豕。”^[44]并举《乡饮酒之礼》“其牲狗”,《士昏礼》“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为证。这一说法中的“女子多畜豕”未必属实,但“古男子多畜犬”的说法则比较可信。胡新生总结《仪礼》记录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四种使用犬牲的集体聚会活动,发现全都是只有男子参加的礼仪。“其中从上古射箭比赛演变而来的两种射礼尤其崇尚男性的勇武。……这类礼仪活动中要求使用犬牲,一开始很可能有其特定的宗教巫术方面的用意——通过食犬传递犬类的勇猛属性。”^[45]犬,无论是狩猎还是守门,活动往往在门外,而豚则在家中,这与《周易·家人·彖辞》“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46]发展出的男女有别思想如出一辙。“生男孩之家公家赠之以犬,或因犬能助人狩猎,能守门看家,故以此寄托对男孩阳刚之气的期望,《列女传》载古谚语曰:‘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正是男孩欲其刚强之意。相反,对于女孩则要求其温顺柔美,……《礼记·昏义》云:‘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生女孩之家,公家赠之以豚,或正源于上古这种特殊的礼俗。”^{[43]66}因此,“越王采取的政策显然是以文化传统中的性别观念为指导的,而这一政策的推行无疑又强化了现实中两性差异。”^[47]

四、“犬”“豚”蕴含之异

除去犬豚连用的语言习惯、犬豚的功用之别、男子多畜犬的习俗,作为人类较早畜养的动

物,犬豚不同的文化蕴含更是勾践选用的重要原因。

(一)犬的象征

犬是人类较早驯化的动物,狩猎、追踪、警戒、防御、司守样样在行,是人类的得力助手和亲密伙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勇敢可以说是犬最普遍的内涵,而辟邪除灾则是犬的重要属性。

1. 忠诚勇敢。无论是狩猎的田犬,还是看家护院的守犬,犬都一心一意地忠诚于主人,无惧于凶猛的野兽或侵犯者,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主人效劳。《左传·宣公二年》:“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24]¹⁸⁶⁷说的是赵盾之车右提弥明为救主同昏君晋灵公的猛犬——葵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原本本意是以除掉凶猛的葵衬托提弥明的勇猛,却足见犬的忠勇。同样,《战国策·齐策六》“跖犬吠尧”的典故固然是讽刺狗的不识好歹,却亦见狗对主人的忠心耿耿。反面形象的犬尚且如此忠勇,正面形象的犬更是可歌可泣。屈原《天问》:“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48]少康之犬帮助自己的主人杀死了勇猛的寒浇,与主子合力同心,千古流芳。后代流传的“湿草之恩”“义犬救主”等有关犬忠心护主,甚至牺牲自己的动人故事更是数不胜数。因此,犬在古代一直是忠义的绝对象征。即便如今用于骂人的“走狗”一词,本亦无贬义,指跑得很快的狗,是人类打猎不可或缺的助手。

2. 辟邪除灾。犬还有预兆吉凶、辟邪除灾的寓意。此和前文古人对狗的阳畜之认识密切相关。《礼记·乡饮酒义》载“烹狗于东方,祖阳气发于东方也”^[9]¹⁶⁸⁴可能是“狗为阳畜”说法的滥觞。再加上秦德公二年“以狗御蛊”“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49]的举动,更佐证了“狗为阳畜,能辟不祥”的特性。

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多有有用狗祭风、祭四方以及祛疾的记载。甲骨刻辞:“帝风九犬”“帝于南,犬”“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足见“早在商代,用犬止风,杀犬疗疾、宁四方已经是当时习用已久的风俗和礼仪”^[50]。

虽然勾践时,磔狗免灾、狗血涂门以驱逐不祥的习俗或未盛行,但商周以来的狗祭之风、御蛊之法多少会对越人产生影响。因此,可推断越王选择以犬奖励生男子者,一方面寄托着对将士勇敢忠贞的期许,一方面寄托着复国大业吉祥如意的

厚望。

(二)猪的蕴含

相较于犬给时人的印象是忠勇和驱邪,猪的形象则大相径庭,它是时人眼中的生育之神和家庭圆满富足的标志。

1. 猪是生育之神。猪是较早由野兽转变为家畜的典型,它们适应力强、早熟、繁殖快、产仔多、肥胖丰硕,因而很早就被先民们视作云雨之神、生育之神,象征着生命力和生殖力。“中国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多次发现丰乳肥臀大腹的女性雕像,旁边都有猪龙和猪雕像陪伴,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把猪当作生殖、生育之神来崇拜。”^[51]难怪,叶舒宪在援引巴尔的“肥猪之所以在史前社会受到崇拜,因为在原始信仰中,猪的多产能力和它的肥胖多脂其实是一回事”之后指出,“肥猪以其丰厚的脂肪代表着原始人心目中生命力最强盛、生育力最兴旺的动物,它同人类中执行生养功能的女性——母亲本来就有着神话思维的认同关系。所以,猪龙玉器也好,猪型雕像也好,都不是图腾符号,而是生命和生育的象征”^[52]。

2. 猪是财富象征。同时,由于猪能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富足,猪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家庭经济 and 财富的标志。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居住地的稳定和私有财产的产生,很多和猪有关的汉字就产生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家”——屋内有豕。“无豕不成家”表达出先民对猪的重视,有屋有猪才是完美的家。人们不仅在生前养猪,死后也用猪陪葬,以显示财富实力。“早期先民曾以猪头骨的多寡来衡量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53]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猪骨的化石占到1/3左右,比其他动物的化石都多。到了汉代,又出现了以玉猪陪葬的习俗(玉猪又叫玉豚,或手握,或佩挂)。

猪代表着生育和财富,是女性的标志、家庭的核心,这或许正是勾践选择它来奖励生女的另一重要原因。

结 语

从先秦犬豚并举之俗、犬豚地位之异、阴阳属性之别、象征寓意之不同逐一剖析,清晰可见勾践的良苦用心:犬猛豚蕃,分喻男女,各尽其用。

再结合《国语》原文后面的两句话：“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先言生三人，再言生二人；先言当室者，再言支子；语意皆由重到轻。故“生丈夫”出现在“生女子”前，足证勾践的奖励举措并不违背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符合时人的尊卑之序。“生男奖犬、生女奖豚的规定背后透出勾践的政策固然是男女俱重，但尤其重视男性的蕃育。究其底里，男子才是战争的主力。这是不可不辨的细节。”^[21]⁵⁰

只不过，特殊时期无论生男生女都当奖励，以促进人口繁衍和满足战争需求。清华简第七册中公布的《越公其事》也记载了勾践的休养生息、实施五政之策，关于生育在第29简中有一句“民乃蕃孳(滋)”^[54]，虽简洁却明确点出一切奖励的目的就是尽快增殖人口。至于生男子奖励象征男性的犬，生女子奖励象征女性的猪，自是反映了勾践对男女分工不同、使命不同的清醒认识：男子是战争的主力，女子则是后勤的保障。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非常合理和先进的性别观念：男在外，当忠勇如犬，保家卫国；女在内，应多产如猪，添丁纳福。时至今日，男女分工有了很大的改变，男女平等意识增强，但勾践各尽其用的性别观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韦昭. 国语[M]. 明浩, 辑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2] 陈玉驹. 戏说《勾践灭吴》中的“犬”和“豚”[J]. 中学语文园地, 2003, 22(11): 4.
- [3] 王守田. 犬豚与男女之别[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007(10): 48.
- [4] 余荔莉. 比较豚与犬的地位[J]. 各界, 2017(8): 176.
- [5] 孔德普, 陈致. 犬与豚, 三年与十年: 关于《勾践灭吴》的休养生息政策[J]. 语文学习, 2009(12): 41-42.
- [6] 阳飞前. 从“豚”探究越国的人口政策[J]. 新课程(教育学术), 2011(1): 51.
- [7] 许慎,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8]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武汉: 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 1983: 809.
- [9] 郑玄, 孔颖达. 礼记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及识语): 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10] 洪成玉. 古汉语常用同义词疏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216.
- [11] 戴震. 方言疏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180.
- [12] 陈彭年. 钜宋广韵[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71.
- [13] 郑玄, 贾公彦. 周礼注疏[M]//阮元.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及识语): 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14]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80.
- [15]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 注. 武汉: 崇文书局, 2009: 500.
- [16] 方一新, 王云路. 《孟子》“鸡豚狗彘”并称考: 兼论上古汉语家畜的称举法[J]. 语言研究, 2020, 40(4): 79.
- [17] 毛亨, 郑玄, 孔颖达. 毛诗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及识语): 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455.
- [18] 干宝. 搜神记全译[M]. 胡应麟, 辑. 曹光甫, 校点. 王一工, 唐书文,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218.
- [19]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 1939.
- [20] 赵岐, 孙奭. 孟子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及识语): 下.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2666.
- [21] 侯文学. 《诗经》分题材选讲[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
- [22] 刘高杰. 国学经典集锦[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 64.
- [23] 孙景琛.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杂录编[M].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5: 147.
- [24] 杜预,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及识语): 下.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 [25] 官德祥. 汉文化中“狗”的角色[J]. 中国农史, 2018, 37(5): 90.
- [26] 袁康. 越绝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27] 张觉. 吴越春秋校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277.
- [28] 刘向. 战国策[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 [29] 卢守助. 晏子春秋注译[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7.
- [30] 高诱. 吕氏春秋[M]. 毕沅, 校. 徐小蛮, 标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582.
- [31] 陈鹏程. 犬在先秦社会生活中的功用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犬意象[J]. 焦作大学学报, 2008(1): 36.
- [32] 王利华. 早期中国社会的犬文化[J]. 农业考古, 1992(3): 267.
- [33] 宋达. 试论越人的敬犬习俗[J]. 浙江学刊, 1991(4): 127.
- [34] 魏丰, 吴维棠, 张明华, 等.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9: 104.
- [35] 李璇, 陈开林. 以犬祈雨风俗成因考论[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4(4): 71-75.
- [36] 王国光. 闲话惠州方言俗语[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144.
- [37] 黄震. 黄氏日抄[M]//纪昀. 四库全书: 第70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562.
- [38] 王昭禹. 周礼详解[M]//纪昀. 四库全书: 第91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46.
- [39] 董说. 七国考[M]//丛书集成初编: 第789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383.
- [40] 黄晨曦. 早期中国动物分类的形成和演变[J]. 现代哲学, 2020(4): 159.
- [41] 叶晓军. 中国旅游文化实务教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 301.
- [42] 叶山. 论雀山阴阳文献的复原及其与道家黄老学派的关系

- [A]. 刘乐贤,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92.
- [43]俞志慧.《国语·越语》韦注辨正[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5).
- [44]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28.
- [45]胡新生.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J].文史哲,2009(5):34-48.
- [46]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周易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及识语):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50.
- [47]肖发荣.“男女有别”观念探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9.
- [48]屈原.楚辞[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44.
- [49]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零壹)[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343.
- [50]刘思亮.磔狗与逐疫:先秦时代的防疫记忆[J].自然科学史研究,2020(4):425-438.
- [51]李淑琴.生肖猪的民俗与科学文化艺术[M].北京:金盾出版社,2014:30.
- [52]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5-16.
- [53]殷志强.汉代玉猪与后代仿品[J].收藏家,1996,43(4):20.
- [54]郭洸凡.清华简《越公其事》集释[D].合肥:安徽大学,2018:57.

Differentiation of "Dog" and "Piglet"

—Also on the Gender View Contained in Gou Jian's Fertility Reward Policy

Ye Jiao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fertility reward measures in the famous article *Gou Jian Exterminates Wu*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Among them, the practice of rewarding dogs and piglets respectively for boys and girls has aroused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By identify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gs" and "piglet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rticle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dogs and piglets were both important sources of meat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However, the Yue people kept dogs mainly for hunting, so in their hearts, the status of dogs was higher than piglets. The concept of animal Yin and Yang among which a dog belongs to Yang while a piglet Yin is the habit of the Han people, and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Yue state. Gou Jian's respective rewards are derived from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ogs and piglets, reflecting the different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en and women under the concept of male superiority and female inferiority. Gou Jian's gender perspective also has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oday's society.

Keywords: *Gou Jian Exterminates Wu*; dog; piglet; pre-Qin period; Yue state; fertility reward

新媒体语言中“一言不合就Y”的 语义演变及功能解析

姜海艳

(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体育)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网络热用语“一言不合就Y”就本义而言是“一X就Y”中,“X”的论域局限于“语言或意见相左”的下位变体;当代汉语系统中“一言不合就Y”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从“逻辑意义的顺理承接”到“小化前提、大化结果的反差承接”,再到“意义的无厘头对接”的连续统,而后两种意义是“一言不合就Y”应用中的强势表达。三种意义演变的过程中,“一言不合就Y”从“表义实体”演变为“话语标记”。

关键词:“一言不合就Y”;顺理承接;反差承接;无厘头对接;互文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6

一、引言

当下网络热用语“一言不合就Y”作为构式,有三类用例:

(1)a. 丈夫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开打,妻子忍无可忍直言要离婚。(抖音 2022-10-20)

b. 孩子一言不合就“炸毛”,发火你就输了……(搜狐网 2020-07-11)

c. 一言不合就开打?理由却让人哭笑不得。(上饶网 2020-12-23)

(2)a. 一言不合就遣返!一位美国海关官员告诉你被拒真相。(今日头条 2016-07-27)

b. 一言不合就下架,苹果为何总是伤害中国开发者?(腾讯网 2016-08-05)

c. 英国开了头,欧盟进入“一言不合就退群”时代?(央视新闻 2016-06-25)

(3)a.《篮球印象》之库里一言不合就三分雨,他是名副其实的投篮机器。(腾讯视频 2020-07-16)

b. 一言不合就开飞,原来你是这样的《九州天空城》……设计很飞、人物会飞、剧情转折更是飞。

(新浪网 2016-07-20)

c. 一言不合就吃面,拿什么来拯救除了颜值全是槽点的老九门……不过小豆子最想吐槽的还是一直在煮面的丫头!!!(粉丝网 2016-07-06)

(1)组是传统用法,“一言不合”中的“言”指“言语,说话”,“一言不合”是分析型的(整体意义可通过成分意义推出)。(3)组“一言不合”与“言”的任何意义都无关,完全不在言说论域里,是综合型的。比如(3)a,“一言不合就三分雨”,这里根本就不涉及任何言说行为及言说内容,“一言不合就……”与“动辄……”“动不动就……”意义相近。(2)组语义介于(1)(3)之间,不是完全的不可分析,也不是完全符合语义推理,语义的“综合”已初见端倪。以(2)c为例,英国退群(即退出欧盟)的原因,和“言语不和、意见相左”是有关联的,但又不能简单归因,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综合型的“一言不合就Y”。

“一言不合就Y”语言现象一经产生,便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孟祥英(2017)认为“一言不合就Y”是修辞构式,表达言说者的主观态度、主观情感^[1];张东平(2021)认为“一言不合”宜当作一个

收稿日期:2023-08-10

作者简介:姜海艳(1979—),女,吉林吉林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语义。

副词来看待,有语义焦点后移的作用^[2];汪晨(2017)^[3]、赵中丽(2017)^[4]、唐璐敏(2018)^[5]、乔杉(2018)^[6]等探讨了“一言不合就X”构式化机制,指出其语义的泛化。然而,对于从语料的动态时间流变中观察其语义如何由具体到泛化,从而成为引出话题的话语标记,学者们较少关注。本文要探讨的主要有四个问题:“一言不合就Y”构式的上位语义来源;“一言不合就Y”语义演变系统;从综合型“一言不合就Y”标记性强弱看其语法化的程度差异;互文视角下,看“一言不合就Y”特殊语用功效。

二、“一言不合就Y”与“一X就Y”

“一言不合”,语出唐·李颀《别梁锲》:“抗辞请刃诛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一言不合龙额侯,击剑拂衣从此弃。”诗中本义“一句话说得不得投合就……”,后发展为一个成语,传承到当代汉语。就最初的使用情况来看,“一言不合就Y”可以看作是“一X就Y”中,“X”论域局限于“语言或意见相左”的下位类型。

“一X就Y”,学界研究已经比较透彻。吕叔湘(1980)最早认为它表示一种动作或情况出现后紧接着发生另一种动作或情况^[7];之后相继有许多学者在吕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或补充、或深入。笔者综合施关淦^[8]、邢福义^[9]、王弘宇^[10]、王光全^[11]等研究成果,将“一X就Y”的表义系统归纳如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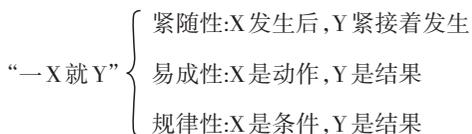


图1 “一X就Y”的表义系统图示

我们赞同王弘宇和王光全的观点,认为时间上的“紧随性”是第一性的,是最基本的语义关系;“易成性”“规律性”都是由“紧随性”衍生出来的。“易成性”可以简单概括为:动作X,很容易产生结果Y;而“规律性”亦可概括为:条件X,一般会产生结果Y。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动作—结果”“条件—结果”,统称为“原因—结果”。

“一言不合就Y”,因为其中的“X”的论域已经限定为“言语或意见相左”,而这个前件可以理解为“动作”或“条件”,“Y”表示“动作”或“条件”下的

结果,整个句式仍可表示上位语义表达式“一X就Y”意义系统中的三种意义,前后件逻辑上可以统称为“因果关系”。当代新媒体语言中“一言不合就Y”在语义演变中又产生了“一X就Y”所不具备的语义,正是这种语义上的新变化,使它成为备受新媒体追捧的热用语。

三、“一言不合就Y”从“表义实体”到“话语标记”

“一言不合就Y”可以看作由“常项(一言不合就)+变项(Y)”两部分构成^①。我们认为在常项与变项意义的关系上,“一言不合就Y”经历了“逻辑意义的顺理承接”到“小化前提、大化结果的反差承接”,再到“意义的无厘头对接”的语义演变的连续统。

(一)逻辑意义的顺理承接

(1)a. 丈夫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开打,妻子忍无可忍直言要离婚。(抖音 2022-10-20)

b. 孩子一言不合就“炸毛”,发火你就输了……(搜狐网 2020-07-11)

c. 一言不合就开打?理由却让人哭笑不得。(上饶网 2020-12-23)

其中的“开打”“炸毛”,无论从时间的紧随性上,还是从因果的推理上,都是“意见相左、言语不合”的最直接的影响和结果。这是“一言不合就Y”,最原初用例所表现出的“逻辑意义顺理承接”。我们可以将上述三个例句用“因为……所以……”替换成a'、b'、c',意思基本不变:

a'. 丈夫和妻子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吵架,大打出手。

b'. 孩子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大哭大闹发脾气。

c'. 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开打。

笔者在百度网页上搜索的前150个例句中,表示这种原初意义的用例,仅有3例,占1/50。原

^① 我们观察到的语料基本都带“就”。但是的确存在个别缺省“就”的用例,比如“一言不合三分雨”。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其中的“就”是不可简省的。因为整个格式的上位格式是“一X就Y”,其中“一……就……”已经相当于一个心理完形,所以形式上缺省“就”,靠语义去强行补充,理解上是有困难的,至少要多费心力;而且少了“就”,也缺少了对结果“Y”的强化作用,故而我们全文统一格式,都写作“一言不合就Y”。

因在于“一言不合就Y”在WCA(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爆网事件之后,已经逐步发生变化,而正是这新变化下的应用,激起网友用它来表达的强烈欲望,成为目前“一言不合就Y”应用中的强势表达。

(二)小化前提、大化结果的反差承接

(2)a.一言不合就遣返!一位美国海关官员告诉你被拒真相。(今日头条 2016-07-27)

b.一言不合就下架,苹果为何总是伤害中国开发者?(腾讯网 2016-08-05)

c.英国开了头,欧盟进入“一言不合就退群”时代?(央视新闻 2016-06-25)

在(1)组例句所示的“一言不合就Y”原初意义中,常项与变项有逻辑上顺理成章的推演,而(2)组例句三个用例中,我们很难将出国人员的“遣返”、苹果手机的“下架”、英国的“退群”(即退出欧盟),简单地归结为“语言的不合,意见的相左”,其背后都有很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但当说话人把这些复杂的原因简单归结到“一言不合”时,非但表达上简省给力,而在“小化”原因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大化”(即彰显)了“遣返”“下架”“退群”(即退出欧盟)等后果,在一小一大的反差中引起了人们对话题本身的关注。我们仍可用“因为……所以……”做替换:

(2)a'.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被)遣返!一位美国海关官员告诉你被拒真相。

b'.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下架,苹果为何总是伤害中国开发者?

c'.英国开了头,欧盟进入“因为一言不合,所以就退群”时代?

替换后常项、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也勉强站得住脚,但已十分牵强。以(2)a'为例,“遣返”的原因跟“出国人员”与“海关官员”之间的“语言冲突”没有实质上的关系,肯定是因为不符合海关的某些政策。可见此中常项“一言不合”的意义已经开始模糊化。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语义的“小化”,还是“大化”,都给这个句式本身注入了主观色彩,为句式意义的下一演变,埋下伏笔。

(三)常项、变项意义的无厘头对接

(3)a.一言不合就三分雨,勇士用投篮打爆你篮球观!(新浪网 2020-05-29)

b.一言不合就开飞,原来你是这样的《九州天城》……设计很飞、人物会飞、剧情转折更是飞。

(新浪网 2016-07-20)

c.一言不合就吃面,拿什么来拯救除了颜值全是槽点的老九门……(粉丝网 2016-07-06)

d.股市每日谈:一言不合就大涨?A股让你怀疑人生……(网易 2017-06-22)

e.呵呵!一言不合就高温,重庆你敢不敢再任性点!(搜狐网 2016-06-09)

f.一言不合就发福——对待偶像“加粗”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圳晚报》2016-08-05)

g.PS一言不合就更新,这些新功能你值得拥有——闲言少叙,直接进入正题。(搜狐网 2016-06-29)

h.一言不合就送礼,LG G5&G5 SE分分钟带你去狂欢——迎来八月盛夏,LG全网通4G手机LG G5和LG G5 SE购机欢乐送再度升级!(中关村在线 2016-08-04)

i.一言不合就调剂,服与不服见智慧。(搜狐网 2016-07-23)

如果说(2)组三个例句中的“一言不合就Y”中常项所表示的原因已经“模糊化”“主观化”,但至少我们还可以从句子中断定,常项、变项之间保留着因果关系;考察一下第(3)组例句,我们已经很难再说“一言不合就Y”中常项、变项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存在。以(3)a为例,“一言不合”与“就三分雨”,联系后续小句我们可知,作者只是想说,勇士队在这场比赛中投了很多三分球,最后赢得比赛,跟两队之间是否有“言语冲突”或“思想冲突”没有任何关系。再如(3)d作者只是想说A股可能要大涨,股市起伏不定;但这跟股民与“管理层”的语言或思想上的矛盾也毫无关系。原因是什么已经“不可推知”,确切地说“也不必要推知”,只想借助这个形式,告诉读者结果怎样(所谓“结果”,严格地说就是“新信息”)。可见,此中“一言不合就Y”中常项中“言”的意义已经从“模糊化”变得虚无缥缈,无迹可寻,即已经“虚化”。

Schiffirin(1987)从功能、语义、句法、分布、语音等五个方面给出了话语标记界定标准^[12]:功能上具有连接性;语义上具有非真值条件性,即话语的有无不影响语句命题的真值条件;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即话语的有无不影响语句的句法合法性;语法分布上具有独立性,经常出现在句首,并且不与相邻成分构成任何语法单位;语音上具有可识别性,可以通过停顿和调值高低来识别。根据原型范畴理论,五方面都具备的是话语标记范畴中的

最好事例。

(3)g中的“一言不合就更新”,“更新与否”跟公司与消费者之间是否有矛盾一点关系没有,只是想引出话题“更新”,告诉大家PS有更新;(3)h“一言不合就送礼”,只是商家的营销宣传,用“一言不合就Y”来引出话题“送礼”,告知大家买LG G5 SE会配送很多东西,吸引消费者购买。因此,(3)组例句中“一言不合就Y”从意义上看,已经虚化,具有“非真值性”;从分布上看,(3)组9个例句,除了(3)d有个总括性的标题——股市每日谈、(3)e有语气词“呵呵”,其他“一言不合就Y”全部出现在句首位置,形式上的连接功能都是存在的。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即使不是“最好事例”,这个意义上的“一言不合就Y”也是话语标记中的一员,而这种话语标记性功能在下面例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按照语法化的观点,此时“一言不合就Y”已经成为话语标记。

(4)一言不合就告白,一言不合就抱抱,一言不合就亲亲,一言即合也亲亲。开场8分钟就亲亲,12分钟就告白,一个小时亲了八九次简直够了。wuli卡米亚简直可爱炸了,男友力max。(豆瓣电影 2016-06-05)

此帖中连用几个“一言不合就Y”,构成排比句式,引出话题,意在指明此电影中男女“卿卿我我”的场景太多。值得注意的是“一言不合就亲亲,一言即合也亲亲”,说白了就是“言语不投合就亲吻”“言语投合也亲吻”,就是说结果的“亲亲”与否,与前面的条件实现与否,毫无关系。用“一言不合就Y”只是以轻松、幽默、引人注目的句式,引出下面的话题。

(四)标记性的强弱

以意义的虚化程度作为标准,(3)组9个例句中,表义又存在差异。其中(3)a-c例句,表示变项“Y”的动作或事件出现的频率高;(3)d-f组例句,表示变项“Y”的动作或事件出现得太突然,变幻莫测,让人意想不到;而(3)g-i组例句,我们分析

不出任何意义,只是为了引出话题,是纯粹的话语标记。至此我们可以给出“一言不合就Y”表义系统,见图2。

其中A义严格对应“一X就Y”的“紧随性”。B义,笔者认为“小化前提、大化结果”,在一小一大、“因”小“果”大的“反差”对比中,突出了“一X就Y”的“易成性”。C义比较复杂,其中“频率高”,从“次数多”意义上看,不妨看作是“一X就Y”表义中“规律性”的正向应用;而“意想不到”,跟“一X就Y”表义中的“规律性”有关联,但却是“反规律性的”,因为如果是“规律性”,就可以说“可想而知”了。从A义“逻辑意义的顺理承接”到C义中分析不出任何意义的“话题为Y”,语言结构“一言不合就Y”的性质发生质的变化,即从“表义实体”演变为一个“话语标记”。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意义并非“有你没我”的取代关系,而是在共时平面同时存在着的。然而,就语言应用广泛性来讲,地位是不平等的。就义源来看,A义(严格对应“一X就Y”的紧随义)是最根本的、最原初的意义,也是B义、C义的基底意义;但从应用层面来看,B义、C义因其特别的表达功能,成为目前为止这一构式的强势用法。

(五)三种意义的演变动因

新媒体语言有其轻快、轻巧、轻俏的特点(谢波,2009;段亚辉,杨娟,2003)^[13-14]。媒体受众在获取资讯的同时,也希望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或者说以轻松、愉悦的方式获取新闻资讯。在这个背景下,媒体人若想迎合受众,在保证表义准确的前提下,倾向于选择一些新鲜、幽默、生动的词语或句式。

前文我们也分析过,“一言不合就Y”的A义,是“逻辑意义的顺理承接”,和B义、C义比较起来,表义客观而中规中矩,媒体语言中用例较少;B义,是“小化前提、大化结果的反差承接”,表达上“简省给力”“一小一大的反差中引起人们对话题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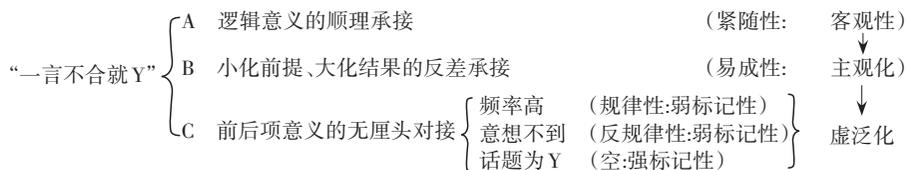


图2 “一言不合就Y”的表义系统图示

的关注”;C义,是“前后项意义的无厘头对接”,形式上保留着因果关系,意义上却是毫无相干,这种接续方式是“无厘头”的,然而又是有“策略”的:读者深知,作为新闻资讯,这“无厘头”的背后,肯定还是有“有厘头”的渊源,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又像“诱敌深入”。

图2“一言不合就Y”的表义系统的A型和B型,因为意义还保留着上位意义“意见不合、言语相悖”,故而作为结果形式出现的“Y”基本是“开打”“遣返”“退群”等消极语义倾向的;但是当语义演变为C型,“一言不合”已经成为一个引入话题的“噱头”。当“一言不合”在线性序列上出现的时候,读者的心理预期仍然是“消极”倾向的:后面会有什么糟糕的结果呢?而“Y”的出现,从“意想不到”的反规律性承接到完全无厘头对接,读者的消极心理预期被这种反差和无厘头翻转,无论是“开飞”“吃面”,还是“三分雨”“亲亲”,只要不是实质上的矛盾和冲突,都给读者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语义上实现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化,语言形式也从具有实在意义的语言结构,变成了无实在意义的话语标记。

所以“一言不合就Y”(主要是B义、C义),是轻、巧、俏的:轻,来自句式本身简约,表达得简省;巧,来自“策略”性;俏,是基于表达的经济性与策略性无缝接合所产生的美感。

四、语篇互文理论视角下,

看“一言不合就Y”的语用功效

互文,传统语言学认为是修辞术语。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结构主义和批评理论影响下,“互文”开始被引入宏观语篇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法国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5]互文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

我们仍以(3)组例句进行分析。前文我们已经分析(3)组9个例句中,“一言不合就Y”均有强弱不等的标记性,这9个例句同时也全部为网络时评的标题。以篇章语言学的角度视之,把这9个标题分别看成一个文本,结构可以表示如图3(S代表sentence,即句子)。

S1	S2
一言不合(就)Y	具体阐述
一言不合就二分雨	勇士用投篮打爆你篮球观!
一言不合就开飞	原来你是这样的《九州天空城》。
一言不合就吃面	拿什么来拯救除了颜值全是槽点的老九门。
.....

图3 “一言不合就Y”的文本结构例示

这个文本可分为S1、S2两部分,其中S1由“一言不合就Y”构成,而S2由另一个意义相关句子构成。只用S1可以吗?显然不行,如果我们读到报纸或时评的标题是“一言不合就三分雨”“一言不合就开飞”“一言不合就吃面”,我们完全不能确定这则新闻要说什么内容:“三分雨”是什么样的“雨”?言语不合为什么要“飞”?直到我们读了S2时才明白,“三分雨”是指勇士队在这场比赛中投中很多的三分球;“一言不合就开飞”是指电影《九州天空城》里面有很多人物在天空“飞”的场景。那么只用S2可不可以呢?如果一则新闻的标题是《勇士用投篮打爆你篮球观!》《原来你是这样的《九州天空城》》,“篮球观”是怎样被“打爆”的?“这样的篮球观”是“怎样的篮球观”?上述表义是不清楚的,而且也没有了“三分雨”“开飞”(开始飞)“吃面”(总是有吃面的场景)形象、生动、诙谐的表达效果。

新闻的标题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够准确生动地提炼新闻事实,二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很显然,如果单说S1,无法“准确生动地提炼新闻事实”;单说S2,无法很好地“引起读者的兴趣”。而S1、S2互相搭配,正好两点要求全部满足,这正是互文理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的典型事例。

五、结语

网络语言一般轻松、诙谐、形象、生动,较少桎梏而富于创新。而“一言不合就Y”最原初的意义,在WCA(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爆网事件的刺激下,演化出意义的主观化、意义的无厘头对接,这样就非常适合广大网友甚至大众新闻媒体用它来表示轻松、诙谐又形象、生动的意义。归根结底,这是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娱乐是大众最现实、最广泛的需要。语言上的表征是,微博、微信、QQ空间上,大家在表义明确的前提下,倾向于用一些轻松感、幽默感强的词语或句式。“一言不合就

Y”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广泛应用,这就不容我们因为它是网络用语、通俗而欠缺规范,就对它视而不见。在正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汲取网络语言的优秀部分,这才是语言研究的客观态度。

参考文献:

- [1]孟祥英.“一言不合就XY”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演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6):121-130.
- [2]张东平.基于语料库的“一言不合就VP”构式的历时理据研究[J].语言文字学术研究,2021(22):13-14.
- [3]汪晨.汉语网络用语“一言不合就X”构式的认知动因分析[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17.
- [4]赵中丽.“一言不合”的话语功能[J].绥化学院学报,2017(8):81-84.
- [5]唐璐敏.网络流行构式“一言不合就X”的认知语用研究[D].上海:上海理工大学,2018.
- [6]乔杉.流行语“一言不合就X”探微[J].汉字文化,2018(16):110-111.
- [7]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99-600.
- [8]施关淦.用“一…就(便)…”关联的句子[J].汉语学习,1985(5):18-22.
- [9]邢福义.前加特定形式词的“一X就Y”句式[J].中国语文,1987(6):457-467.
- [10]王弘宇.说“一A就C”[J].中国语文,2001(2):134-140.
- [11]王光全.也论“一X就Y”结构[J].汉语学报,2005(3):13-19.
- [12]SCHIFFRIN D. Discourse maker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1-41.
- [13]谢波.网络时代我国新闻语言的特点[J].新闻世界,2009(6):122-123.
- [14]段亚辉,杨娟.论网络新闻标题的语言特点[J].新闻与写作,2003(6):40-42.
- [15]祝克懿.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J].当代修辞学,2010(5):2.

The Semantic Evolution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Expression "Yiyan buhe jiu Y" in New Media Language

Jiang Haiya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slang "yiyan buhe jiu Y" (一言不合就Y) can be seen as a subordinate variant of the expression "yi-X jiu-Y" (一X就Y) where the domain of "X" is limited to "language or differing opin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the meaning of "yiyan buhe jiu 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continuous progression from "logical and coherent connection" to "minimizing premises, maximizing outcomes, and contrasting continuation", and then to "absurd and incongruous juxtaposition of meaning". The latter two meanings represent the dominant express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yiyan buhe jiu Y".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of semantic evolution, "yiyan buhe jiu Y" has transformed from a "semantic entity" to a "discourse marker".

Keywords: "yiyan buhe jiu Y"; logical and coherent connection; contrastive continuation; absurd and incongruous juxtaposition; intertextuality

由匏到卮：合卺之礼的神圣信仰与礼制内涵

张露雨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 匏爵是中国神话时代的产物,蕴含着以“葫芦崇拜”为核心的原始信仰和祭天祈禳的巫术思维。由匏爵到卮爵的嬗变历程,揭示了周代巫术传统的祛魅与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合卺之礼”的建构则体现了古人倡导“以和为贵”、遵循“九五”天道以及类比宇宙秩序的礼制内涵,可以此管窥中华礼乐文明的历史渊源及民族精神。

关键词: 匏爵; 卮爵; 合卺之礼; 神圣信仰; 礼制内涵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7

早期人类以物化和可视的方式确认个体在社会及宇宙中的地位,反映了先民富有生活体验性的生存状态。在“由俗入礼”的古代中国,大量饮酒器具的制作与使用彰显了“道在器中”的人文内涵与礼制精神,同时蕴含着人类世界从混沌走向秩序的历史记忆。匏爵承载着古代中国的民俗风情、神话信仰、礼仪制度和道德风尚。由匏爵到卮爵的发展脉络,揭示了从神话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巫术性格的祛魅与人文精神的跃动。然而目前学界对匏爵与卮爵的研究多集中在文物考古和婚俗研究两个方面,缺乏对二者的关联性及其文化内涵的考察。追溯匏爵的演变历程,探幽合卺之礼的神圣信仰与制礼依据,可涵泳先民寓道于器的生命智慧,进而增进对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理解与认同。

一、匏爵的神话因素及社会功能

匏爵是早期人类活动的物质产品,储存着远古时代以葫芦神话为核心的原始信仰。葫芦生子的神话传递着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与生殖崇拜的思维,构成了先民探索宇宙创世奥秘的深刻记忆。同时,葫芦也成为凝聚着神话智慧的物质载体,寄

寓着世代民众祈求福祜的执着期望。由此,大量以葫芦为材质甚或仿造葫芦形制而成的匏爵风靡云蒸,在古人的宗教仪式和社会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 葫芦神话的核心要素: 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是葫芦神话最为关键的要素。首先,葫芦创生说的建构是先民解释人类来源的基点,如《诗经》中“绵绵瓜瓞,民之初生”^[1]¹⁴⁸以小匏瓜的繁殖比拟周民族的绵延,正是葫芦创生神话的鲜活写照。除了葫芦创生说,伏羲和女娲是中国神话中甚为古老的创生神,二者与葫芦的关系亦脉脉相通。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指出,“伏”字作“包”,“包”“匏”音近古通,其义即为葫芦;而“女娲”又称“媧媧”,以音求之,实即匏瓜,故伏羲与女娲,二人皆谓葫芦的化身^[2]¹¹¹。可见,被视为人类始祖的伏羲和女娲,实际上也是古人葫芦创生观念的延续。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葫芦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中具有一定意义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好些民族都有起源于葫芦的神话,葫芦被当作祖先的来源看待。”^[3]以葫芦为原型的创生传说在古代中国神话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这种历史基因仍延续至今,如20世纪80年代的动画片《葫芦兄弟》便是此说的当代产物。

其次,由于肚大多籽的特征,葫芦成为古人祈

求多子的观念投射物。类比思维是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出发点,葫芦肚大滚圆的形状容易使古人联想到女性的孕肚,正如刘尧汉先生指出,“葫芦就象征母体,葫芦崇拜也就是母体崇拜”^[4]。继而,葫芦多籽自然与孕育多子产生关联,如《开元占经》引《黄帝占》曰:“瓠瓜星明,则……后宫多子孙。”又引《星官制》曰:“匏瓜,天瓜也。性内文明而有子,美尽在内。”^{[2]111}也就是说,古人以物及人,将葫芦的肚大多籽与女子的怀孕多子联系起来,并通过葫芦的崇拜,寄托子孙繁衍的愿望。这种思维模式体现了浓厚的图腾崇拜色彩和同类相生的巫术痕迹,反映了古人生殖崇拜的原始智慧和绵延后嗣的担当意识。

(二) 匏爵的神圣功能:祭天祈禳

早期人类将世界分为神圣与凡俗两个区域,并通过举行仪式沟通天神,酒爵则是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礼器。考古发现,在距今六七千年的西安半坡原始母系氏族公社遗留下来的陶器中,已出现了葫芦形容器,它完全仿照自然物葫芦做成,可供盛水等之用^[5]。可知早在先夏时代,已有仿造葫芦形制而制作酒爵的历史记录,这种陶制的葫芦形酒爵即谓陶匏。另《周礼·考工记》:“有虞氏上陶。”郑注:“舜至质,贵陶器。”^{[6]1248}《礼记·郊特牲》:“器用陶匏。”^{[7]927}可见陶匏不仅出现时间早,且承担着祭天祈禳的神圣功能,是先民“以器礼神”的生动演绎。

陶匏祭天何以可能?以其效仿天地淳朴之德性也。《礼记·郊特牲》记周天子巡守祭天之礼曰:“天子适四方,先柴。……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7]927}孔疏谓:“祭天之器,则用陶匏。陶,瓦器也,以荐菹醢之属。……匏酌献酒……祭天尚质,故酌亦用匏为尊。”^{[7]894}也就是说,在祭天仪式中,陶匏除了用作酒器,还兼具食器的功能,相当于荐物的瓦豆。《诗经·生民》谓:“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孔疏:“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气始上行,上帝则安居而歆飨之。……大古之羹也,不调以盐菜,以质,故以瓦器盛之。”^{[1]1265}可见神祇歆享无味之羹,故以质素瓦豆配之。正如何休解《春秋公羊传》祭天之礼曰:“稿席玄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瑑,大羹不和,为天至尊,物不可悉备,故推质以事之。”^[8]用草席、清水、陶匏、璞玉、白羹之类器物侍奉神灵,以明其至尊尚质之性格。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曰:“陶匏是太古之器,历夏殷周……先儒

不言有饰,盖陶者资火化而就,匏乃非人工所为,皆贵全素自然,以象天地之性也。”^{[9]328}孙希旦亦曰:“天地之性,本无可象,但以质素之物,于冲穆无为之意为稍近,故用之以祭。”^{[10]689}实际上,不论是充当酒器或是食器,其核心之义均在陶匏之效法自然、质朴无文的特性,故得以取象天地淳素之德,进而取悦神灵以求福祚。

除郊祭之外,匏爵还具有禳灾纳吉的巫术功能,是禳祭典礼上沟通神灵的重要礼器。涂尔干将此类仪式称为“禳解仪式”,并指出该仪式含有赎罪的观念,是在不安或悲伤的状态下举行的^[11]。禳解仪式是先民天人交感思维的产物,蕴含着古人告慰神灵以祛厄禳灾的原始信仰。《春秋左传》载:“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则水旱疫疠之不时,于是乎祭之。”^[12]祭即祈求神灵消除灾祸的禳祭,通常在发生了旱涝等天灾或日月食等异象时举行。《周礼·春官·鬯人》记祭酺之祭曰:“鬯人掌共秬鬯而饰之。凡祭祀……祭门用瓢斝。”郑注:“瓢,谓瓠蠹也。……取其瓠,割去柢,以齐为尊。”^{[6]602}也就是说,以百家之门为单位举行禳解仪式时,要使用不加郁金香调和香味的鬯酒,且以匏爵作为酒器,以“取质略之意”^{[6]602}。另外,《诗经·公刘》记载周部落首领公刘率领民众迁居豳地,并在燕飨群臣的落成仪式上“执豕于牢,酌之用匏”^{[1]1311}以明“忠敬”“俭质”^{[1]1312}之意,可见匏爵已具有承载人伦观念的凡俗功能。

概而言之,匏爵是早期中国以生殖崇拜为核心的葫芦神话的产物,寄托着先民祈求多子多福的心愿。延续着视葫芦为祥瑞的集体记忆,先民创造了大量模仿葫芦形状的匏爵,并根据其古朴简质的特性赋予其祭天祈禳的神圣功能。这种功能携带着神话时代的巫术色彩,同时孕育着古人观念中由敬鬼神向重人事转化的趋势。

二、由匏到卮:巫史传统的祛魅与人文精神的觉醒

中国的巫史传统从“家为巫史”的原始状态发展到“绝地天通”的时代,已具有规范化和专职化的倾向,又经周公制礼作乐,遂完成了该传统的理性化过程。李泽厚指出,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

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政治—伦理体制,使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13]。实际上,由匏爵到盃爵的演变历程,正镌刻着中华文明“由巫到礼”的岁月痕迹,彰显了周代以“礼”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觉醒。

(一)合盃而醕:巫术思维的秩序化

盃爵是周代礼制文明创造的婚礼酒器,同时也是由匏爵(见图1)演化而来的历史产物。孙希旦曰:“盃,以一匏分而为二,夫妇各用其半以醕,而合之则实为一匏,故云‘合盃而醕’也。”^{[10]1418}又孔颖达曰:“‘合盃而醕’者,醕,演也。谓食毕饮酒,演安其气。”^{[7]1090}可见盃爵(见图2)就是将同一个葫芦从中间破开而成的两个酒爵,夫妇各持一半润泽口齿,以使气息安定,此即谓合盃之礼。



图1 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匏爵^{[9]328}



图2 表面刻有婚神的盃爵^[14]

实际上,合盃之礼是远古巫术传统向周代礼乐文明嬗变的混合物,体现了由巫到礼的过渡性质。盃爵取法葫芦形制,以其二合为一拟象男女交合之状,正是古人同类相生观念的投射。古人通过饮用合盃酒模拟男女交合的状态,从而赋予新婚夫妇以阴阳交好、多子多福的祝颂。这种以相似律

为基础的“模拟巫术”^[15]正是周人生活中神圣性的呈现,同时以礼数规范的形式将其纳入社会运行的轨道,使之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更具秩序化和理性化的礼仪制度,从而凸显了礼乐文明时代人文精神的涌动。

合盃之礼涉及共牢同食、祭祀祖祢、主宾酬酢等一套繁复的礼仪,展现了周代婚礼仪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仪礼·士昏礼》记载,夫家欲亲迎妇时,要预陈饌食及“四爵两盃凡六,为夫妇各三醕。一升曰爵”^{[16]82}。周代酒爵“以小为贵”,一升之爵属于周礼“五爵”系统中最高规格的饮酒器,通常要在重要场合才可使用。此一盃与一爵容量相当,可见周人对婚礼的重视程度以及礼器搭配的严格态度。及妇至成礼时,夫妇在寝门内进食并以黍稷和肺祭祀祖宗神灵。“三饭,卒食。”^{[16]95}三次进食结束后,夫妇取酒爵漱口,前两次均用一升之爵,且第一次需答拜赞礼之人,第二次则不再答拜。“三醕用盃。”^{[16]96}最后一次则用盃爵漱口,此时也不答拜。三醕之礼毕则礼成,以示成妇之义。

(二)夫妇同体:礼仪制度的人文性

合盃并不简单是男女结合的象征,更是古人夫妇同体观念的物化。在以男权统治为主导的古代社会,女性缺少独立的社会地位,如《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7]950},正是女性附庸于男性的历史记录,同时也揭示了双方休戚与共的生存境遇。《礼记·昏义》曰:“共牢而食,合盃而醕,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孔疏:“以体同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7]1889}又孙希旦曰:“合盃而醕,合体之义;共牢而食,同尊卑之义。”^{[10]1418}可见经由合盃之礼的“阈限”^[17],女子将由“在家从父兄”过渡到“既嫁从丈夫”,并与丈夫荣辱与共的生活状态。合盃仪式的举行意味着女子走出闺房,正式被纳入社会运行的基本轨道,虽然本质上仍附属于男性,但与丈夫同体尊卑却显示着女性地位在有限范围内已有所提高。

以盃爵展示夫妇同尊卑、共荣辱的社会意识,是周代社会制度的缩影。杨文胜等人从考古学视角指出:“合盃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社会现象,女性贵族身份地位有了一个质的提高。这标志着贵族家庭婚姻制度及财产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显示社会基本构成由大家族向核心家庭转换。”^[18]也就是说,伴随着合盃仪式的举行,周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正呈现出一种趋势,即以夫妻为中心的

家庭逐渐取代以宗族为中心的家族。故夫妻一体的观念实际上体现了周代社会组成单位的变迁以及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昏则同牢合罇,终则同穴,祭则同几同祝饌,未尝有异庙者也。”^[19]这种夫妇同体的观念凸显了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组织在周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展示了周代礼仪制度的人文性。

综而观之,由匏到罇的嬗变历程揭示了周代文明由巫到礼的历史记忆。男女合罇而酌的仪式是原始巫术思维的秩序化呈现,也彰显了礼制文明下夫妇同体的人文精神。合罇作为一套精密的礼仪被时人积极践行,体现了周人思维的理性因素,同时蕴含着时代所赋予的礼制内涵。

三、合罇仪式的礼制内涵 与哲学关怀

合罇仪式的制定有其内在规约性,体现了周代将人伦价值和天道依据相结合的礼制内涵。“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10]¹⁴⁶⁸礼以“顺人情之大窳”^[7]⁸²⁶体现了礼制建构的伦理关照,同时,效仿天道也成为周人制礼作乐的根本准则。而礼制建构更深层次的旨趣,则指向古人以阴阳二气为理论基础,将宇宙秩序符号化以建构人间秩序的哲学关怀。

(一)人伦价值:倡导以和为贵

合罇之礼展现了周代礼乐文明“本人情性”^[7]¹²⁸⁹的伦理精神。礼乐传统是周人制定礼仪的文化背景,“礼”和“乐”通常对举出现,但二者实有细微差别,正如《荀子·乐论》“乐和同,礼别异”^[20]就揭示了礼尚殊别而乐主睦和的不同宗旨。“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7]¹²⁶⁴,为了避免出现“若乐过和同而无礼,则流慢,无复尊卑之敬。若礼过殊隔而无和乐,则亲属离析,无复骨肉之爱”的社会问题,故“须礼乐兼有,所以为美”^[7]¹²⁶⁵。而合罇之礼倡合异姓之好,正是礼乐相须的生动写照,体现了“礼之用,和为贵”^[21]的人伦精神。

首先,合罇而酌的仪式寄托着古人倡合两性之好、祈愿琴瑟和鸣的美好祝颂。制罇之匏本为《周礼》“八音”^[6]⁷¹⁴之一,可作乐器以谐律吕;又“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

也”^[7]¹⁸⁸⁸,婚礼是合男女之好以供奉祖祢和传承后代的基础,故曰:“共牢合罇,使之相亲”^[7]¹⁸⁹⁰。可见合罇之礼具有使夫妻亲和的意义。周代禁止同姓通婚,通过与血缘疏远的异姓建立姻娅关系繁衍后嗣,即《礼记·郊特牲》所谓“取于异姓,所以附近厚别也”^[7]⁹⁴⁹。又如《礼记·礼运》曰:“夫妇和,家之肥也”^[7]⁸²⁹“礼义以为纪……以和夫妇”^[7]⁷⁷¹,孔疏:“夫妇异姓,故言和,谓亲迎合罇之事”^[7]⁷⁷²,故以合罇之礼倡夫妻亲和,体现了周代礼制关注家庭和睦、重视文明传承的伦理价值。

其次,合罇之礼蕴含着告诫新婚夫妇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肃穆箴言。《诗经·匏有苦叶》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毛传:“匏谓之瓠,瓠叶苦不可食也。济,渡也。”^[1]¹⁶³用于制作罇爵的匏瓜味道苦涩,而夫妇共执苦匏、同饮苦酒的行为则寄托着双方同甘共苦的意识。此外,匏还具有相当于“腰舟”^[22]载人渡河的功用,夫妇各执一匏以行酌,正象征着同舟共济的承诺。又郑玄曰:“瓠叶苦而渡处深,谓八月之时,阴阳交会,始可以为昏礼,纳采、问名。”^[1]¹⁶³瓠瓜成熟之日,乃是象征着阴阳交汇的成婚佳日,于此时举行庄严繁复的合罇仪式,意味着行礼双方将以夫妻身份为单位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夫妇同心同德的担当精神。

(二)天道依据:遵循九五之道

合罇之礼体现了古人以数字建构天道规律的象数思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作《易》八卦,以垂宪象”^[23]是古人探索宇宙奥秘的出发点;而“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7]⁸²⁴则内化为古人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念,并指导人们依据天道规则建构人间礼制。

夫妇合罇而酌的礼制根植于《周易》“九五之道”,象男女秉中正美德而相遇合。《周易·姤卦》曰:“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24]²¹⁹王弼以“枸杞”释“杞”,《子夏传》以“匏瓜”释“包瓜”^[24]²¹⁹,孔颖达采两家之言,并曰:

杞之为物,生于肥地;匏瓜为物,系而不食,九五处得尊位而不遇,其应是得地而不食,故曰“以杞包瓜”也。“含章,有陨自天”者,不遇其应,命未流行,无物发起其美,故曰“含章”。然体刚居中,虽复当位,命未流行,而不能改其操,无能倾陨之者,故曰“有陨自天”,盖言惟天能陨之耳。……“中正”者,中正故有美,无应故“含章”而不发,若非九五

中正,则无美可舍,故举爻位而言“中正”也。“志不舍命”者,虽命未流行,而居尊当位,“志不舍命”,故曰“不可倾陨”也。^{[24]219}

“姤卦”的卦形为“䷫”,巽下乾上,象“风行天下,则无物不遇”^{[24]216},故《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24]216}王弼注:“施之于人,即女遇男也。”^{[24]216}可见姤卦即象征刚柔交会、男女相遇。又第五为奇数,属六爻之阳位,姤卦九五为阳爻,正居阳位,故此爻“得正”,意味着“事物的发展遵循正道、符合规律”^{[25]43}。且九五阳爻居上卦中位,故此时“持守中道、行为不偏”,符合“刚中之德”,即谓“中正”^{[25]43}。姤卦九五爻象匏瓜虽得生于肥沃之地,但却因味苦而无法食用,故称“得地而不食”。此时正如男子虽持守刚健之道,但却因命未流行而尚未遇见幽贞之女,故谓“处得尊位而不遇”。然而此时虽尚未相遇,男子也不能改变内心操守,应保持“体刚居中”的志向,含藏中正之美以等待天命流行之时与所求女子遇合。正如黄寿祺、张善文所说:“九五刚中居正,内含章美,以此求遇……大得‘相遇’之道。《程传》:‘又其内蕴中正之德,充实章美……则无有不遇所求者也。’”^{[25]499}实际上,此爻展示的是求遇的过程,强调男女双方持守中正之德、顺应天命流行以求遇合,正与儒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相符。而合卺仪式亦象夫妇双方合体欢好、共担职责,正与“以杞包瓜”所揭示的九五中正之道相契,体现了“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慎,礼之制也”^{[7]1271}的礼制精神。

(三) 哲学关怀: 类比宇宙秩序

合卺之礼揭示了古人以阴阳二气解释宇宙秩序的类比思维,蕴含着古人对生命运行以及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沃格林指出:“神和人、世界和社会,构成一个原初的存在共同体。”^{[26]40}人们切身参与这个四元结构共同体,同时“通过创造各种符号……尝试使本质上不可知的存在秩序变得尽量可知”^{[26]44}。人们把社会秩序体验为宇宙秩序的有机部分,并通过宇宙类比的方式对社会秩序进行符号化,从而使社会变成一个与宇宙秩序“合拍”的小宇宙。夫妇合卺的礼制规范正是古人追溯宇宙来源与类比宇宙秩序的符号化进程。

匏爵是古人追溯宇宙生成过程的“具象物体符号”^[27]。在古代中国,盘古是第一位创世神,“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28]222}。盘古创世说是古人探索宇宙生成之谜的原初答案,然盘古神话亦与制卺之匏密切相关。闻一多指出:“槃即

剖匏为之,‘槃瓠’犹匏瓠。”^{[2]112}又刘尧汉谓:“槃转为盘,瓠转为古;由槃瓠转为盘古。”^{[28]223}可见盘古实乃匏瓜的别称。《太平御览》引《三五历记》载:“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29]宇宙之初处于混沌状态,至盘古开天辟地,阳气上升为天,阴气下沉为地,天地始得形成。这种以阴阳二气解释天地生成的哲思反映了古人思维抽象化的趋向。

阴阳二气是古人将宇宙生成过程符号化的产物,而合卺之礼倡合男女之好则是调和阴阳以延续人文的制度尝试。“一阴一阳之谓道”^{[25]700}，“阴”与“阳”是古人类比宇宙秩序的基本符号。《周易》载:“刚柔即阴阳也。论其气即谓之阴阳,语其体即谓之刚柔。”^{[24]347}又孔颖达曰:“天地若各亢所处,不相相遇,则万品庶物,无由彰显,必须二气相遇,乃得化生。……若刚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24]216}阴阳交感乃能化生万物,正如男女相遇而人伦兴化。卺爵一分为二,男女各执其一而酌,正象阴阳交汇而天地化生之状。由此可见,以夫妇合卺的礼制类比天地生成的原理,正是古人与宇宙秩序保持合拍的符号化表达。

概而述之,合卺之礼揭示了以和为贵的人伦精神,承载着对新婚夫妇琴瑟和鸣、同心同德的美好祝愿。同时,合卺之礼的建构根植于《周易》九五天道,体现了古人倡导男女双方秉持中正美德而相遇合的中庸精神。此外,夫妇合卺的礼制也传达了古人将宇宙秩序符号化以安排人间秩序的哲学思辨。实际上,“天垂象,圣人则之”^{[7]932}的宇宙观念仍存在于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而后世婚俗的交杯酒也正是周代合卺之礼的转化与延续,彰显了礼乐文明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

结 语

匏爵产生于早期中国以葫芦崇拜为核心的神话信仰,是先生殖崇拜观念的物质载体。由于古朴质素的特征,匏爵被赋予了祭天祈禳的神圣功能,反映了古人社会生活的巫术色彩。至周公制礼作乐,周代社会实现了巫术传统的祛魅与人文精神的觉醒。而由匏到卺的嬗变过程,则承载着周代文明由巫到礼的历史痕迹。根植于礼乐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周人倡导男女秉持九五中正之

德而相遇合,建构了一套以合卺之礼为代表的婚姻制度。合卺之礼的制定不仅揭示了以和为贵的人伦精神,同时体现了古人遵循天道的生命智慧与探秘宇宙的哲学关怀,具有广博精微的礼制内涵。探微由匏到罍的青萍之末,为打开尘封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代中华文明之门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参考文献:

- [1]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闻一多.伏羲考[M]//闻一多.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 [3]钟敬文.葫芦是人文瓜果[J].民俗研究,1996(4):30.
- [4]刘尧汉.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M]//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219.
- [5]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39.
- [6]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7]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8]公羊寿,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11.
- [9]聂崇义.新定三礼图[M].丁鼎,孙蕴,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22.
- [10]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1]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38.
- [12]左丘明,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35.
- [13]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41.
- [14]钟漫天.合卺之礼:《中华婚俗文化》[J].艺术设计研究,2017(2):28.
- [15]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9.
- [16]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7]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7.
- [18]杨文胜,王芳,殷睿.从“北鸡无辰”到“共牢合卺”:由考古学统计资料看东周女性贵族社会地位之变迁[J].江汉考古,2020(168):83.
- [19]托克托.宋史[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45.
- [20]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382.
- [21]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
- [2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44.
- [23]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53.
- [24]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26]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M].霍伟岸,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27]王小盾.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3.
- [28]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29]李昉.太平御览[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81.

From Gourd to Nuptial Cup: the Sacred Belief and Connota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of the Wedding Ceremony

Zhang Luyu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Jue made of gourd, a product of Chinese mythology, contains primitive beliefs centered on "gourd worship" and witchcraft thinking of praying to the heavens. The transmutation process from the gourd to the nuptial cup reveals the enchantment of the witchcraft tradition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dding ceremony reflect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tiquette system advocated by the ancients to "value peace", follow the "Ninth Five-Year Plan" heavenly way and analogize the cosmic order,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nat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ritu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gourd; nuptial cup; wedding ceremony; divine faith; connotation of etiquette

普惠金融视域下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管理的 SWOT分析

陈力扬, 彭明旭

(台州学院 商学院,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普惠金融网格化管理是建立在行政共同体基础上的网格化管理平台,由银行和基层村镇合作建立普惠金融服务站,为网格内的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让客户平等享受金融资源。路桥农商银行通过在网格中设置普惠金融服务站,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将银行的基本产品和服务输送到每个网格客户,着力形成普惠金融新的服务模式。文章通过不同银行间的比较,采取SWOT分析方法来研究路桥农商银行在网格化金融管理方面的优势、困境和路径,进而提出加强人才培养、提供个性化服务、强化营销活动等措施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网格化;路桥农商银行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8

一、引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政府多次发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性文件。推进普惠金融,客户覆盖率低是开展业务的最大问题。银行人员和客户之间的信息连接存在障碍,难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提供适合的服务,特别是自身金融资源极其有限的区域,无法满足客户对金融的需求,而这些地区正应该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场地。

近年来,普惠金融服务提供的服务种类日益多元,服务覆盖面也越来越广。而现代智能技术在普惠金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网格化管理的思维被运用到金融服务管理上^[1]。银行与区域政府合

作,通过综合网格化管理平台,能够将区域按照不同的作用划分成不同的网格,针对不同的网格精准定位和工作,准确满足网格内客户的金融需求,推动银行自身业务的智能转型,并且能够借助该形式实现精准化扶贫^[2]。网格化让金融服务能够更好地落实到每家每户,区域之间金融服务的密度和流动性通过网格化客户信息的统计大大提高^[3]。其中,2015年路桥农商银行建成了全国首个社区银行网格化管理平台,根据经济情况和产业集群将全区分为5大板块355个网格,取得了巨大成功,其“路桥经验”引得全国各地银行学习效仿^[4]。

本文在调查路桥区各家银行网格化管理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以路桥农商银行作为样本,阐述其网格化管理的效果,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基本情况、业务量和业务成本。通过SWOT分析法,对其所处的

收稿日期:2023-1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数字贸易时代知识产权价值链的演进机制与升级路径研究”(21BJY055);浙江省高校科研一般项目“基于PSR模型下小微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路径和政策研究”(Y202249734);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结构经济学视域下台州小微金融服务经验研究”(22GHB0)

作者简介:陈力扬(1991—),男,浙江台州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普惠金融;彭明旭(1979—),男,福建泉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普惠金融。

宏观环境、竞争压力、行业状况等进行分析,得出其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从而探索网格化管理的突破点和路径。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以路桥农商银行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网格化管理和社区银行相结合的形式,分析路桥农商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困境,提出网格化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努力使其对银行同业机构具有参考意义。

二、网格化管理的理论基础

网格化的概念来源于信息技术领域,通过网络技术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为人们提供更多服务。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地方性行政管理体制,它基于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数字化管理平台,把地方行政区域按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不同的单元网格,以加强对单元网格上的主要部件和特殊事件的巡视为内容,通过区域网格化综合管理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整体区域功能联动的新型区域管理方式^[5]。网格化管理应该具备业务管理的精细化和部门联动的整体性。网格化管理模式推动着社会治理从单一被动向综合联动的方向发展^[6]。

随着网格化管理在实践过程中成效的逐步显现,网格化管理模式也在各地纷纷开展。不过,在开展的过程中,注重网格分配而忽略网格化管理的内涵,致使政策发生变异,使得网格化管理的功能散化,增加了人力资源成本、管理费用,最终导致管理系统的流程性降低^[7]。网格化管理工作仍需摸索改进,建立系统化的规章制度,让银行能够开展有效的网格化管理^[8]。网格不仅是一种新的信息技术,更是一种管理工具,将其应用到流程银行的变革中将为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转变提供一种全新的尝试^[9]。

三、台州市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管理的现状

(一) 路桥金融网格化管理的基本情况

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发展普惠金融”

确立为国家战略。同年,浙江的部分农商行将“网格化”概念和做法引入银行经营管理中,路桥区就是主要代表。路桥区政府搭建的网格化管理平台,建立了动态数据库,整合了路桥区实有人口信息,优化了政府和社会的资源。

路桥区域内银行机构主要有路桥农村商业银行、台州银行和泰隆商业银行等20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20家金融机构均不同程度地开展网格化金融服务工作,并将网格化金融服务工作与助农扶贫、普惠金融工作相结合。路桥区的大部分金融机构设置了网格化金融服务工作站,采用“自有员工+网格员”模式配备金融管理网格员,派驻网格员使金融机构与社区对接,做到“村村到人,格格到人”,做好金融服务管理工作,让金融资源不足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同等的金融服务。各银行机构积极协作,参与政府机构网格化服务,有利于更有效地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结合路桥区各网格调查数据和已有的各职能部门数据库中的专业数据,构成覆盖整个政府职能部门数据网格化管理支撑系统的重要基础数据库。这些数据代表了各个家庭的实际状况,金融机构可以根据网格内的数据精准工作,为客户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做到“格格有服务、户户有账户、人人有业务”。本文选取路桥区10家银行,对其网格化金融账户和金融服务工作站的开设情况进行统计,见表1。

(二) 路桥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

1. 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基本情况。路桥农商银行现下辖20家直属支行,47个营业管理网点,其中有29个城区网点、18个乡镇网点。为了方便网格化服务工作的开展,截至2021年12月,该行在路桥区10个街道、乡镇共开设了137个普惠金融服务站,其中包含“助农服务点”47个,“红色丰收驿站”90个,弥补了传统营业网点在乡村地区的空缺,有效实现基础金融全覆盖、金融需求全对接。例如路桥区横街镇泉井村,2018年前当地村民缴水电费,需到几公里外的相关部门办理手续。金融服务点的缺乏直接导致村民生活便捷度较低。从2018年开始,路桥农商银行陆续设立的普惠金融服务站,使村民只需到家门口的“红色丰收驿站”,花几分钟时间就能够完成缴费手续。通过“红色丰收驿站”里的“丰收e家”系统,村民还可以进行自助存取款、养老金查询等。至此,路桥区小微企业和村民才真正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便捷金融服务。

表1 路桥区各金融机构网格化金融账户和金融服务工作站的开设情况(部分)

金融机构名称	是否开通网格化金融账户	是否设立金融服务工作站
路桥农商银行	是	是
中国工商银行路桥支行	是	否
招商银行路桥支行	是	否
中国农业银行路桥支行	是	是
台州银行路桥支行	是	否
平安银行路桥支行	是	是
泰隆商业银行路桥支行	是	是
邮政储蓄银行路桥支行	是	是
中国建设银行路桥支行	是	是
浙商银行路桥支行	是	是

自2015年起,路桥农商银行便逐步完善与升级村级公共金融便利店,因地制宜、择优选点,在路桥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集成多项惠农业务,如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等,将自助服务平台“政务E站”投放到“红色丰收驿站”,可办理政务事项369项;配备助农专用终端、助农POS机、ATM机等辅助配套服务设施,提供常规的小额存取款、缴费充值、转账汇款等金融服务。服务点位遍布全区10个镇(街道)、96个村(社区),实现“十分钟服务圈”全覆盖。“红色丰收驿站”奋力打造金融服务与政务审批融合的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创新“政务E站”“丰收e家”、手机银行等各项线上基础信息应用服务,畅通普惠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普惠金融服务站的业务量。路桥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办理较多的业务是水电费代缴、存取款以及代收快递等。每月业务量从几笔到几百笔,业务金额从几十元到数万元不等。截至2021年12月,路桥农商银行的“红色丰收驿站”组织参与的党员群众活动累计1600余场次,办理政务信息服务共计10万余件次,服务党员群众20万余人次。同时,为了扩展农村基层信贷业务,“红色丰收驿站”的驻点人员利用自己对基层村镇底子清楚、情况明了的信息优势,每周固定“一日+两晚”主动上门免费为基层小微贷款企业和农民客户审核评定授信发放额度。截至2021年12月,路桥农商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户数14831户,贷款金额159.37亿元。同时针对成长型企业推广“小微快捷贷”,实现“一次上门授信、三年循环使用、网银秒借秒还”,签约客户457家,签约金额

4.34亿元。

3. 普惠金融服务站的业务成本。路桥农商银行设立的普惠金融服务站,是由原有的惠农通服务点升级改造而成,充分利用了原有设备,降低了成本投入。因此,目前各个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固定成本主要是门面装修及电子设备投入。由于网点人工成本高,自动柜员机投入大且维护费高,网点和自动柜员机的业务成本相对较高;普惠金融服务站开展业务的成本比网点人工和自动柜员机都要低,见表2。从业务成本角度来看,路桥农商银行对普惠金融服务站的成本投入是符合效益的,但由于目前服务站总体业务量少,仍未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 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路桥农商银行属于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现有下辖的20家支行、47个营业网点,是路桥区域内“金融服务覆盖最广、支农力度最大、创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银行内部有计划财务部、运营管理部、授信管理部、零售业务部、合规风险部等部门。截至2021年12月,路桥农商银行已在全区村镇超市、卫生室等地设立“助农服务点”47个,在全区中心村人口和服务业集聚地区建立便民电商金融超市银行“红色丰收驿站”90个,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家门口的金融服务。路桥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的设置情况,见表3。

路桥农商银行自2005年成立以来,一贯秉承“支农支小”的稳健经营理念,推出“百晓服务”“金融网格化管理”等新项目,全面推广“普惠信用贷”“小微快捷贷”等新产品,在支持“三农”和小微经

济方面赢得了广泛认可。路桥农商银行在全市各乡镇近16家金融物理网点建立了移动银行用户号,实现了辖区村镇网络全覆盖,为区域居民提供优质、便捷、安全的银行金融服务;同时建立移动金融平台与区域基层政府间的有效衔接沟通,提升了基层政府快捷管理移动银行综合平台运营及服务管理效能,并规范移动银行服务管理水平。2021年路桥农商银行集成一平台四系统,最终实现金融“数字化、专业化、精准化、敏捷化”,打造了一个“网格数智金融大脑”系统,让我国普惠金融集成供给保障体系里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数字网格化平台在将全区划分为村居、商品市场、企业等355个网格单元的基础上,导入了小微企业智能评级、百晓智贷工厂、家庭资产池画像等创新应用服务功能,构建出一个基于个人、家庭、单元区域等为等级划分的层级视图单元数据的区域共同富裕标准体系,实现基本信息数据全方位展示、金融信息和服务功能的精准化对接。

四、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管理的SWOT分析

台州在小微金融服务领域有3家标杆银行,分别是台州银行、泰隆商业银行和民泰商业银行,其中台州银行和泰隆商业银行均发起于路桥区。可见,路桥农商银行所处区域的竞争激烈。本文选取这3家本土银行的发展情况,与路桥农商银行进行比较分析。

(一)优势分析

1. 员工个人能力较强。从表4可知,截至2021年12月,在人均管理资产规模方面,路桥农商银行人均管理资产远高于同期上述3家本土城商银行。在人均管户方面,路桥农商银行员工高于台州银行和泰隆商业银行,但低于民泰商业银行。

2. 贷款覆盖率较高。在整个台州市,路桥农商银行贷款户数不及3家城商行,这是因为路桥农商

表2 路桥农商银行开展业务各渠道成本调查

渠道	服务方式	服务时间	成本/(元/笔)
网点	人工	8小时/天	3.8
自动柜员机	自助	全天	3.2
普惠金融服务站	人工	灵活安排	1.9

表3 2021年底路桥农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站情况

街道/乡镇名称	人口数量/人	社区或村/个	普惠金融服务站/个
路南街道	54 719	19	15
路桥街道	72 705	20	21
路北街道	66 199	23	9
螺洋街道	51 925	23	9
桐屿街道	30 983	29	15
峰江街道	53 357	34	18
新桥镇	35 736	19	9
横街镇	37 520	21	9
金清镇	115 882	32	18
蓬街镇	88 034	51	14
合计	607 060	271	137

银行不能跨区域经营。如果只在路桥区内比较,截至2021年12月,路桥农商银行在路桥区的贷款覆盖率居全区第一,见表5。特别是路桥区每10户家庭中有9户得到路桥农商银行授信,每5家企业中有2家得到该行授信,路桥区一半以上村集体获得该行2亿元的信贷支持。

3. 形成了客户市场“保护网”。截至2021年12月,路桥农商银行路南支行已经通过网格化管理平台授信13个村,包括李家村、洪洋村、古岙村、上马村、石曲村等,同时开展了对张李村、肖王村、肖谢村、应家村的整体评议。通过李家村等5个村的实践,共新增签约近1 883户,授信2 316户,网格授信覆盖面达到55%。其中洪洋村整村授信贷款已签约195户,授信220户,对已授信客户基础信息建档面达100%,网格授信覆盖面达57%,覆盖面已取得了不错成效,稳居路桥区第一。当银行只有零散的客户时,其他竞争对手就容易抢夺市场;但若银行有整村的客户群体,对手想抢夺市场

就会比较困难。因此当整村客户都成为路桥农商银行存量客户后,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就会形成巨大的“保护网”。当其他银行来抢夺市场时,就会遇到阻力,从而让路桥农商银行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竞争,站稳市场。

(二)劣势分析

1. 规模效应不足。表6展示了台州银行、泰隆商业银行和民泰商业银行3家金融机构与路桥农商银行存款余额比较情况。2010—2020年,台州银行、泰隆商业银行和民泰商业银行3家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比值增长较大,增长最少的民泰商业银行也提高了5.15%。这是由于它们除了在台州市区域内经营,还在台州市之外区域设立分支机构跨区域经营。在此期间,路桥农商银行存款余额比值仅提高了0.2%,是因为该行只在路桥区域内经营活动,基本没有跨区域经营,存款规模效应不足。

表7展示了台州银行、泰隆商业银行和民泰商业银行3家金融机构与路桥农商银行贷款余额比

表4 2021年底台州本土4家银行资产情况比较

项目	路桥农商银行	台州银行	泰隆商业银行	民泰商业银行
总资产/亿元	457.21	3 718.55	3 769.53	2 373.23
全行员工/人	712.00	11 581.00	11 347.00	7 167.00
人均管理资产/万元	6 421.48	3 210.90	3 322.04	3 311.32
台州市贷款总额/亿元	334.01	840.31	616.59	616.59
台州市贷款客户/万户	5.44	36.64	16.93	26.57
台州市户均贷款/万元	40.40	22.93	36.42	28.50
台州人均管户/户	76.40	34.13	59.30	149.22

表5 2021年底台州本土4家银行贷款覆盖率比较

项目	路桥农商银行	台州银行	泰隆商业银行	民泰商业银行
路桥区贷款覆盖率/%	9.60	6.71	4.48	2.26

表6 台州4家本土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比较

金融机构名称	2010年底 存款余额/亿元	2010年底占全市 存款余额比/%	2020年底 存款余额/亿元	2020年底占全市 存款余额比/%
路桥农商银行	96.66	2.69	307.43	2.89
台州银行	436.11	12.15	2 075.10	19.52
泰隆商业银行	321.84	8.97	1 799.59	16.93
民泰商业银行	251.64	7.01	1 292.62	12.16

较情况。2010—2020年,路桥农商银行的贷款余额比值下降了0.15%,而台州银行、泰隆商业银行和民泰商业银行3家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比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这种差异现象实际上也是由于路桥农商银行并非跨区域经营,因此该行与台州银行、泰隆商业银行、民泰商业银行这些跨区域经营的金融机构相比,贷款规模效应依然不够明显。

2. 普惠金融服务站业务量少。普惠金融服务站的业务交易量较少,需求过低。普惠金融服务站成立的原由在于农村地区金融供给不足,希望以此提供更多金融服务到村镇,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但目前却出现了劳动力外流,留守老人和儿童没有太多金融需求的局面。一些村镇服务站点很少有客户来申请贷款,且因农村征信体系不健全,很多申请人不符合银行的贷款条件。这样的情况下,业务量太小,服务站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未能形成银行的利润增长点。

3. 管理制度存在不足。普惠金融服务站是将银行金融业务延伸到农村,获得新的有效客户的路径。各个金融机构都大力建设服务站,路桥农商银行也不例外,但是在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之后,并没有重视对服务站以及站点工作人员的严格管理。服务站的经营者多是当地的村民,他们不具备专业的金融储备知识,缺乏对服务站的金融了解和业务掌握。银行也没有及时地对普惠金融服务站的经营进行适当的金融基础知识、业务操作能力和风险预估能力的培训。这种轻视管理的状况导致了服务站深层业务搁置,普惠金融和惠农支农相结合的金融服务未能展开,惠农产品和支农服务等惠农金融产品难以推广。

由于银行人员缺乏“下沉定价”意识,网格化管理常常流于形式,偏离本质目标,导致功能作用难以得到发挥。同时,大量人员处于乡村基层,造成更加高昂的成本负担。客户经理是网格化管理

功能的核心,因此培养客户经理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尤为关键;但是相应报酬未能同步增长、工作压力大、综合能力不强等问题,使得网格化管理功能的实现遇到很大阻碍。

(三) 机会分析

1. 市场前景广阔,增长潜力巨大。如表4—表7所述,路桥农商银行虽然存在规模不足的情况,但是如果考虑路桥农商银行只是在路桥一个区域开展业务,其存款和贷款在路桥区的市场份额分别为19.48%和19.67%,十年内分别提高了1.64%和5.77%,远远超过其他城商行,可见路桥农商银行扎根深、发展快,且其客户覆盖广。未来如果继续精耕细作,做好网格化管理,不仅能确保其区域内领先地位,还将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2. 金融助富项目的唯一试点。“十三五”期间,路桥农商银行形成了“普惠、网格、政银”的助农惠农服务形象,收获了11万户家庭、近40万客户的服务样本,赢得了“百路千桥·家喻户晓”的口碑。2021年8月,路桥区开启的“红色数智金融助富工程”,是路桥区“六金”强村特色工作之一,计划通过三年的奋斗,明显提升路桥区金融供给能力,推动普惠金融向前迈进一大步,加快实现路桥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目标。路桥农商银行因在普惠金融方面的突出成效,成为此次金融助富项目的唯一试点。

(四) 威胁分析

1. 识别目标客户难度大。网格化服务的开展基于精准的扶贫,但对目标客户的识别较为困难。路桥农商银行识别目标客户时有规定的工作流程,严格审核相关信息资料,并将所有贫困户信息录入网格化管理平台系统中。路桥农商银行通过这一系统精准对接信息,但随着近年来路桥区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留守老人的金融信息收集困难,使得本地贫困户的识别更加困难。对于在外地的贫困户,除了统计困难外,信息发生变更时也不

表7 台州4家本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较

金融机构名称	2010年底 贷款余额/亿元	2010年底占全市 贷款余额比/%	2020年底 贷款余额/亿元	2020年底占全市 贷款余额比/%
路桥农商银行	71.14	2.33	215.04	2.18
台州银行	284.26	9.30	1 689.08	17.11
泰隆商业银行	213.16	6.98	1 663.01	16.85
民泰商业银行	157.32	5.15	1 181.45	11.97

能及时做出调整。这就导致真正贫困的客户难以通过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金融服务来发展自身从事的农牧业项目。网格化服务还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和作用。

2. 金融机构间竞争压力大。金融机构业务系统不统一,客户信息资源无法共享,使银行对首次建起业务关系的客户都要进行识别,导致金融机构识别工作不断重复,浪费了社会资源。与此同时,随着区域网格化工作的推进,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精准扶贫,竞争更加激烈。这也导致路桥农商银行除在基层农民和小微市场面临竞争外,其他客户资源也受到了争抢。总之,路桥农商银行开展网格化金融管理工作的竞争压力较大。

五、优化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管理的建议

(一)加强人才培养

1. 优化劳动组合。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网点效率考核标准。根据《路桥农商银行2022年支行、网点分层分类及机构管理办法》对部分存在问题的网点进行改造,优化劳动组合,释放人力资源。根据实际需要将网点人员调配到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岗位。同时将原有的柜员岗位工作性质和内容进行调整,实行弹性排班制度,让考核绩效低的柜面人员在完成柜面业务后,参与普惠金融服务站的营销业务工作。经过网点的改革建设,领导岗位要竞聘上岗,提拔考核绩效高、能力强、营销能力突出的人员,选拔优秀人才到普惠金融服务岗位开展工作,使优秀员工引领普通员工,带动普惠金融服务站日常业务的快速发展,提升服务网点的整体金融服务和营销水平。

2. 开展网格员金融知识培训。要对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开展定期集训和不定期金融业务知识培训,将培训常态化,把学习金融业务变成日常工作,巩固和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站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普惠金融服务站工作人员综合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各项惠农政策更好地落实到位。在普惠金融服务站的日常管理中,管理员应该鼓励员工在网格内积极开展营销业务工作,通过与基层乡镇的密切联系,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站的服务规模,发挥普惠金融服务站便

捷的优势。

3. 落实下沉,实现精细化管理。许多网格管理人员缺乏“下沉定格”意识,加上互联网金融的强势入驻,导致路桥农商银行流失了许多客户,形势严峻。必须落实人员配备向下沉,遵循“定格、定员、定岗、定责”原则,做到村村入网、人人进格、以网定编、以格追责,实现从单一的贷款向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转变。同时,要定期进行精细化的员工考核,对未能达标的网格人员进行岗位调换。

(二)提供差异化的个性服务

1. 打造不同特色的普惠金融服务站。普惠金融服务站要结合该网格内的所有业务的实际运行情况,确定网格内客户的重点需求和金融潜力,从而让服务站根据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推广金融信贷产品,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精准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根据网格内的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某项业务;盘活存量,不断增加有效户和新增有效户的数量。以上方法对于扩大和发展服务站的业务具有重大作用,服务站的人员必须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2. 分层维护网格内的目标客户。由于各普惠金融服务站所在区域不同,客户情况差异较大、客户数量较多,及时跟进、更新、增补、维护客户信息工作确实有一定困难。相较于新增客户而言,存量客户的活跃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在银行已留存一定的信息量。了解、分析并提炼关键信息,包括账户的日均存款、交易流水、账户性质、综合积分、签约信息和客户的年龄、居住地址、客户行业等;同时,也可通过客户留存的信息搜索客户的社交平台账号进一步了解客户喜好。这些关键信息有助于对客户进行初步判断,分层归类和后续沟通。盘活网格内的客户,可按照短信、电话、面谈三个方式和阶段,分层开展。

(三)强化营销活动

1. 开展“厅堂接待日”活动。普惠金融服务站的成立通过查访乡镇村周边经济业态及客户需求,丰富自身金融和非金融服务功能,发挥服务站在“能互动、有温度、信任感”层面的优势,将服务站打造成村社体验互动共享中心,从而树立银行特色服务品牌。为有效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站业务的开展,可以通过推出“厅堂接待日”活动,培养服务站管理人员的综合服务能力,结合业态引入自带流量的商户,提升厅堂人流量,搭建银行自有的

非金融服务场景,丰富服务站非金融服务功能,增强客户对服务站的黏度,重塑服务站价值。通过“厅堂接待日”活动,以盘活银行现有资源、激发服务人员潜能、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等维度为基础,形成客户问题需求库,并指派给分管该客户的服务人员,由该服务人员负责追踪,尽最大可能满足客户需求。同时,强调服务人员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高服务素养,通过“吸引人流—认识客户—建立信任—业务推广”模式,形成服务品牌的良性循环。

银行依托“厅堂接待日”这一平台,利用厅堂物理空间和就近网点资源,在每月固定日期搭建个人专属“活动主场”,以自身管护客户为基点,覆盖存量客户和潜在客户,提供系列精准的服务,培育客户金融需求,从而形成个人服务“标签”。

首先,要合理安排人员。各服务站应结合厅堂客户流量规律及业务类型特征,以协商的方式明确每名服务人员“厅堂接待日”的固定日期,强化该日期的个人“标签”属性。人员配置多的站点可以进行分组,采取两人一组或者三人一组的形式,每组一人牵头开展活动。其次,要拟定主题。服务人员要结合客户熟悉度,从客群的健康、娱乐、喜好、见闻等需求维度对客群进行盘点,寻找共性需求,分类匹配活动主题,要做到活动内容围绕主题、不重复、有新意。同时为确保活动质量和延续性,可根据不同客户群体开展特色主题活动。最后,要盘点资源。要结合客户需求,利用好行内外各方面资源,如各类合作商户衍生资源、客户经理自身和行内拓展的资源、跨界借势等,不断寻求外部合作,也可与自带流量的第三方商户合作,将流量引入厅堂,共享各行业的资源。

开展活动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包括主题确定、活动策划、人员邀约、材料准备、活动彩排等;活动时流程要连贯,要让客户融入活动互动环节,既不受冷落,也不感到疲劳;活动后要持续跟进客户,及时了解客户满意度及需求,加强客户维护,对有意向客户保持跟进频率。同时,汇总活动成果,统计签到人数、出席率,登记客户信息及有效信息情况,通过营销管理平台评估活动成效,及时建立客户台账、形成客户信息库。

2. 加大宣传力度。以网格划分为依据,在各网格内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置宣传台,给客户讲解基础的金融知识,提高客户的金融意识和金融风险

防范能力;向客户发放宣传单,讲解普惠金融服务站的业务活动,使其逐步了解并信任站点,建立起与客户沟通的桥梁,以便日后开展更多的业务。同时,要真正把普惠金融服务站打造成为路桥农商银行的便捷银行,除了满足站点客户的基础金融需求外,服务站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上传到农商行,由农商行在网格化金融服务中完成。

六、结语

路桥农商银行发展网格化金融管理的运行机制基于资源的网格配置、流程的客户导向、信息的共享优化以及组织架构的扁平化。

本文以路桥农商银行为例,从普惠金融视角出发,探讨路桥农商银行的网格化管理的基本情况,通过分析路桥农商银行网格化管理措施的成效及不足,寻求网格技术和网格化管理的新视角和新维度,促进网格化在银行管理中的创新。路桥农商银行的网格化管理仍然处于发展阶段,需要银行工作人员探索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断推动网格化的发展完善。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路径,但这只是初步的逻辑构思,具体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去证明。

致谢:感谢魏若梦的建议和帮助。

参考文献:

- [1]张玲晓.“网格批量授信3.0”打造融资畅通新范本[J].中国农村金融,2020(12):85-86.
- [2]胡彦分.网格化营销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J].中国农村金融,2020(5):87-88.
- [3]金时江.精准打造小微金融“网格样本”[J].中国农村金融,2019(12):24-26.
- [4]杨雅琦.台州农村金融网格化模式优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30(23):103-105.
- [5]杨凯.县域金融机构网格化金融服务管理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 [6]曾望军.论网格化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路[J].法制与社会,2020(35):94-98.
- [7]刘师常.网格化管理研究综述[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9,22(7):186-188.
- [8]吕卫平.农村商业银行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与探索:以宁波奉化农商银行为例[J].浙江金融,2014(7):56-58.
- [9]周晓芬,顾宝炎.基于网格的流程银行变革研究[J].金融论坛,2008(6):58-62.

(下转第66页)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改革与课程思政 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

——基于台州学院商学院的改革实践

耿慧敏, 景刚

(台州学院 商学院,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商业模式的改变和知识的更新迭代,同时对商科人才的培养在知识、能力和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在教育部“四新”建设的引领下,各高校商学院积极向新商科转型,但在改革实践中面临着变革性的挑战。台州学院商学院以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创新型经管人才为目标,在进行新商科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与课程思政建设同向而行,构建“三融三全五个一”的协同育人模式,从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创新、打造地方特色课、智慧教学课堂、构建协同育人生态等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努力为地方应用型商学院的转型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09

引言

以“大、智、移、云、物、区”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浪潮和产业革命”已经迎面而来,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数字经济在深刻改变人们的思维、生产、学习方式的同时,给商科人才培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传统商科教育已经难以满足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亟待对商科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变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国要继续坚持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地方高校是新商科改革的主体,肩负着培养新时代经管人才的重要使命。然而,地方高校在新商科转型中普遍存在人才

培养目标模糊,人才培养类型不明确,人才培养模式相类似等问题。一方面,毕业生难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受到企业多方诟病;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地方高校的毕业生,普遍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高校人才供给与地方社会需求之间存在“期望沟距”。

台州学院商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商学院,以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类型定位于应用创新型人才。进行新商科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的教学改革,将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相融合,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强调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融入本土红色资源、地方文化和人文精神,提高学生报效地方、扎根基层、乐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以期缩小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之间的

收稿日期:2023-11-30

基金项目:浙江省普通高校“十四五”教学改革项目(JG20220561);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022SCG177);台州学院2022年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作者简介:耿慧敏(1973—),女,黑龙江佳木斯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会计与审计学;景刚(1971—),男,黑龙江伊春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投资与金融学。

“期望沟距”,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资源支撑。

一、研究现状述评

(一)关于新商科的研究

新商科是新文科理念下的分支,是中国高等教育提出的教育理念与改革方略。对于新商科的概念目前尚无权威的界定,但是新商科具有跨专业、复合性、综合性的特点已达成共识。新时代商科应该是管理融合技术、产教深度协同及扎根中国情境的“三位一体”的综合型学科^[1]。

新商科是“面向未来”的商科教育体系,商科教学应面向未来梳理人才培养目标,从教学模式、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和培养平台四个维度开展学科及校企等资源整合^[2];新商科人才培养应“专创融合”,从课程体系、课堂变革等方面多措并举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3];新商科人才具有复合型的人才特点,可从产教融合、学科融合、理实融合和科教融合四个维度构建复合型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4];重构“商科+技术+思维”的课程和能力结构体系,可从师资队伍、实践教学体系、质量保障体系三方面进行改革^[5]。

从2017年提出“四新”建设以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正在逐渐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样貌^[6]。我国高等商科教育应以“四新”改革为契机,实现对西方商科教育的赶超,创建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商科人才培养体系,从而引领数字经济时代的世界高等商科教育。

目前,围绕新商科人才培养路径的研究侧重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的改革方向基本是:从专业细分向跨专业宽口径转变,培养方式由标准化、统一化向智能化、合作化、多样化转变,教学手段从以传统课堂为主向智慧教学、教育数字化转型。

(二)关于课程思政的研究

课程思政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系统的战略性学科建设工程,旨在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开创性^[7]。

近年来,围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研究文献

较多,借助 CiteSpace 软件以 CNKI 数据库中 1 353 篇论文为样本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域等方面尚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8]。高校应善用系统思维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促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思政内容与专业内容比例协调、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9]。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以“课程”为基础,以“思政”为着力点,从价值维度上看,课程思政回应了新时代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课题的要求^[10]。课程思政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双一流”建设的科学举措^[11]。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课程的重要内容,要基于大思政格局,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12]。推进课程思政全要素建设,应明确课程思政在人才培养中的系统定位以及课程思政自身的系统性,着力实现课程思政教育的品质化、特色化、体系化^[13]。构建课程思政一体化应从机制支撑、师资和教学团队、打造课程思政品牌三方面进行^[14]。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一体化实施,要结合自身特点,突出特色,注重多方联动、知行合一,强化育人效果^[15]。

从研究数量上,依托某专业某门课程探讨如何做好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比较多,侧重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的切入点、教学手段与技巧等,主要目的是使思政要素与课程内容能有机融合,主流的方法和手段是提高思政意识、深挖思政元素、以案例为载体、进行翻转课堂等。

(三)关于课程思政与新商科相结合的研究

课程思政与新商科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新文科视域下推动课程思政与知识传授有机融合,要深入挖掘课程思政与知识传授的共同要素及其联动机制^[16]。课程思政与新商科相结合,可从价值塑造、推进专业育人、创新教学模式、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学科思政等方面进行建设^[17]。

综上,围绕新商科或者课程思政的研究比较丰富,尤其是课程思政方面的研究已颇具规模。新商科的研究侧重于跨专业的课程设置或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课程改革;课程思政的研究侧重于结合具体的专业或课程进行思政元素的资源建设与融入手段;但是很少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研究对象的,对新商科课程思政的研究较为零散,缺少系统化的构建和特色化的凝练。

二、协同思想下新商科与课程思政的 协同创新

(一) 中国协同思想的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诸多关于协同、各元素相互配合和制约的表达,例如台州的和合文化。“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和”强调的是诸多要素间的调和与共存;“合”则强调个体之间的配合与融合^[18]。中国文化中的协同思想对高校进行“四新”教育教学改革有重要指导价值。

在教育教学改革中,政府、高校、行业企业、社会等多方联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体系构建,是对协同的最好诠释。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应打破以高校为主体“单一封闭、单打独斗”的育人模式,基于产教融合平台和特色产业学院,搭建校内校外协同育人新生态;激发行业企业、实务专家参与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将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协同、相契合。

新商科与课程思政的协同创新有助于教学改革的系统化,避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各要素之间的割裂和脱节,促进各教育主体的配合与协调,促使知识、能力、价值有机结合,呈现“1+1>2”的协同效应。

(二) 新商科与课程思政的逻辑关系

1. 新商科人才培养目标是课程思政的价值旨归。新商科之“新”首先体现在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尤其是新商科人才培养的价值目标应紧密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命题。新商科人才培养应立足中国实践,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建设人才和管理人才。

在人才培养中,新商科与课程思政具有统一的价值旨归。课程思政以德育为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落实“立德树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任务。商科培养的人才未来经济领域的管理者,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较多,要求有较高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准。新时代商科人才培养应提高并加强课程思政的价值塑造功能,加强学生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新商科教育要帮助

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2. 新商科创新发展需要以课程思政建设为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体现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各方面,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9]

新文科建设要在高起点上培养一批知中国、爱中国、懂中国,会讲中国故事、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新人。因此,新商科改革应以课程思政建设为突破口,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深入挖掘中国商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采用中国案例、中国理论解释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现象,用中国智慧指导、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实践。

3. 课程思政建设以新商科教育实践为载体。课程思政建设不是孤立的,必须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寓价值观引导于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否则,课程思政就是无水之鱼、空中楼阁。课程思政建设要把握时代脉搏,创新育人理念,以课堂为主阵地,与新商科人才培养特点相契合,全面融入新商科的培养方案修订、育人模式重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手段创新等一系列的改革活动中。

新商科改革本身蕴含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建设依托于新商科改革,只有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才能更好解决新发展阶段商科教育的时代命题。

三、新商科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 模式构建

(一)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人才培养的特点
数字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在商业模式、经济

规则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同,从而人才培养方面新商科与传统商科相比也存在极大的不同,见表1。

表1 传统商科与新商科人才培养特点对比

项目	传统商科	新商科
经济形态	工业经济	数字经济
人才培养目标	以就业为导向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完善人格、开发人力、服务他人、发展自我
人才培养要求	知识细分、专业细分、专业标准	跨专业、宽口径、业财融合、合作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大批量、标准统一	智能化、特色化、个性化、多样化
人才培养载体	教师、教材、教室	互联网+智能教育技术、多元化育人主体、场景化教学
人才培养手段	教师传授为主	以学生为中心

地方应用型高校应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主动了解地方经济对新商科人才的需求特点,以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商科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人才保障。

台州学院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是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的综合性普通高校,台州学院商学院主动对接台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需求,紧紧围绕台州“国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旅游与乡村振兴、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改革等领域重大战略部署,与台州“千亿产业”的发展规划相协调。商科人才培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精于实务、善于分析、业财融合、财金融合、创业创新。同时,要求商科人才应具有“忠诚、奉献、进取、合作”的核心特质。

(二)“三融三全五个一”协同育人模式的构建

基于新商科人才的特点,应从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校企协同等方面进行改革,全面融入课程思政建设,构建协同育人模式。

台州学院商学院基于学校“地方性、应用性、综合性”的办学定位,传承弘扬“澡身浴德、修业及时”校训精神,主动对接台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需求,构建了课程思政融入新商科人才培养的“三融三全五个一”协同育人模式,见图1。

“三融”是指课程思政建设与新商科改革相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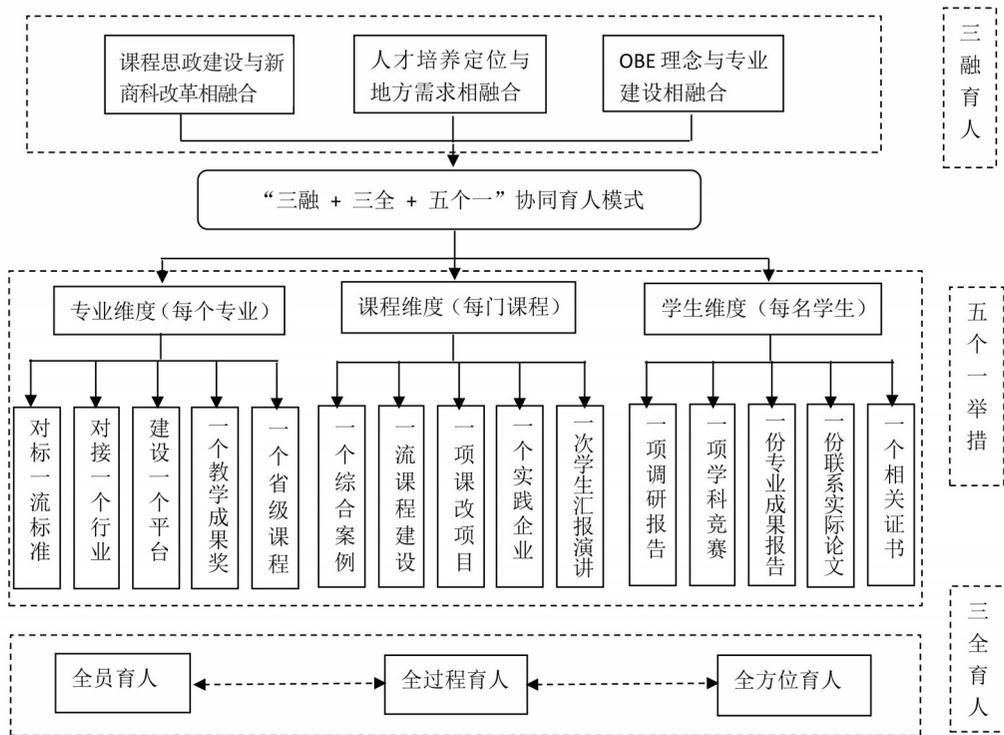


图1 “三融三全五个一”协同育人模式框架图

合,人才培养定位与地方需求相融合,OBE理念与专业建设相融合。“三全”是指打造校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机制。“五个一”是指从专业、课程、学生三个维度落实新商科的改革举措。

“三融三全五个一”协同育人模式,立足应用型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办学定位,以凝聚地方特色优势为核心,进行新商科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的教学改革,将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相融合、课程思政与地方文化相融合,力求在新商科教育变革中与地方经济、地方文化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协同育人,助力提升学校的办学优势与办学特色。

四、新商科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实施路径

(一)课程思政融入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基于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发展战略;二是学科发展;三是学校办学精神和文化。在人才培养目标中除了增加“业财融合的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平台应用能力”等方面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之外,还应将课程思政进行具体化分解,形成学科、专业、课程三个层次的价值塑造目标,精准设计包括德育目标在内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形成系统化的目标体系。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中应准确理解和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结合高校办学定位、学生情况、人才培养要求,明确专业学习应达到的知识、能力、素质目标,侧重价值塑造,将新商科教育理念和地方经济发展特色需求相融合。

台州学院立足台州、根植台州,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区别于高水平大学的创新型人才和高职院校的职业技能型人才,以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着力培养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具有一定职业技能且能够创造性解决企事业单位一线工作实际问题的经管类人才。

台州是我国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济发源地、市场经济先行地。同时,台州还是国家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示范区,需要学校培养的学生能脚踏实地、扎根基层、乐于奉献,为民营

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学院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与“澡身浴德、修业及时”的校训精神相结合,纳入人才培养目标。

(二)课程思政融入课程体系创新

新商科是在新文科理念下对传统工商管理学科进行重组和重构,以目标为导向进行课程体系创新。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管理类课程,构建综合性创新型跨学科的主干课程体系;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教学改革进行微课程群的创新改革。

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培养的是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高校应打破专业壁垒,对传统专业课程体系进行改革,以“大商科”的理念将前沿理念和先进技术纳入课程体系中,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数据挖掘等课程,优化整合课程内容。

以“四新”(新理念、新模式、新专业、新课程)改革为引领,进行微课程群的建设,与地方产业灵活对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同时,微课程群更易满足数字经济时代青年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台州学院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院系壁垒、专业壁垒,以地方产业需求为导向,设计跨专业、模块化、智能化的微课程群;将小微金融、双创、大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融入微课程群建设,加大创新课程比重,重构选修课模式,进行微专业、微课程群的改革。

在课程体系创新过程中,将课程思政融合点挖掘的主线确定为:服务社会、创造价值、经世济民、德法兼修。在思政主线引导下,融入浙江精神、红船精神、大陈岛垦荒精神、台商精神,引导学生关注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提高学生专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意识 and 担当意识。

(三)课程思政融入地方特色金课

课程思政融入地方特色金课,有利于将思政育人落实到课程建设、课堂教学中;有利于推动教师积极探索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创新与改革。

台州学院商学院以新商科为建设契机,以“金课训练营”为载体,聚焦新商科发展前沿,基于“共享、共建、共赢”理念,整合教师教育教学优势资源,搭建由校内外各方成员组成的“金课”建设团队。在厘清各专业建设发展思路的基础上,从专业人才培养逻辑中提炼育人内涵,从专业课程中挖

掘思政元素,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地方特色金课和课程思政示范课。

(四)智慧教学课堂助推课程思政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0]。

新商科背景下,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积累、制作课程思政素材,将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提高课程思政的育人效果。教师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教学手段,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持续推动以学生为中心、自主合作式学习的课堂变革。

台州学院着力打造课程思政资源的数字化平台,进行与地方经济、地方文化相融合的特色化建设。加大全景教室、智慧教室、智能化实验室的投入,为教师搭建学习通、云班课、雨课堂等智能化教学平台。通过培训交流等活动,提高教师智慧教学手段的应用能力,助力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提高课程思政变革的丰富性和创新性。

(五)校企协同育人生态拓展思政育人渠道

高校应充分挖掘校内外各种资源,强化社会实践育人,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进一步推动专业与当地产业、行业的需求对接。台州学院商学院构建校内教师和校外实务专家“六个共同”培养机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共同编写特色教材、共同参与教学改革、共同指导毕业论文(设计)、共同监控教学质量。

校内校外双导师通过交流教学理念、行业认知等取长补短、协同配合,打造协同育人生态,使学生在校园内也能感受到优秀企业家精神,使艰苦奋斗、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思政元素融入学生专业学习与实习实训的各个层面,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结 语

新商科是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产业变革新趋势而提出的商科教育改革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呼吁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地方高校商学院作为培养新商科人才的主力军,只有不断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加强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打造多元融合的育人生态、发挥多元主体的育人功能,才能契合时代需求,全方位地提升育人成效,支撑地方高校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晓芳,夏文蕾,张逸石,等.新时代新商科的内涵及“多维度协同”培养体系改革[J].财会月刊,2021(5):107-113.
- [2]霍宝锋,张逸婷,姚佩佩.基于扎根理论的新商科人才培养[J].中国大学教学,2023(4):4-10.
- [3]刘玉,朱姝.新商科类专业群“专创融合”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23(7):46-52.
- [4]张国平,王开田,施杨.“四位一体、四维融合”的新商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22(11):50-52.
- [5]张国平.新商科人才培养模式与实现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21(2):43-44.
- [6]吴岩.国际共识 中国创新:准确把握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着力点[J].中国高教研究,2022(8):7-10.
- [7]张品良,唐雷.中国特色视域下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J].教育传媒研究,2021(5):13-15.
- [8]王立柱,何云峰.基于CiteSpace的我国课程思政研究可视化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42(24):27-31.
- [9]黄宁花,禹旭才.系统思维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实践反思与优化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5):106-115.
- [10]蒋占峰,刘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多维审视[J].现代教育管理,2022(9):111-118.
- [11]薛桂琴.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哲学意蕴[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6):25-32.
- [12]韦诗业,李素芬.新时代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20):36-39.
- [13]翟文豹.课程思政建设:逻辑起点、基本前提与实践路径:以行业特色型高校为例[J].现代教育管理,2021(9):35-41.
- [14]李博,陈栋.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挑战与改进[J].中国大学教学,2021(9):75-79.
- [15]张岩,李新纲,朱秋莲.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与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1(11):77-82.
- [16]杨国栋,马晓雪.新文科视域下课程思政与知识传授融合的基本逻辑与实现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5):96-105.
- [17]张春萍.加强新商科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21(10):37-39.
- [18]许峰.论和合文化与台州模式的理论关联及逻辑进路[J].台州学院学报,2022,44(4):9-14.
- [19]新华社.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讲话[A/OL].(2021-03-06)[2023-11-28].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103/t20210306_518106.html.
- [20]新华社.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OL].(2016-12-08)[2023-11-28].<https://news.12371.cn/2016/12/08/ARTI1481194922295483.shtml>.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New Business Reform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Business School of Taizhou University

Geng Huimin, Jing Gang

(School of Business,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business models and updates in knowledge, posing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business talents in terms of knowledge, abilities, and literacy.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ur New" constr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usiness schools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have been actively in transition to new business subjects, but they are facing transformative challenges in reform practice. The Business School of Taizhou University takes it as its responsibilit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applied management talent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teaching of new business education, it is in line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has constructed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three integrations, three comprehensions, and five ones". Beneficial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in terms of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talent cultivation plans,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on, creat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courses,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and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cosystem,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applied business schools.

Keywords: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new busines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上接第59页)

SWOT Analysis of the Grid Management of Luqiao Rural Commercial B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Finance

Chen Liyang, Peng Mingxu

(School of Business,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 China)

Abstract: Financial grid management is a grid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ive community. Banks and grassroots villages and towns cooperate to establish inclusive financial workstations to provid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customers in the grid, so that customers can enjoy financial resources equally. By setting up inclusive finance workstations in the grid, basic bank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delivered to each grid customer with modern technical means, and the service mode of inclusive finance is explore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behavior sample of Luqiao Rural Commercial Bank, adopts SWOT analysis method for internal analysis, studies the advantages, difficulties and paths of Luqiao Rural Commercial Bank in grid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alent training, providing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intensifying marketing campaigns.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gridding; Luqiao Rural Commercial Bank

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及优化进路

——基于A省1642名辅导员的调查

冯 荣^{1,2}, 姜海燕³

(1.台州学院 宣传部, 浙江 台州 318000; 2.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3.温州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职业认同是影响辅导员职业选择乃至职业信念的重要预测变量。基于A省高校1642名新任辅导员的调查,探讨其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通过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发现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度、学校外在声望三个变量显著影响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其中知觉到的尊重在学校外在声望和工作满意度之间有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整体上喜中藏忧,不同工龄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呈现“峰”形特征。基于此,提高职业认知水平、启发职业价值思考、笃定职业信念坚守、做好职业生涯管理等方法可积极塑造辅导员的职业认同观念。

关键词:辅导员;职业认同;影响因素;进路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10

职业认同是影响高校辅导员职业选择乃至职业信念的重要预测变量,对其职业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摩尔与霍夫曼等人经过研究,认为职业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角色的重要性、吸引力、与其他角色的融洽性所作的总体评价”^[1]。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任何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总是与其所从事的职业特征有关。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中的一类专门人才,从事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与服务这份特殊工作,其职业认同即为对其“所从事的职业所持有的积极感和肯定性评价”^[2]。了解辅导员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积极有效地探索加深辅导员职业认同的方式方法,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16号)^{[3]265-270}文件下发以来,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与重视,高校也更加关心和致力于其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24号令)^{[3]344-346}颁布之后,教育部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来建立健全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各地各高校积极贯彻落实文件要求,不断优化选聘、培养、发展制度体系,大力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4]。这些

收稿日期:2023-1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责任担当的重要论述研究”(20JD710038);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项课题“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阐释路径研究——以大陈岛垦荒精神等为例”(23GHXZ01);台州学院党建研究课题“高校辅导员职业信念研究”(2022YB02);台州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地方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2023SZZD01)

作者简介:冯 荣(1982—),男,浙江临海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姜海燕(1978—),女,浙江温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调动了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其职业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然而,从现实来看还是有部分辅导员对其职业感到迷茫,成就感不强。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有部分辅导员甚至“表现出较低的职业认同水平”^[5]。这无疑会影响到辅导员这支队伍的职业化及可持续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职业投入与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前期,诸多研究者开发了部分有关辅导员职业认同的量表来测量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情况,较大地推动了辅导员职业认同的研究。较多研究表明,关于辅导员职业认同影响因素主要分为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等。鉴于此,本研究将以新任辅导员作为被试,重点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路径。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取样方式与对象描述

通过现场集中并利用网络平台调查的方式向A省所有高等院校任职时间在3年以下且没有参加过上岗培训的辅导员发放问卷1644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642份,回收率为99.88%。便利取样的样本中,辅导员在本科院校就职的占67.7%,在高职院校就职的占32.3%;男性占39.9%,女性占60.1%;最高学历为博士研究生的占0.73%,为硕士研究生的占88.25%,为本科的占11.02%。被试的样本中新入职(刚到岗无工作经验)与入职辅导员岗位时间在1年以下的为81.07%,1~3年的为16.21%,3年以上的为2.72%。

(二)调查工具与主要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主要改编自周国华编制的《大学组织认同调查量表》,对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等变量进行测量。

辅导员对知觉到的尊重量表,主要调查辅导员家人、所带学生及其本人知觉到的尊重程度。这部分调查问卷的设计是基于富勒(Fuller)等人做的一个研究。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个人的尊重需要是员工产生组织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扮演了外部形象塑造者与组织认同之间的调节者”^[6]。辅导员对工作的满意感量表,主要调查辅导员的自信心、价值感、成就感。这部分调查问卷的设计

受启发于著名管理学大师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在他看来“对工作满意感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作兴趣、成就感、发展机会等动机因素”^{[7]48}。辅导员对学校外在声望量表,主要调查辅导员对工作单位的印象、认知及接受程度。这部分调查问卷的设计是基于外部环境对辅导员职业认同可能产生影响的基本判断。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计分(1=完全符合、2=比较符合、3=不确定、4=比较不符合、5=完全不符合),分数越高表示结果越负面。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在问卷数据采集及分析方面,首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其次对有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最后通过设计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和职业认同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模型分析时,主要运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方法来检验模型的中介效应。另外,在正式数据分析之前,运用Harman单因子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将公因子数设定为1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模型无法拟合,这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三、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确保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水平,本研究首先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 $\chi^2[6]=5.285, p<0.001, RMSEA=0.051, NNFI=0.992, CFI=0.994$ 。各因子题项的负荷值均达到要求,而且 t 值在0.001水平上显著。所有因子的AVE根号值均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区别效度良好。所有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 α 和组合信度都大于0.70,其中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的 α 值分别为0.70、0.80、0.84,组合信度为0.89,表明因子的信度良好。总体而言,本研究工具的信效度水平较为理想,适合做进一步分析。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1. 辅导员职业认同的总体情况。调查显示,辅导员对于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的测量均值得分如下,分别为1.62、1.97、1.96,见表1。

表1 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总体情况

维度	样本数 (N)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知觉到的尊重	1 642	1.62	0.56
工作满意感	1 642	1.97	0.71
学校外在声望	1 642	1.96	0.78

2. 辅导员职业认同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分别以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为因变量,以性别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职业认同及其前述三个维度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见表2。

3. 辅导员职业认同在入职时间上的差异比较。假设因变量不变,以工作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入职时间的辅导员在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3。

进一步采用 Scheffe 法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在知觉到的尊重维度上,新入职的辅导员高于入职1年以下和入职1~3年的辅导员。在工作满意感维度上,新入职的辅导员高于入职1年以下和入职1~3年的辅导员。在学校外在声望维度上,新

入职的辅导员高于入职1年以下和入职1~3年的辅导员。

4. 辅导员职业认同在最高学历上的差异比较。假设因变量不变,以最高学历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入职学历的辅导员在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4。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比较上,不同入职学历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无显著差异。

5. 辅导员职业认同的相关性分析。假设因变量不变,以职业认同为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这三个维度变量,都与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呈现出显著相关性,见表5。

6. 辅导员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对职业认同的回归分析。假设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为因变量,以职业认同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这三个维度,相关系数 R 和 R^2 均大于0.4且接近1.0,拟合程度较好,并对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呈现出显著相关性,见表6。

表2 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在性别上的差异

维度	性别	样本数(N)	平均值(M)	标准偏差(SD)	标准误差平均值(σ)
知觉到的尊重	男	655	1.660	0.587	0.023
	女	987	1.601	0.547	0.017
工作满意感	男	655	1.910	0.734	0.029
	女	987	2.011	0.684	0.022
学校外在声望	男	655	1.966	0.806	0.031
	女	987	1.955	0.755	0.024

表3 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在入职时间上的差异

维度	新入职		入职1年以下		入职1~3年		入职3年以上		检验(F)	事后比较 (Scheffe)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知觉到的尊重	1.53	0.52	1.66	0.57	1.73	0.62	1.61	0.58	10.478**	B>A, C>A
工作满意感	1.87	0.70	2.04	0.69	2.05	0.75	1.77	0.68	8.910**	B>A, C>A
学校外在声望	1.79	0.69	2.04	0.77	2.13	0.89	1.84	0.74	17.304**	B>A, C>A
职业认同	1.73	0.58	1.91	0.61	1.97	0.69	1.74	0.63	14.483	B>A, C>A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A表示新入职,B表示入职1年以下,C表示入职1~3年,D表示入职3年以上。

表4 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在最高学历上的差异

维度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检验(F)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平均值 (M)	标准偏差 (SD)	
知觉到的尊重	1.63	0.55	1.62	0.56	1.96	0.66	2.142
工作满意感	1.96	0.74	1.97	0.70	2.25	0.89	0.957
学校外在声望	1.88	0.78	1.97	0.77	2.29	0.89	2.157
职业认同	1.82	0.63	1.85	0.62	2.17	0.76	1.751

表5 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皮尔逊相关性

维度相关性	知觉到的尊重	工作满意感	学校外在声望	职业认同
知觉到的尊重	1.000	0.663**	0.702**	0.849**
工作满意感	0.663**	1.000	0.808**	0.920**
学校外在声望	0.702**	0.808**	1.000	0.939**
职业认同	0.849**	0.920**	0.939**	1.000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6 高校辅导员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对职业认同的回归分析

维度	R	R ²	显著性
知觉到的尊重	0.849	0.721	0.000
工作满意感	0.920	0.846	0.000
学校外在声望	0.939	0.881	0.000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来探寻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并对其相关方面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有鉴于新任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对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性,为了提升辅导员的职业认同,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结论

1. 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整体上喜中藏忧。本次调查表明,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整体上较好。从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的测量来看,总体均值为1.85,处于问卷设定的5个等级中的“完全符合”和“比较符合”之间,处于较明显的正向状态;但这一得分与

“完全符合”还有一定的差距。从检出率统计来看,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得分介于1~2之间的辅导员占比分别为89.7%、73.6%、76.6%。虽然有绝大部分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较高,但仍有26.7%的辅导员职业认同偏低。因此,虽然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尚可,但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毕竟有81.07%的辅导员刚刚入职。此外,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在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上的水平也不平衡。当然,造成高校新任辅导员职业认同达不到整体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职前经历的岗位不一。任何一个职业,从“认可”走向“认同”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对职业的“认知”。统计表明,有88.9%的人入职辅导员前有过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有36.78%的人大学期间有过担任兼职辅导员或学工助理的经历。这部分人在入职前与辅导员接触

较多,对辅导员这个职业也较为熟悉,对辅导员职业的认可度相对较高。当然还有4.35%的人,无任何担任学生干部、兼职辅导员或学工助理、班主任、思政教师等相关经历,对辅导员职业的认可度相对较低。二是职业选择的初衷不一。很多人选择辅导员这个职业,是看中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队伍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优势,比如发展机会、社会尊重和较多假期等。但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因素开始变得多元化。有40.82%的人选择辅导员是因为喜欢高校的工作环境,而辅导员这个岗位相对容易进入;有27.57%的人选择辅导员是因为机缘巧合;仅有24.86%的人选择辅导员是出于对这个职业喜欢。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确实很难预料这68.39%的新任辅导员短时间内会对辅导员职业认同能达到多少高度。同时,对辅导员这个职业喜欢的人占比并不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三是职后体验的知觉不一。职业认同很多时候还来源于长期以来的工作投入与体验,这种知觉需要时间来加以检验。本研究有35.96%的辅导员在调查之时刚参加新任辅导员上岗培训,没有任何辅导员工作体验;有45.11%的被试则有1年以下的辅导员工作体验;还有18.93%的被试有1年以上的辅导员工作体验。研究表明,辅导员从业时间的长短在职业认同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而,必须重视对新任辅导员的岗前培训,包括职业认知、技能素养、教育情怀和价值信念等等。

2. 不同工龄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呈现“峰”形特征。本次调查表明,不同工龄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在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认同度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峰”形特征,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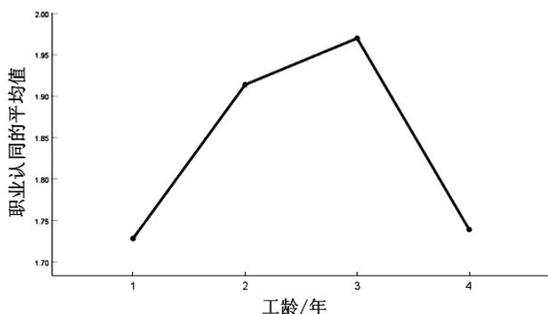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工龄辅导员职业认同平均值图($n=1\ 642$)

进一步分析表明,工龄为0的590个辅导员被试,职业认同均值为1.728 2,认同度最高。随着工龄的增加,认同度降低。比如,工龄为1年以下的734个辅导员被试,职业认同均值为1.913 9;工龄为1~3年的272个辅导员被试,职业认同均值为1.97;而工龄在3年以上的辅导员,认同度又开始抬升,46个辅导员被试的职业认同均值变为1.739 1。不同工龄辅导员的认同度之所以呈现“峰”形特征的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工龄比较短(尤其是没有工龄)的辅导员处于职业选择伊始,职业新鲜感比较强烈。他们对于自己最终选择的职业有着审慎的考虑,对于辅导员职业有着基本的认知,对于新岗位面临的工作持有最初的憧憬,而且迫切需要通过工作得到上级、同事、学生的认可与肯定。处于这个阶段的辅导员对于职业的认可度就比较高。二是工龄处于1年以下和1~3年这个中间段的辅导员处于职业起步阶段,职业体验感比较直观。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和实际锻炼,他们已经基本上适应了辅导员的岗位角色,并对辅导员岗位有了初步的认知。与此同时,辅导员岗位繁而杂、强而累的工作任务,甚至24小时手机在线的高负荷工作状态已经很难再给他们带来职业的新鲜感和挑战性。处于该工龄段的辅导员又大多面临着婚恋、生育、住房等多重生活压力。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等多元职业要求,牵涉和消耗了他们的很多精力,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其职业信念,甚至使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三是工龄比较长的辅导员处于职业稳定期,职业成就感比较明显。随着从业时间的增加,工龄比较长的辅导员熟练掌握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并在工作中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体验感、效能感和成就感都比入职不久的辅导员强。加之,结婚生子、生活稳定、心态平和,而且多数持有笃定的事业观、价值观,家庭负担、思想负担和工作负担也相对有所减轻,这些获得感都会影响和提升他们的职业认同。

3. 辅导员知觉到的尊重在学校外在声望和工作满意感间存在中介效应。本次调查统计结果同时还显示,辅导员职业认同的三个维度变量之间部分存在着中介效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使用Bootstrap方法(抽样的次数设定为2 000次)对辅导员知觉到的尊重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知觉到的尊重在学校外在声望和工作满意感间的中介效应为1.587,其95%的置信区间为0.687~0.831。

研究认为,辅导员入职以来随着对学校外在声望、知觉到的尊重和工作满意感认知程度的加深,会在职业认同层面呈现出不同的体验水平。进一步分析三个维度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辅导员对学校外在声望的认知会通过知觉到的尊重间接影响到其工作满意感。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辅导员知觉到的尊重会产生工作幸福感,而“幸福感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积极情绪和能量”^{[8]6},亦提升了工作满意感。统计表明,80.63%的新任辅导员对自己能成为辅导员很有自豪感。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需要”,且处于接近金字塔尖的第四层次。可以说,他们被社会认同、被各界重视,直接会促成其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二是辅导员知觉到的尊重会凸显职业重要性。每个人的职业价值观不同,所选择的职业必然会有所区别。从职业选择的结果来看,“职业价值观是人们衡量社会上各种职业的优劣和重要性的内心尺度”^{[7]5}。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被试样本的数据统计分析来加以验证。在1642名新任辅导员的调查中,77.03%的人认为从事辅导员工作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辅导员知觉到的尊重会支撑从教事业心。受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长期工作后辅导员会因为责任大、事务杂、加班多而造成主观上成就感不强、转岗率较高和客观上职业认同低水平、大差异的情况。如果在辅导员还没有产生职业倦怠之前或者倦怠程度不深的阶段,更加重视、关心、关爱辅导员,给予其更多的工作认可,会对其起到情绪调适的作用。被尊重的获得感,势必会影响到辅导员的成就动机,从而赋能辅导员的职业信念,最终支撑其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中就有81.89%的新任辅导员对自己能做好辅导员工作很有信心。

(二) 启示

辅导员所知觉到的尊重、工作满意感、学校外在声望对其职业认同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和正向预测作用。尤其是对于新任辅导员而言,需要更加注重对其职业认同的观念塑造。

1. 加强岗位意识教育,提高职业认知水平。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辅导员所从事的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非凡。塑造较高的职业素养是推进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

引导其更好投入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高校必须重视在辅导员入职初期,强化对其“大学教师信念的养成……进行苦乐观教育”^{[8]106},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坚定的从业底气、教师信念和职业情怀,培养忠诚于教育事业、献身于教育事业的高尚情操,提高对辅导员职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各种价值观冲击和功利性诱惑面前,能够做到淡泊明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事实上,“有部分辅导员认为这个职业‘责任重大,待遇低下,前途渺茫’,表现出较低的职业认同水平”^{[7]1}。因此,必须注重创造各种学习、培训的机会,让其真正认识到辅导员职业的高尚,才能培养起辅导员热爱教育事业的朴实感情,才能使其真正全身心投入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去。

2. 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启发职业价值思考。辅导员尽管是一群从事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工作的专门人才,在职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存在着职业价值理解的困顿。此时,需要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借助于各类先进典型对其予以示范引领。有研究表明,辅导员职业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种由外而内的力量推动,以引起辅导员自我反思。可以针对性地选取“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全省优秀辅导员”和新任辅导员身边的榜样,对他们忠诚教育、坚守职业、倾心投入等先进事迹加以宣传,或者请他们在辅导员上岗培训时作报告分享心得,以影响新任辅导员的职业价值观。又或者组织辅导员沙龙,让新任辅导员与身边优秀的辅导员开展“与价值观对话”等活动,引发其自身对于“辅导员是谁?”“辅导员为了谁?”等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索。从而,“提升他们的职业价值与人生价值,提升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忠诚度与积极性,进而可以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稳定与长远发展提供支撑”^{[9]101}。

3. 营造社会尊重氛围,笃定职业信念坚守。辅导员职业选择的原因是多元的,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其中知觉到的尊重,则会影响到其对于职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判断,比如家人对于其职业选择的支持、社会对于其职业价值的肯定、学生对于其职业使命的认同等。仅以本研究被试的统计情况来看,有89.46%的新任辅导员表示家人非常支持其从事辅导员这个职业。与此同时,有94.13%的被试非常认可辅导员这个职业对于学生

成长成才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坚定辅导员的从业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入职初期,“坚定的教师职业信念,有利于使教师热爱自己的职业,形成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8]⁹⁹。如果全社会各个层面都普遍认为辅导员的育人工作对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大意义,都充分认可辅导员的工作价值,都高度认同辅导员的劳动成果,形成自上而下、由表及里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一定会有利于提升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和自豪感,从而使辅导员以持续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教育、管理与服务学生中去。正如研究中所展示的,有81.83%的新任辅导员“乐意提到我是一名辅导员”。

4. 注重人生发展规划,做好职业生涯管理。辅导员不仅是高校常设的一个工作岗位,而且是劳动者谋生的一份社会职业。从职业要求上来看,辅导员有着明确的职业标准,固定的职业规范和匹配的职业技能。因此,加强职业发展规划引导,既是高校加强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需要,又是辅导员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尽管辅导员队伍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到科学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内涵式发展建设”^[10]的过程,但相对于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来讲,路径越来越多元,也越来越清晰。在当下政策较为支持的发展境遇下,个人主导型职业生涯管理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辅导员应该基于职业能力标准,结合自身实际,评测自己的特质、潜能,制定相对明确的职业发展步骤,并按照此目标进行机会创设、能力改进、素质提高和结果达成。一旦真正把辅导员这一

职业当作自己人生规划的“职业锚”,“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发展就进入一个自觉与自由的境界”^[9]¹⁰⁴。这也是一个积极劳动者,做好职业规划,走向职业认同必经的职业生涯历程。

参考文献:

- [1]张宁俊,朱伏平,张斌.高校教师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理论与实证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40-41.
- [2]周国华.大学教师组织认同研究:影响因素及其建构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8.
- [3]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4)[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 [4]冯刚.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发展路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颁布十年的回顾与展望[J].思想理论教育,2016(11):6.
- [5]张爱莲.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与工作幸福感及其相互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
- [6] FULLER J B, MARLER L, HESTER K, et al. Construed External Image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 Test of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Need for Self-Esteem[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6(6), 701-716.
- [7]楼艳.德育共同体视域下的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 [8]吴薇.大学教师的苦与乐[J].江苏高教,2022(12).
- [9]彭庆红,李慧琳.组织主导型高校辅导员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模式初探[J].思想教育研究,2012(8).
- [10]彭庆红,耿品.新中国成立70年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进程、总体趋势与经验启示[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8):132-134.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ptimization Approach of Career Identity of New College Counselors

—Based on a Survey of 1,642 New College Counselors in A Province

Feng Rong^{1, 2}, Jiang Haiyan³

(1. Propaganda Department,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3.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counselo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staff, is the backbon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s the guide for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predictive variable that affects counselors' career choice and even career belief.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642 new counsel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 Province,

(下转第85页)

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养成路径思考

谢志昂, 陈鸿胜

(台州学院 组织部,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正确党史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历史正向认知的理论和方法基础。青年大学生是否拥有正确党史观,对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和党的兴衰成败具有重大现实与长远意义。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正确党史观的科学内涵,深入探求其形成过程;以系统学习、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巩固强化等方式,探求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养成路径,以期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知党爱党护党兴党的青年大学生。

关键词: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养成路径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1]。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对党的执政根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价值。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工作来抓,用正确党史观武装青年是重要内容之一。在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树牢正确党史观,对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行动认同至关重要。让青年大学生树立和养成正确党史观,运用正确党史观对待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能够让青年一代明白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成功,将来如何继续成功,从而能更加积极主动地扛起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一、正确党史观的科学内涵

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什么是正确党史观,也即青年大学生要树立什么样的党史观。“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

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党史观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正确党史观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正确认识、科学总结和客观评价^[3]。要理解正确党史观的科学内涵,具体应当从四个方面把握。

(一)充分认识正确党史观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是正确党史观的第一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石,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进程,全面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基本方向、根本动力,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改造社会的根本指导方法和范式。早在1921年1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4],在毛泽东的革命探索过程中,总原则是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总结历史,汲取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提出研究、总结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理解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收稿日期:2023-10-30

基金项目:台州学院2022年党建课题“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形成机制与路径研究”(2022YB03)

作者简介:谢志昂(1981—),男,浙江永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建设;陈鸿胜(1987—),男,浙江台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

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6]

大历史观是正确党史观的第二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7]从纵向看,要把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放到“5 000多年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180多年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历史视野中进行考察,尤其要重点考察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从横向看,要具有世界历史观的宽度视野,党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是中国的历史也是世界的历史,必须立足于中外对比的视野和广度分析党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贡献。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发展与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相对比,才能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和历史贡献,充分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巨大成功。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世界历史和各国政党史的比较分析,他指出:“无论是处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还是处理对外开放中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放眼世界,具有宽阔的眼光。”^[8]

(二)深入理解正确党史观的价值导向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必须根植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百年党史始终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贯穿着人民立场,谱写着党的人民公仆角色。”^[9]因此,正确党史观必须站在人民立场看待党史,必须紧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价值在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0]党从成立之日起,始终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作为奋斗目标,并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百年奋斗实践,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实践无数次证明,只有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实现解放群众的目标。所以,正确党史观必须要将党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坚持爱党爱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

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6]

(三)深刻洞察正确党史观的功能作用

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历史进程而言,正确党史观主要具有两个功能作用。首先是以史鉴今,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智慧、力量。其次是资政育人,能够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助力;能够引导、教育、团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及青年。历史是教科书,是清醒剂。一个成功政党所具备的素质就是能够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善于总结历史规律和借鉴历史经验,并充分吸收和汲取历史智慧,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知识上的武装,以发挥党史资政的作用^[11]。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每个重要时期,始终坚持正确党史观,才能相继作出“三个历史决议”,推动全党统一思想,不断开拓创新,向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

(四)全面把握正确党史观的方法体系

方法体系是认知评价事物的深层次基础,不同方法论体系指导下的认识和评价,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树立正确党史观首先要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上,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中的立场、观点和原则出发,以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而不是抽象的、主观孤立的、静止片面的观点来看待。其次要坚持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从方法论角度看,大历史观是一种以长远、整体和纵深的战略性视野考察历史的方法论。它要求在全球宏观视野下,看清和辨明历史发展的主流主线,正确看待党在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困难、失误和不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看待成就与失误、成功与曲折,既不因噎废食,也不以偏概全。

二、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大意义

(一)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2]242}只有让青年大学生树牢正确党

史观,才能教育和引导他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听党话、跟党走,从而使青年大学生在时代的伟大变革中,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奋斗定力、牢记使命担当,让青春在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中绽放光芒,共同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二)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反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必然要求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思潮,影响甚广,危害极大。从根本上说,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某些敌对势力利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做文章,断章取义、混淆视听、颠倒黑白,以此来丑化马克思主义、丑化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取得的一切成效,进而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12]。

(三)树立正确党史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

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青年大学生,不但明白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样的人生根本价值取向问题,而且具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能力,尤其是拥有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等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在面对机遇和挑战时能更好地坚定人生的信念信仰,到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不懈奋斗,为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三、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形成过程

正确党史观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心理学原理揭示,它的形成与其他观念的形成一样,通过一定的机理,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一)历史认知是基础

对一个事物的认知往往建立在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一个事物和事情毫无了解和认识,就很难做到认知基础上的判断和评价,无法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就党史观来说,认知的基础是对党的历史基本知识掌握和理解,在掌握和理解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认知,因此认

知的首要前提是基本知识。党史基本知识承载了具体党史的发生、发展、进程、结果,以及在整个过程中出现的人、事、物等内在要素及其内在关系,清楚展示了党的历史的总体面貌、趋势、特征与规律。正确党史观形成过程中,知识的基础作用在于通过对基本党史知识、价值、意义的获取和吸收,产生一定程度的了解与认知,进而形成判断与评价,推动从外部被动认知向内部自觉转化。知识一旦形成体系,其基础作用会更加明显,影响力会更大更广。因此,构建和完善系统完备的党史知识体系尤为关键,对树立正确党史观具有前提性价值。因为就知识体系本身而言,党史知识体系直接构成正确党史观的内在成分,其史料体系、概念体系、表达体系、问题体系、价值导向体系深深嵌入党史观内核;同时,知识体系清晰地体现和界定了历史史实内含的核心内容、主流本质、事实边界,对历史虚无主义扭曲、丑化、碎片化党的历史和历史人物起着澄清作用,为正确党史观提供知识支持、权威参照。因此,要形成正确党史观,需不断加强历史研究,构建历史史料知识体系,提供系统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载体。

(二)评价判断是桥梁

党史知识学习过程,实际上是认识史料、理解史料、重构问题、了解真相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党的历史,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进程进行独立的评判,形成评价判断。“在历史认识中,只有通过价值判断,才能使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密切的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13]在接触和学习党史知识和史料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评价,体现出价值性。价值性往往表现为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一般呈现为支持或反对、认同或排斥、接受或抗拒、肯定或否定等。如果在整个过程中,认知主体所形成的评价和判断是正向的,进而可能激发认知主体产生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要运用正确方式方法给予青年大学生正确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三)情感认同是跨越

认同是对某事某物一致性认识,从整体层面上只能说是可接受、可理解,从具体内涵层面上具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性。比如,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存在巨大的差距或鸿沟。认知认同反映的是“知与不知”的问题;情感认同反映的则是“愿与不愿”的问题。“愿与不愿”就关系到深层次的情感与态度

问题。情感始终是人们积极活动的动力因素,是人们外在行为的主要内驱力。因此,在形成正确党史观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强化认同,推进认同层次不断升级、认同视域不断扩大、认同情感不断增强。把对党史的认识与了解,升级到对党的历史发自内心去欣赏、理解与支持,甚至主动分析与反思、总结与提炼,在认同基础上形成思想和行动的自觉。

(四)自觉行动是飞跃

从自发到自觉是巨大的飞跃。自觉是主体在价值、方法系统上对客体主动性的认识与行为,包括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立正确党史观,实质上就是运用正确党史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立正确党史观,最终目的是在正确党史观的指导下,从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转化为拥党护党的自觉行动。因此,从知到行,从思想自觉到行动自觉,需要不断强化教育引导与自我养成。行动的体现,既表现在重大事件上的立场、观点、行为,也体现在与不良的倾向斗争中的各种表现。

综上所述,正确党史观的形成贯穿知、情、意、行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阶段的促进因素进行分析,探求和把握形成正确党史观的运行机制和核心要素,从而为正确党史观的养成路径提供选择。

四、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养成路径

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养成路径,重在系统学习、重在教育引导、重在实践养成、重在巩固强化。

(一)深化党史知识学习,建立健全多渠道立体化的系统学习路径

青年大学生在小学与中学时代就有一定的党史知识积累,也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和情感倾向。纵观青年学生的成长,相较于小学与中学,大学时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塑造尤为重要,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观念的定型。因此,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教育,重点在于扭转不良认识、强化正向导向,首要的是建立多渠道的系统学习路径。一要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在校大学生都要系统学习的必修课程,当下思政课关键问题在于高校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

性。要通过思政课的改革,使其更加贴近学生、更加易于被接受,不断增强吸引力和育人成效。二要加强“四史”教育。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开设专题课程,实现课程全覆盖,使青年学生在大学学习过程中,都接受过“四史”教育。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爱党爱国思想。三要系统把握高校各级党校的入党教育。高校一般设有校院两级党校,党校承担着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的职能。系统化设置高校党校教育培训课程与教育体系,把党史教育专题纳入其中,让广大的入党积极分子接受系统的党史知识、党史观教育,是一条非常好的教育路径。一方面因为入党积极分子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具有更强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党校培训更具针对性,更贴近学生实际,更容易为学生接受,实效性更好。四要充分挖掘高校自身特色的党史党性学习教育。高校教育具有自身特点与优势,高校可以结合自身优势与当地党史教育资源,创造性地开设党史党性选修课程和平台载体,强化思政教育和党史观教育。现在许多地方高校都有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育人系统,比如嘉兴学院的红船精神教育、台州学院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教育等。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教育,深化正确价值观的教育引导路径

正确党史观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论引领和指导,党史观只能也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要打牢正确党史观背后的方法论基础,需要不断厚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内涵。一是以共产党人的价值实现方式作为学习指向,追根精神之源,汲取智慧和力量。回顾百年党史,是一部共产党人的奋斗史,可以通过许许多多的重要历史人物,在他们人生奋斗过程中关键时刻的抉择,找到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目标、精神伟力。从战争年代的陈乔年陈延年兄弟、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先烈,到国家建设时期的钱学森、邓稼先、焦裕禄、王进喜等,到新时期的袁隆平、吴孟超等,他们都是所处时代的楷模和标杆。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伟大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回答了共产党人是什么、要干什么、怎么干的根本问题。带领青年大学生走近这些历史人物,聚焦精神实质,汲取智慧和力量,夯实方法论最基础最深厚的底色。二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方向,回答时代之问,明

晰实践之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习近平总书记用最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的语言,深刻地告诉青年大学生,要到人民中间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才能走得更远,才能作出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引导青年学生走进人民、走向一线,到祖国与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用行动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三是以“三个历史决议”精神要义作为评价指向,增强历史思维能力。党的历史上,共有三个“决议”,分别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三个历史决议”集中了党的集体智慧,为树立正确党史观提供了政治依据、理论依据和历史实践依据,具有不可撼动的说服力、解释力、指导力。推动青年大学生研读“决议”,全面领会背后的思想品质、理论价值、方法意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断增强历史洞察力、历史思维能力和历史定力,提升运用正确方法的自觉性。

(三)注重“知行合一”,扎实推进实践养成路径

“知行合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不谋而合。正确党史观的形成与作用发挥需要教育实践,教育实践能够不断强化正确的党史观。一是持续深化党内主题教育。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内先后开展了6次全党范围内的教育实践活动,分别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些教育实践目标任务明确、要求明确、方式方法路径清晰,通过自上而下强力推动落实,取得许多扎实有效的成果。这些教育实践活动,对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对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现实、未来,对正确党史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非常有效的实践路径。坚持党内教育实践,不断总结和完善,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继续开展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党内主题教育,扩大青年大学生党员的参与度,用大学生党员辐射引领青年大学生,不断强化正确党史观养成。二是高度重视关键节点的实践教育。关键时间点的实践活动,对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党史观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比如每

年“七一”“八一”“十一”的红色实践活动,组织和推动青年大学生到党性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和活动体验,让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参与其中,感受其中,增强爱党爱国情怀。过去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和当下突发事件的引导教育活动,也可以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载体。比如“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纪念活动等,让青年大学生正确认识到什么是历史和时代潮流,坚信正义必胜,树立好正确历史观、党史观。三是精心组织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教育。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是一种非常有价值与意义的实践路径。高校要精心设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主题,紧密结合当下形势和资源优势,将其作为形成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载体,坚持不懈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到广大农村、革命老区、城市社区,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志愿服务、知识下乡、技术下乡等实践活动,让青年大学生有更多机会沉浸式体验生活,亲身感受发展变化,对未来充满信心。

(四)坚持常态长效建设,构建从自发到自觉的巩固强化路径

正确党史观养成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强化、丰富和完善。一是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不断坚持和完善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机制,不断完善制度和载体,通过规范化操作、持续性推进、创新性做法、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正确党史观教育纳入立德树人全过程。加强资源整合,综合集成效应;用好各方资源,积极挖掘各类教育资源,让党情、党史教育走出课堂,走进生活实践。聚焦青年特点,贴近青年所思所想,加强教育教学方式创新,充分利用自媒体、互联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手段,激发青年大学生学习党史的自觉性、主动性,真正让青年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愉悦感、获得感、力量感。同时,加强党史教育人才的培养,建设一支有情怀、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推动党史观和党史教育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二是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将党史学在经常、融入日常。显性教育通过学校主渠道课程、学校组织的各类教育实践活动等,具有直接性和灌输性,是当前教育的主要途径。显性教育要坚持覆盖面,不断加强创新,立足青年大学生的特点,增强实效性和影响力。同时也要重视隐性教育价值和作用发挥,将隐性教育融入青年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发挥课程思

政滴灌教育作用,发挥育人工作者言传身教作用以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间断发挥“润物无声”效能。强化服务功能,在服务中发挥育人教育价值。比如,在大学生生活区建设党员先锋驿站,直接服务广大青年学生,在近距离的沟通、交流和服务中,强化青年大学生对党的认知和情感。三是积极构建良好的育人整体环境。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加强党史育人氛围营造,以良好的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和推动大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不断完善党史育人文化场景建设,加强针对性的设计,充分发掘校内外资源,借势借力打造活动品牌,让学生在浓厚的校园氛围中,在多姿多彩的活动开展中,不断淬炼正确党史观。高度重视和积极利用网络空间的育人功能,激发新媒体等线上育人活力,发挥好新媒体的独特优势,为大学生提供更具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激活其学习党史的内生动力^[15]。

结 语

正确党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青年是党和国家的未来,不断加强对青年大学生正确党史观的武装,既是现实所需,也是未来之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推动青年大学生不断树牢正确党史观,拥护党的领导、热爱党的事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才能更好地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竭的坚实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
-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徐成芳.论正确党史观的当代建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3):27-44.
- [4]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
-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9.
- [6]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11.
- [8]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J].中共党史研究,2011(10):5.
- [9]盛永胜,张晓东.习近平党史观的生成依据、丰富内涵和实践意蕴[J].理论视野,2022,265(3):33.
- [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
- [11]徐国锁,方勇.习近平党史观主体构成述论[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39(2):27-34.
- [1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J].求是,2021(23):6.
- [13]齐峰.方法、知识和价值:树立正确党史观的系统思考[J].系统科学学报,2023,31(2):40.
- [1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9.
- [15]叶福林,高哲.构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2(9):100-105.

Reflec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Xie Zhiang, Chen Hongsheng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is the cognitive basis and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CPC and its history correctly.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long-term significance for the Party's future to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among young college students. To fully understand, to deep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and to deeply study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are the ways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In order to cultivate young college students who embrace and love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by means of systematic study, educational infiltration, practical exercise and persistent consolid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young college students; correct view of the Party's history; scientific connotation; great significance; path of cultivation

禁毒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施路径

杨宇琦¹, 卢俊²

(1.台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2.浙江省公安厅 禁毒总队,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当前,各方对禁毒教育工作十分重视。禁毒教育的开展,具有多重价值意蕴:国家层面能激发家国情怀,提升制度自信;社会层面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长治久安;个人层面能保护个人生命,保障人民健康。禁毒教育的内容建构可从历史、知识、案例入手:以历史为镜,防范毒品再次侵蚀;以知识为基,介绍毒品种类及防毒方法;以案例为警,加深毒品危害认识。禁毒教育的主体架构上,党和政府统一领导,做好顶层设计;学校和社区组织协调,做到有序推进;具体实施者提升能力,着力有效落实。禁毒教育的实践策略上,营造环境,打造全社会禁毒氛围;优化方法,促进不同客体易于受教;创新载体,丰富禁毒教育形式。

关键词:禁毒教育;价值意蕴;内容建构;主体架构;实践策略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12

习近平总书记对禁毒工作十分重视,他指出:“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1]同时,他提到:“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2]从相关禁毒数据看,全国及省市毒品犯罪案件、缴获各类毒品、查处吸毒人员等数据同比皆大幅下降,现有吸毒人数、新吸毒人数、复吸人数也皆下降明显^[3-5],所以未来在毒品“打防管控宣”五个环节中,禁毒宣传教育的工作将关口前移。根据《禁毒法》第3条和第4条的规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禁毒工作“实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6]。以上重要论述与法规为开展禁毒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禁毒教育的价值意蕴

禁毒教育具有国家、社会、个人三重价值意

蕴。国家层面上,通过中外禁毒工作对比,能激发教育客体家国情怀,提升制度自信;社会层面上,可以有效减少社会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层面上,可提高教育客体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使其免受毒品危害,促进个体健康发展。

(一)激发家国情怀,提升制度自信

通过中外禁毒工作对比,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一是在毒品管控上。中国把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严重依赖性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都列为毒品。根据《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美国政府罔顾民众健康积极推进大麻合法化,联邦和各州政府对毒品和药物滥用监管不力,导致越来越多青少年成为受害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近四成美国高生长期使用大麻^[7]。二是在吸毒人员康复上。中国对吸毒人员提供免费强制戒毒学习,再通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工作,使其健康回归社会。根据《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22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年内吸食过大麻的美国年轻人比例达43%;

收稿日期:2023-12-30

作者简介:杨宇琦(1982—),女,浙江黄岩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卢俊(1982—),男,浙江龙游人,研究方向:禁毒教育。

曼哈顿政策研究所2022年8月4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死于毒品和药物滥用的美国人急剧增加,每年超过10万人。美国放任毒品和药物滥用愈演愈烈,折射出美国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7]。在中外禁毒工作的对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言而喻,从而提升教育客体的制度自信。

(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长治久安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第五十五章《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中,明确提出“继续开展好禁毒人民战争”^[8]。吸毒对社会稳定有极大的危害。一是吸毒诱发犯罪活动。吸毒和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吸毒者在缺少毒资情况下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进行以贩养吸、贪污、诈骗、盗窃、抢劫、凶杀等犯罪活动。二是吸毒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吸毒者驾车导致车祸危害交通安全、传播传染病引发公共卫生安全、吸毒后产生幻觉伤害他人破坏治安安全。吸毒不仅侵害人体健康,也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三是吸毒消耗社会财富。吸毒者在耗尽个人和家庭钱财后,为筹毒资四处举债甚至铤而走险,而党和政府为戒毒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禁毒预防宣传教育每投入1元,可以给社会减少20元的经济损失。^①总之,通过禁毒教育,能降低吸毒犯罪率,可减少吸毒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也能减少吸毒导致的社会财富消耗,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长治久安。

(三)保护个人生命,保障人民健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9]国家“十四五”规划第五十四章《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明确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8]。开展禁毒教育能有效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方面,禁毒教育能有效填补教育客体对毒品的认知空白,加深其对毒品危害的认识,在其思想意识中筑起一道防毒安全警戒线,也给社会和学校敲响毒品离青少年学生并不远的警钟;另一方面,禁毒教育能精准提升教育客体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也让教育客体在与毒品狭路相逢时勇于说不、敢于举报,让更多的人免受毒品的戕害,促进教育客体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二、禁毒教育的内容建构

禁毒教育的内容可从历史、知识、案例三个维度来建构。从历史维度看,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禁毒历史纳入教育内容,既可加强教育客体对禁毒重要性的认知,也可增强其禁毒信心;从知识维度看,禁毒教育需普及毒品相关基础知识,从而让教育客体具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从案例维度看,需将各类真实吸毒案例纳入教育内容,可增强警示效果,从而加深教育客体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一)以历史为鉴镜,防范毒品再次侵蚀

从历史维度看,禁毒教育包括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新中国禁毒、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毒潮侵袭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的鸦片之祸,给中国带来的切肤之痛永远无法磨灭。一是人民深受其害,吸食鸦片者健康受损,中国人也被称为“东亚病夫”;二是国家财富大量外流,据统计,1840年以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为40多万箱,价值约2亿两白银,而1842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3714万两白银^{[10]262};三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即采取坚决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毒运动,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惩制贩毒品活动,依法处理毒犯5万多名^{[10]525},使2000多万吸毒者戒除了毒瘾^{[10]486}。短短三年时间,就基本禁绝危害我国两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10]526}。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由于我国毗邻“金三角”毒源地的特定地理位置,境外毒品不断向中国境内渗透,导致已经禁绝的毒品祸害又卷土重来,毒品违法犯罪死灰复燃并逐步蔓延。我国政府禁毒态度明确、决心坚定,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同毒品违法犯罪进行坚决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加大重点地区整治力度,坚决摧毁制贩毒品团伙网络,深挖涉毒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

(二)以知识为基础,了解毒品及防毒方法

从知识维度看,禁毒教育的内容包括毒品定

① 台州市“护苗行动”禁毒进校园宣教现场推进会材料。

义、毒品分类、常见毒品、认识误区、拒毒方法。一是毒品定义。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严重依赖性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二是毒品分类。根据国家禁毒办文件和禁毒工作实践,毒品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为第一代传统毒品、第二代合成毒品。第三代新精神活性物质。三是常见毒品。第三代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的流传已远超第一代、第二代毒品。市面流通的第三代新精神活性物质主要分为合成大麻素类、卡西酮类、苯乙胺类、派嗪类、氯胺酮类、芬太尼类、植物类7类;其常见有“小树枝”“上头电子烟”“僵尸浴盐”“减肥药”“邮票”“蓝精灵”“神仙水”等,而且经常变换名称或包装让人防不胜防。同时还有常见的毒品替代品“笑气”“依托咪酯”等。四是认识误区。需破除吸毒者认为吸毒能减肥、治病、提神、吸一次不会上瘾等误区。五是拒毒方法。可介绍“545法则”(见图1),既构建思想上的防毒警戒线,又提升现实中直面毒品时的拒绝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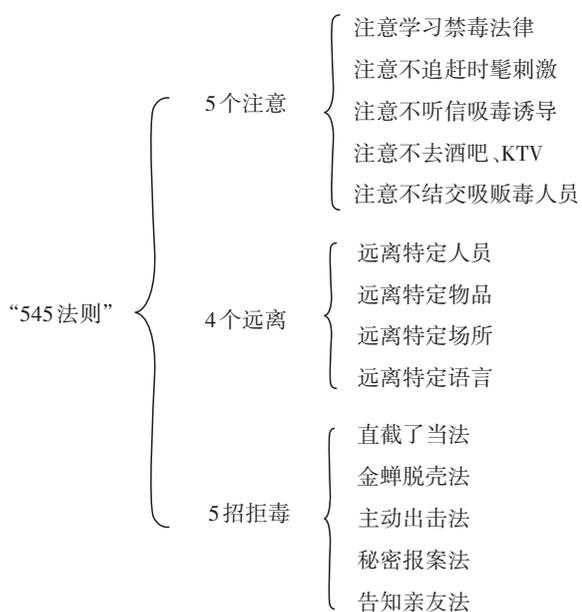


图1 拒毒方法——“545法则”

(三)以案例为警示,加深毒品危害认识

从警示维度看,禁毒教育的警示案例包括毁灭自我、祸及家庭、危害社会三大类,可在讲述具体毒品时穿插对应危害案例。一是毁灭自我类案例,可分为伤身体、减寿命、毁人生。伤身体类案例可先总体介绍吸毒对人体各器官或系统带来的伤害,再展示个别案例,例如吸毒前后

身体特定部位对比变化、吸毒后戕害身体行为、吸毒后因健康受损对生活不良影响等;减寿命类案例可展示客观统计数据,先宏观上总体介绍吸毒减寿命的数据案例,再微观上细分吸食各类毒品对应的减寿命数据;毁人生类案例可从不同年龄段切入,青少年吸毒毁灭学习生涯、成年人吸毒事业尽毁等,也可增加吸毒人生与不吸毒的成功人生对比案例。二是祸及家庭类案例,可从父母吸毒对子女的危害、一人吸毒导致家庭破裂等角度切入:父母吸毒对子女的危害,可展示父母吸毒遗传毒瘾、性病给子女类案例,父母吸毒因毒资不够抵押孩子类案例,以及父母吸毒弃孩子于不顾并致死案例;一人吸毒导致家庭破裂类案例,可运用吸毒者访谈,展示吸毒让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现实情况。三是危害社会类案例,可从毒资来源、直接危害社会治安两个角度切入:毒资来源的统计数据可客观表明毒资大比例来源于刑事犯罪;直接危害社会治安可展示吸毒后导致车祸、绑架、伤害他人等案例。总之,吸毒案例的展示,要引起教育客体对吸毒危害的巨大震撼感,以达到发人深省的警示效果。

三、禁毒教育的主体架构

禁毒教育的主体架构需明确顶层设计、组织协调、具体实施的相应主体,各主体需在相互协作基础上完成各自工作。顶层设计层面,党和政府需统一领导禁毒教育,做好总体规划;组织协调层面,学校和社区应有序推进禁毒教育安排;具体实施层面,实施者需提升能力,有效落实禁毒教育。

(一)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统一领导禁毒教育

一方面,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与主张,禁毒教育也需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顶层设计,下好全国禁毒教育一盘棋。目前,浙江省吸毒人员外省流入占比过半,台州市吸毒总人数外省籍占比过半。^①所以,禁毒和禁毒教育工作决不能局限于一省,需全国各省份共同携手努力,才能全面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另一方

① 浙江省禁毒办2023年1月至11月统计数据。

面,禁毒委员会是禁毒教育统一协调者,要加强部门联合,推动禁毒教育进课堂。公安部门,要高度重视禁毒教育进课堂活动,推动青少年学生系统性地掌握毒品知识及危害,提高识毒拒毒防毒能力;教育部门,要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合,落实禁毒教育进课堂的“最后一公里”;督导部门,要防止基层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出现思想不重视、落实不到位现象,促进禁毒教育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发挥作用。只有这样,禁毒教育覆盖面才能广泛,系统性的教育才能落到实处。

(二)学校和社区有序推进,组织协调教育安排

一方面,加强学校禁毒教育力度,扩大受教育人数覆盖。学校是禁毒预防教育的主场所,一要解决场地限制,让课堂禁毒教育尽量多覆盖班级,如能覆盖全校学生则最佳;二要解决偏远地区学校授课难情况,协调师资或教学资源到偏远地区学校;三要积极发挥大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作用,对禁毒教育进行查漏补缺;四要加强学校对禁毒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效推动禁毒教育落实到位并解决各种问题。另一方面,推进社区禁毒教育,发挥社区禁毒专职社工作用。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禁毒专职社工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社会面管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禁毒专职社工严格落实吸毒人员的定期尿检、发检,对于降低复吸率意义巨大。但因各地待遇不统一,工作强度较大,导致禁毒专职社工队伍流动性较大且不够稳定。在社区禁毒教育推进上仍需进一步发挥禁毒专职社工的作用,加强禁毒专职社工培训学习,提高其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工资待遇。

(三)具体实施者能力提升,着力落实禁毒教育

禁毒教育实施者能力提升上,应从加强禁毒师资、打磨禁毒精课、提升网络禁毒教育视频质量等方面着力。一是加强禁毒师资,一方面要挑选优质师资,优先选择上课效果佳、综合素质强的教师、社工、民警,以期提高禁毒教育的课堂实效;另一方面要选送师资去专业学校培训、实地调研戒毒所、访谈一线缉毒民警等,提高禁毒教育专业知识。二是打磨禁毒精课,在集体备课环节,集中力量对授课出现的疑难问题共同探讨、研究解决;在授课实践环节,根据不同层次的听众不断完善课件内容、调整讲课方法;在

素材积累环节,禁毒教育者对于禁毒新闻、禁毒知识、禁毒法规需保持实时关注;在教学评比环节,通过举办“禁毒教育”为主题的思政课评奖评优活动,提高广大思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提升网络禁毒教育视频质量,在禁毒动画视频上,要制作精良,时长合适,还需经常更新测试试题,及时改正错误试题;在禁毒实录视频上,选择录播教室,邀请优质师资录制禁毒教育优质课。

四、禁毒教育的实践策略

在禁毒教育的实践策略上,可从营造环境、优化方法、创新载体三个方面着力。在营造环境上,打造全社会禁毒教育的氛围;在优化方法上,促进教育客体易于接受禁毒知识;在创新载体上,丰富各类禁毒教育的形式。

(一)营造环境,打造全社会禁毒教育氛围

营造全社会禁毒氛围,需各方面协调联动。一是在领导主体层面,党和政府在舆论宣传上,可通过新闻媒体营造正能量的禁毒教育舆论氛围,展示各类禁毒教育过程与成果;在课程建设上,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禁毒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推动禁毒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11]。二是在组织主体层面,学校与社区在组织协调上,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禁毒教育课堂、搭建禁毒教育平台、建好禁毒教育师资,推动禁毒教育教研结合,推出优质禁毒教育资源,做优禁毒教育品牌示范创建活动。三是在实施主体层面,具体实施者要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深入了解禁毒工作,加强实地调查与研究。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拓展禁毒教育课堂内容,促进具体实施者讲深讲透讲活禁毒课。四是在教育客体层面,可集合社会力量与资源打造禁毒馆等实践教学基地,供教育客体开展实践教学参观学习,从而促进禁毒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教育客体更好地掌握禁毒教育内容。

(二)优化方法,促进不同客体易于受教

内容确定之后,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好的方法可以极大地提升教育的感染力和实际效果^[12]。禁毒教育需关注教育客体差异,优化教育方法。在课堂之内,一是加强对教育客体的禁毒问卷调查,

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案,例如在“笑气”警情相对高发的县市区,实施主体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强调“笑气”的危害性,并进行警示案例教育。二是善于采用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方法,注重发挥教育客体的主体性作用,积极运用视频资源、情景展示、话题讨论、课堂辩论等方式组织课堂实践。三是面对特殊聋哑群体开展禁毒教育时,授课者应放慢语速、语调温和,配上简单的肢体语言,有条件可配备同声手语传译助教,协助开展教学、课堂答疑等工作。四是面对不同年龄之间的差异,学龄低的群体可采用相对活泼的教学方法和选用相对浅显的禁毒内容,学龄高的群体则可采用小组研学方法和增加法律等知识。在课堂之外,还可辅以模型展示法、实地考察法、图册宣传法等方法提高禁毒教育效果,也可辅以线上同步直播法、视频录播法等,扩大教育客体的听课覆盖面。

(三)创新载体,丰富各类禁毒教育形式

创新禁毒教育载体,可丰富禁毒教育的形式。一是加强主要载体,禁毒课堂教育效果最佳,需扎实有序推进禁毒教育进课堂,通过现场授课,讲清毒品分类、吸毒诱因、毒品危害、毒品预防等知识点,打通青少年学生禁毒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让学生真正参与禁毒教育并入脑入心,同时解决网络禁毒教育由家长代劳等问题。二是借助辅助载体,发挥新媒体视频作用。以“互联网+禁毒”发挥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宣传作用,视频时长30秒到5分钟不等,内容以禁毒热点新闻、吸毒前后对比、缉毒危险现场、毒品知识普及等为主。三是利用固定载体,发挥各类固定禁毒场馆作用,例如禁毒教育展厅、体验场馆、主题公园等,可让禁毒教育客体身临其境,通过数字资源感知毒品危害。四是开发活动载体,各级公安部门、禁毒办、学校、社区等,可开展禁毒知识有奖竞答、发放宣传册、展览

禁毒展板、开展禁毒酷跑等活动。总之,禁毒教育载体创新形式越丰富,越可吸引不同群体接受禁毒教育。

参考文献:

- [1] 人民网.把禁毒工作深入开展下去 习近平强力部署[EB/OL].(2022-06-26)[2023-12-12].<http://cpc.people.com.cn/n1/2022/0626/c164113-32456628.html>.
- [2] 习近平.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N].人民日报,2018-06-26(1).
- [3]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2022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EB/OL].(2023-06-21)[2023-12-12].http://www.nncc626.com/2023-06/21/c_1212236289.htm.
- [4] 浙江禁毒.回眸2022!禁毒“浙”一年[EB/OL].(2023-01-18)[2023-12-12].<https://mp.weixin.qq.com/s/C1Gdpzr6AyM3D4dcYyong>.
- [5] 台州禁毒.向毒品说“NO”!台州禁毒成绩单来了[EB/OL].(2023-06-16)[2023-12-12].<https://mp.weixin.qq.com/s/zZ3Kc-wbBTUOehKwEkLSRhg>.
-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2.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N].人民日报,2023-03-29(17).
- [8] 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2023-12-12].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8-49.
- [10] 梁挥展,徐勇.中国禁毒历史研究[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21.
- [11] 教育部.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2023-06-21)[2023-12-12].http://m.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208/t20220818_653672.html.
- [12] 盛跃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论:现代性观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32.

The Value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Drug Control Education

Yang Yuqi¹, Lu Jun²

(1. School of Marxism,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2. Anti-drug Brigade of Zhejiang Provincial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all parti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drug control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rug control education has multiple value implica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can stimulate patriotism and enhance confidence in system; at the social level, it can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long-term peace and stability; at a personal level, it can protect personal life and ensure people's health.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drug control education can start from history, knowledge, and cases, such as using history as a mirror to prevent the re-erosion of drugs, introducing the types of drugs and their prevention methods based on knowledge and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rug hazards through case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main structure of drug control educatio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ify leadership and do a good job in top-level design; school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hould coordinate to achieve orderly progress; specific implementers should enhance their abilities and focus 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drug control education, an environment with a comprehensive anti-drug atmosphere in society should be created; methods to promote the ease of learning for different objects should be optimized; carriers to enrich the forms of drug control education should be innovated.

Keywords: drug control education; value connotation; content construction; main structure; practical strategy

(上接第73页)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career identity.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perceived respect, job satisfaction and school external reput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 counselors' career identity, among which perceived respect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chool external reput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areer identity of new counselors is generally happy with hidden sorrows, and the career identity of counselors of different working years presents a mountain peak shape.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areer cognition, enlightening the thinking of career value, firmly adhering to career belief and doing a good job of career management.

Keywords: counselor; career identity; influencing factor; way

截屏社交的“刺猬困境”

——聊天记录再传播中隐私边界的游移与重塑

戴颖洁, 潘茹雪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截屏社交指个体将聊天内容截屏并转发给他人,以期拉近社交距离的行为。截屏社交会打破聊天双方的隐私平衡,使原本私密的聊天记录面临隐私风险。对此,个体需保持边界敏感、重塑边界契约;平台需提供技术支持,加强用户信息自决权、强化审核把关、简化维权通道;法律应破除适用障碍,从法理层面与实践层面共同着手,保障截屏社交中的信息安全。

关键词: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截屏社交;隐私边界;隐私权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1.013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提出著名的“刺猬困境”理论,以此描述人际交往中的“边界”原则。“刺猬困境”即一群刺猬在寒冬时会想要彼此靠近来取暖,但当靠得太近时,又会被彼此的刺所刺伤。人际交往中亦是如此,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距离、维持一定的隐私边界,才能避免伤害。大数据时代,移动设备提供了便捷的截屏功能,个体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与好友的聊天内容截屏转发给第三人,以拉近与第三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可以说,截屏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方便人们交流互动,成为交友过程中建立对等信任的重要方式。一般而言,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内容是较为私密的信息,除非有人刻意泄露,否则第三人很难知晓。但如今,个体交往时的聊天记录始终处于可记录、可回溯的状态,随时可能通过截屏被传播给第三人,用户的信息自决权近乎失控。加之网络社会本就以“联结”为设计原则,“分享”几乎是个人在社交媒体中得到社交回馈的必要前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聊天记录的截屏传播,使用户开始陷入“隐私不保”的境

地。尽管聊天对象的复杂性与“截屏转发”的便捷性增加了其中的隐私泄露风险,然而,现有的隐私权法律保护框架却难以覆盖社交媒体常态化背景下网络聊天的内容。在很多情况下,即便个人聊天信息被擅自截屏传播,也很难在法律上获得救济。因此,面对时代的更迭,及时厘清截屏社交中的隐私边界,强化个体隐私管理意识并完善隐私保护法律框架迫在眉睫。

一、文献综述

(一)传播隐私管理理论

1.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的提出。传播隐私管理(以下简称为CPM)理论由桑德拉·佩特洛尼奥(Sandra Petronio)于2002年提出,借用“边界”这一比喻来说明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边界”指个人愿意将私人信息与对方分享的界限。当个体将私人信息的访问权授予他人时,“他人”就被拉入到了“隐私边界”之内,成为信息的“授权共同

收稿日期:2023-12-10

基金项目: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网络主播劳动权益保障的实施困境及优化治理路径”(23NDJC233YB)

作者简介:戴颖洁(1983—),女,浙江嘉兴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媒介伦理、大众传媒法;潘茹雪(1998—),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众传媒法。

所有者”,并被“原始所有者”期望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来管理披露的信息。桑德拉·佩特洛尼奥认为,个体都有自己的隐私边界,并会按照一定的规则管理自己的边界;个体的隐私管理系统由三个过程组成:隐私规则、边界协调以及边界动荡。不同个体有不同的隐私规则,一般由文化标准、性别标准、情境标准等因素共同决定,隐私规则可以发展和变化,也可以成为指导隐私判断的稳定因素;边界协调是指信息所有者与接收者之间协商边界规则进行隐私边界管理的过程;当边界协调失效时,边界可能会变得动荡,个体会尝试纠正问题,将新的信息纳入规则系统,以便重新实现协调^[1]。

2.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的相关研究。国外利用 CPM 理论进行相关研究发展得较为成熟。桑德拉·佩特洛尼奥等将该理论应用于社交媒体研究,以量化分析方法探析大学生对自己博客隐私进行管理的措施^[2]。Eden Litt 利用质化分析方法研究人们在网络环境中的边界管理问题,指出年龄、性别和动机等因素皆会对人们的隐私界限产生影响^[3]。Jeffrey T. Child 等从个人隐私规则的调整出发,解释了用户基于什么因素处理父母 Facebook 的好友请求,以及接受请求后在多大程度上调整了隐私规则与隐私边界^[4]。

国内亦有众多研究者基于 CPM 理论对隐私边界、隐私管理等问题展开研究。王波伟等运用 CPM 理论来解析大数据时代微信朋友圈的隐私规制,认为可以通过文化标准、社会性别标准、动机标准、环境标准、风险—收益标准等五个标准来完成朋友圈中的隐私边界协调,从而对朋友圈中的数据化表演进行合理节制,保护表演者的隐私^[5]^[4]。刘百灵等基于 CPM 理论,以隐私控制和隐私风险作为边界规则,对移动商务用户信息披露意愿影响因素展开研究^[6]。唐杰等提出了隐私边界管理模型,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隐私政策和隐私保护技术四种代理保障机制与 CPM 理论有机结合,阐释对 App 用户隐私感知的作用^[7]。曾秀芹等还以 CPM 理论为框架,探究家庭沟通中父母和孩子的隐私规则问题^[8]。

综上所述,CPM 理论借用“边界”描绘社交媒体中“无形”的隐私界限,并对“边界”的界分与管理做了系统阐述,为研究社交媒体中的隐私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以往研究大多侧重于个体在朋友圈、博客等“公共社交平台”中的隐私管理

行为,对本就处于私人空间中的聊天记录隐私风险缺乏探讨。就个体而言,“聊天记录”中的个人信息相较于公共平台中的信息,具备更强的私密属性。然而,这种更为私密的信息却面临日益严重的隐私泄露风险,这一现象值得引发关注,也具备一定研究空间。

(二) 截屏社交问题研究

1. 截屏社交中的隐私困境。目前国内截屏社交问题研究大致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对截屏社交发生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二是对聊天记录再传播中隐私边界进行研究;三是对截屏社交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截屏社交中的隐私问题是本研究的重点。

美国学者萨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于 1890 年提出隐私权概念。此后,隐私权便逐步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利。在互联网情境下,线上交往与线下交往交织,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杂糅,人们隔离外界的围墙被瓦解,隐私保护也变得愈发复杂。申琦对中国裁判文书网颁布的 342 个“隐私权纠纷”案裁判文书进行量化分析后,指出司法实践中的隐私权更倾向于保护现实空间中的“私有领域”,流动于网络和现实空间的“个人信息”却容易被忽视^[9]。网络空间中的隐私保护面临困境,对于聊天记录截屏的保护更是举步维艰。目前来看,较少有专门涉及截屏相关规制的法律条文,对于截屏社交中的隐私保护主要依据“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条例来实现。

从隐私权的角度来看,尽管隐私权内容不断扩展,但面对截屏社交中内容多样的聊天记录时,仍然存在覆盖有限、隐私侵犯边界认定困难等问题。潘星容等指出,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客体范围相较传统隐私权有所扩大: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公民姓名、住址等信息外,还包括公民的网上各种活动信息,如网络社交账号的聊天记录等。但聊天记录的内容往往包罗万象,很难对其进行具体界定,也很难全部纳入保护范围之内^[10]。何金海从聊天记录保护范围覆盖不周全、传播主体义务不明确、聊天记录侵权认定标准不统一、救济渠道不健全四个角度,阐述了聊天记录再传播所面临的隐私保护困境^[11]⁹⁸⁻¹⁰⁰。实践中,对聊天记录中的隐私信息进行认定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李欢等指出若在截屏时将对方的头像和昵称隐去,言论本身的传播并不会和特定个体相联

系,主体缺失将导致隐私权难以成立^{[12]180}。

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来看,我国《民法典》第1034条将个人信息界定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等”。《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将个人信息界定为“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可见,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判定重在“识别性”,即“根据这一信息可明确辨别信息所有者的身份”。在实际中,有些聊天截屏虽已做匿名化处理,但了解具体情境的第三方仍能根据截屏内容判断当事人身份,法律对这部分内容的保护仍存在一定缺失。

2. 截屏社交中的隐私管理。以往对截屏社交的隐私管理措施研究大致从内容、法律、平台及个人四个层面展开。张爱军等依据截屏的内容将其划分成分享型、内容型、凭证型以及证据型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根据截屏的内容对其传播进行分类管控^[13]。何金海从法律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聊天记录再传播中的隐私保护问题,提出应从完善聊天记录法律保护的覆盖范围、明确聊天记录传播中的各类主体义务、统一侵权认定标准、健全侵权救济渠道和加强公众法治意识等方面着手,让公众对聊天记录传播的边界有清晰的认识^{[11]100-101}。李欢等认为在截屏社交中,用户对自身言论失去控制权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法律和平台都应该着手对这一行为进行制约^{[12]83}。胡沈明等提出还应强化个人的自我行为规制,提高表达界限意识,培养媒介素养意识,增强法制法律意识,从而避免在聊天记录再传播中出现风险^[14]。

综上,关于截屏社交的研究日渐增多,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背景。但是,以往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关于截屏社交中隐私问题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隐私失灵的现状以及隐私保护的困境,对于截屏社交中的隐私边界应如何界定、如何保护的探讨较少;其次,关于截屏社交的研究大多止步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尽管有部分文章提到从平台、个人等角度明确隐私边界,但都未基于此展开具体的讨论。因此,本研究以CPM理论为框架,重点从隐私主体的角度着手,对截屏社交中的隐私边界及其管理问题展开研究。

二、截屏社交中隐私边界的游移

截屏社交作为当下人际交流的重要方式,从实现方式来看,易于操作,简单便捷;从功能作用来看,拉近距离,建立信任。但其中也存在关于个体隐私的争议。

(一) 隐私规则紊乱:“距离”与“共识”的消逝

数字化打破了“距离”的限制,“距离”不再成为交友的阻碍。个人生活被裹挟进信息技术发展的湍流,利用数字媒介展开沟通成为现代社会人际沟通的主流。社交媒体互联互通的特点,使网络中虚拟连接与现实连接交错,人们的社交圈逐渐脱离“地缘”“血缘”控制,转而拥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线上社交好友人数的激增以及圈层的紊乱,使得信息披露与共享的“共识”不复存在。即便同处一个社交圈中,基于不同的生活及文化背景,人们遵循的隐私规则仍不尽相同:对自我披露的尺度把握不一,对“什么信息应该保密”的感知也愈发紊乱。这种“共识”的缺失无形中增大了隐私泄露风险,个人信息的私密性很难受到有效控制与保护。

(二) 隐私边界模糊:“开放”与“封闭”的失衡

桑德拉·佩特洛尼奥等认为,隐私边界有“开放”和“封闭”之分。“开放”是指隐私所有者愿意通过自我表露或授权访问的形式将个人隐私告知他人;“封闭”是指隐私所有者将隐私信息私有化,他人无法获取^[15]。社交平台中的隐私边界是动态的多重边界,并非一成不变。以微信为例,微信中的好友成分往往较为复杂,现实中的“强关系”与虚拟世界的“弱关系”相互交错,隐私边界也在“开放”与“封闭”之间不断摇摆。

决定边界“开放”或“封闭”程度的,往往是个体在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就个体而言,边界的“开放”可以带来更多社交资本,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边界的“封闭”能够确保隐私信息的安全性。有学者从涵化理论的视角对人们的隐私观念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会促使网民产生更为开放和包容的隐私态度^[16],人们更加愿意通过适当的自我披露来获取对方信任,拉近彼此的社交距离。在隐私边界稳定的状态下,个体只需做好协调,把握好隐私边界的“度”,即

可在“自我披露以获取信任”与“避免隐私泄露风险”之间维持平衡。但实际上,社交平台中动态变化的隐私边界增加了边界协调的成本与难度,隐私边界在“开放”与“封闭”的摇摆中常常处于失衡状态,个体隐私泄露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三)隐私管理失控:“信息他决”与“不可删除”

社交平台的使用极大拓展了用户的隐私共有边界,使得聊天记录成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社交媒体中的“私聊”与“群聊”都明确了信息的开放程度,但截屏技术却使原本存在于后台的聊天记录有被置于前台展示的风险。个体在聊天中分享的信息可能会扩散到陌生圈层中,与自己不熟悉的人也可能成为隐私信息的共有者,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个体对隐私的掌控范围。在传统的人际传播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信息自决”的权利,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一经发出就可能不受控制地被陌生人解读并二次传播,个体的“信息自决”被“信息他决”取代,隐私管理也面临失控风险。

不仅如此,相比于公开发表的社交动态,聊天记录中的披露痕迹更难被抹除。个体在微信朋友圈进行自我披露,可以通过“设置分组”“设置可见范围”等操作,控制自己的隐私信息“向谁透露”“透露到何种程度”。但是,在聊天记录中的信息并不独属于个人所有,聊天双方都可以随时调取聊天内容,不管是删除聊天记录还是删除好友,都只是单方面的行为,并不能作为披露隐私之后的“补救措施”。并且,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公民隐私逐渐超越空间隐喻而沿着时间维度展开,成为被数字技术记录的“隐私档案”^[17]。即使聊天记录的原始存档已被删除,但一旦被二次传播,散落在互联网各个角落的截屏将会留存多久将不再可控,这种“隐私档案”的积累在未来将有什么隐患也不得而知。可见,在聊天记录再传播的过程中,个体的隐私管理处于近乎失控的状态。

三、截屏社交中个体隐私边界的重塑

CPM理论认为,个体会通过隐私边界协调来进行隐私管理,而协调的焦点主要围绕隐私边界的连接、边界渗透性以及边界所有权展开。在聊

天记录的二次传播过程中,聊天记录拥有者的隐私边界无疑是失序的,想要恢复个体对隐私的掌控,需要从隐私共有者、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法律等多方面共同着手进行。

(一)个体进行双向协商

边界连接对应的是个体将自己的隐私信息“向谁说”的问题,这是掌控隐私边界的关键所在。边界连接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意味着个体的隐私管理需要“连接”双方的协商。

1. 限定连接范围,保持边界敏感。有学者用“数据化节制”来描述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的隐私保护行为,数据化节制使得很多人尽可能远离那些可能会共享隐私的事情^{[5]38}。在管理边界连接时,同样需要这种节制。一方面,个体应明确自己隐私边界的连接范围,对自己的社交网络进行筛选与把控,如需将他人拉入共有边界,将慎之又慎。对于“群聊”而言,群内好友应协商入群条件,设置“入群需实名备注”等规则,防止陌生人被拉入边界当中,引发争议。另一方面,个体应始终保持信息披露的敏感度,对人际交往对象进行分级分类,将其分为“长期亲密关系”“长期普通关系”“近期亲密关系”以及“近期普通关系”等,并根据不同对象实时调整自身隐私边界。例如,面对家人、伴侣等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人时,个体可以较为放心地进行隐私披露;但对网友、不甚熟悉的“弱关系”好友等,则需格外谨慎,防止信息的无端泄露。

2. 调试隐私规则,再塑共享“契约”。桑德拉·佩特洛尼奥认为,共享信息的行为往往受制于关系的“契约”,即信息的共同所有者协商一致的隐私管理规则^[18]。但如今,这种契约精神已经在便捷的社交媒体分享过程中逐步式微。因此,在限定边界连接范围后,对已有边界的隐私规则进行调试,再塑共享“契约”也是关键之举。

具体而言,对于已经掌握自身隐私信息的群体或即将进入自己隐私边界的新成员,个体应与其积极协商,主动告知隐私规则,在聊及私密信息时,及时告知对方“不希望聊天内容被他人知晓”的意愿,避免对方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对他人开放隐私边界,将聊天截屏给第三人。此外,处于社交网络中的人往往并不单纯是信息披露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信息接收者的角色。在作为信息的共同所有者时,个体也应严格遵守“契约”,主动承担保密责任。

(二)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互联网时代,不同平台间的切换使用几乎不存在障碍,“截屏”的聊天记录内容能够很轻易、迅速地在平台间流转,抵达不同圈层用户,造成隐私边界不断渗透以及隐私泄露风险。例如,微信用户与好友的聊天记录内容很可能由于二人关系变动而被曝光在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导致个体隐私受到侵犯。网络社会中聊天记录的信息失控在一定程度上由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导致。因此,平台应建立一定的规则,为用户的隐私保护提供必要技术支持。

1. 强化用户信息自决权。信息自决权强调个人对信息的控制权^[19]。一般而言,信息一经发出,其控制权就等同于交予他人,后续是否会被截屏传播、必要时能否销毁处理,发送者都无从得知。因此,保护聊天记录不被泄露的关键一步,在于强化个人对信息的自决权。

平台应增加对于用户聊天内容的保护力度,尽可能保证聊天内容的流转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例如,腾讯会议App可在发起会议时设置“禁止截屏或录屏”,这一功能可借鉴移植到社交软件中,让用户聊天时能够开启“禁止截屏”“对方截屏提醒”“需聊天双方确认方能转发聊天记录”等设置,从根源上减轻边界渗透的可能性;或将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功能移植到聊天记录中,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聊天记录有泄露风险时,可及时隐藏自己所发内容。同样,当其中一人删除好友时,聊天记录中他所发送的内容也应在网络上同步删除,避免其隐私信息有进一步流通的风险。另外,平台也可尝试采用新兴的“端到端加密”技术,以提升用户进行信息交流时的安全性。

2. 加强平台审核把关。著作权领域中常用“避风港原则”描述平台责任,即当网络平台只提供空间服务,而不制作网页内容时,如果其被告知侵权,只要能够及时尽到删除义务,即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美国法律中还有“红旗原则”来限制“避风港原则”的使用,即当侵权事实显而易见,像红旗一样飘扬时,平台不能以“看不见”为由来逃避责任^[20]。无论是“避风港原则”还是“红旗原则”,都强调了网络平台在侵权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隐私领域亦是如此。

网络平台有权力也有责任对平台内容进行筛查与把关,避免用户隐私信息在平台上扩散。腾讯微信平台的用户协定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即

有权依据判定终止传播并删除具有违法性、侵权性、不当性的内容,新浪微博等平台也有类似条款。正如“红旗原则”所指,当侵犯隐私权的信息在社交平台上被截取并大肆传播时,平台也很难推脱责任。因此,平台应进一步加强对用户上传内容的审核把关:一方面,不断测试提升机器审核的精准度,保持机器的深度学习,将可能引发隐私争议的截屏内容以关键词形式悉数添加至数据库予以重点关注;另一方面,涉及隐私以及聊天截屏的内容应交由人工再次审核,根据具体情境具体判定,保证审核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其中私密信息的大肆流通。

3. 简化平台维权通道。平台应针对侵权情况设立“快速举报通道”,对举报内容及时审核,视情况删除。目前来看,平台提供给用户的维权渠道并不便捷,用户在面临隐私信息被截屏传播的状况时,很难从平台方获取帮助。以微信为例,投诉侵权账号至少需要经过6~7步操作,操作选项的位置并不显眼,很难一眼注意到。并且,对账号侵权行为的投诉通道中,仅有针对“头像/昵称等资料”以及“朋友圈内容”的投诉,当用户聊天记录内容被截屏传播时,无法在对应入口提交侵权材料,投诉成功率也会随之降低。另外,即使用户投诉成功,投诉结果也需要1~3个工作日才能确定,从互联网爆炸式的传播速度来看,隐私泄露的后果早已无法估量。

社交平台中维权成本的昂贵与维权结果的不确定,使得很多用户在面临聊天内容被截屏转发的情况时,往往选择息事宁人、不予处置。针对这一现象,平台可开设“快速举报通道”等低成本维权方式,支持用户一键投诉,并尽可能缩短投诉处理时长,或在接到投诉时立刻对所投诉信息作“冻结”处置,再对投诉结果进行判定,尽可能在截屏内容刚开始传播之时及时阻断,避免隐私信息大规模流通,降低对当事人的伤害。

(三)法律破除适用障碍

用户虽拥有边界所有权,但对边界所有权展开有效保护却显得极为困难。在个体交往层面,无规制的“截屏社交”无疑侵犯了个体隐私权;但截屏形式多样,聊天记录涉及内容又极为复杂,哪些内容属于侵权范畴、需要按照哪些条例处理都有很大争议。因此,从法律方面对截屏社交进行规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法理层面:明确司法判定标准。数字时代,

隐私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随着个人信息流动性的加强,隐私信息和个人信息的交叠在所难免,这在相关司法实践中引发了种种疑难。隐私信息和个人信息是构成聊天记录内容的重要部分。因此,及时明确相关司法判定标准,进一步在法理层面明确二者的概念以及适用原则,对于保护聊天记录中的隐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针对隐私信息和个人信息主要采取二元保护模式。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依据,2010年的《侵权责任法》和2021年的《民法典》明确将隐私权列入了保护范畴,但由于这两者具有重合性,导致实践层面常常难以明确区分,司法救济亦会在侵权行为认定及侵权责任认定等方面面临困境^[21]。若要更全面地保护公民聊天记录的内容,则必须在法理层面处理好隐私信息与个人信息的关系,厘清二者的概念,准确区分二者的保护规则,形成清晰完善的法律治理结构。另外,对于隐私信息与个人信息交叉部分的私密信息,尽管《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规定了“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但私密信息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亦存在难题。对此,应根据“隐秘性、私人性、可识别性、记录方式特定性”等具体要件,以补充法等形式明确其界分标准,进而更准确地适用法律体系,避免保护体系错位。

2. 实践层面:明确侵权类型及场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可根据聊天记录内容及产生情境的不同,明确侵权类型及场景以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根据聊天记录的内容性质将其分类,以明确具体的侵权类型,推定其适用的法律保护体系。具体来看,聊天记录信息性质大致可归为隐私信息、私密信息、个人信息、一般信息等四类。其中,隐私信息与个人信息指法理层面上没有争议、可明确适用于对应保护体系的信息。私密信息则指隐私信息与个人信息交叉部分、具备“可识别性”等个人信息特质的信息,对此,在从法理层面明确私密信息的界定标准后,按照《民法典》中的规定处置即可。

在司法实践层面较有争议的是聊天记录中的一般信息。一般信息指聊天双方讨论、分享互相的生活等内容,一般信息很难明确界定在法律保护的范畴之内。因此,当这部分内容涉及纠纷时,可根据当事人的具体行为以及内容生成场景

进一步判定其隐私期待和信息的私密程度。例如,社交媒体中的聊天记录所处场景可分为两类:群组聊天场景和私人聊天场景。群组聊天场景中的聊天记录在发布之时,表明当事人已经消除了部分隐私期待,主动将内容袒露于较为公众的场合中,这部分信息或将不再适用于隐私信息的判定。私人聊天场景为点对点式的直接交流,这些聊天内容大多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亦存在较强的隐私期待,对于这类“私人场所”中的聊天记录,应适用隐私信息的保护体系,明确信息接收者的保密义务,除非有实质性的知情同意,否则应严格控制其二次传播。根据具体聊天记录的内容明确侵权类型、界定侵权行为,使司法救济更为严谨,避免因“少判”导致当事人权益受损、因“过判”致使责任人负担过重。

结 语

社交媒体时代,截屏社交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已然成为人们拉近社交距离、打入其他圈层的重要方式,但其所蕴含的隐私风险却并没有得到对等的重视。截屏权力的下放与滥用,从微观层面来看,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崩塌;从宏观层面来看,则会带来新的对于“监视”的恐慌。

本研究立足于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提出聊天记录再传播中隐私边界管理的重塑方法。个体需时刻保持边界敏感,再塑信息共享契约;平台应提供技术支持,强化用户信息自决权,加强审核把关并简化维权流程;法律应破除适用障碍,从法理和司法实践两方面维护隐私权益。在将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期待个人在“不得不”走进截屏社交时代的同时,亦能守住自己的隐私底线。

参考文献:

- [1] PETRONIO S. Boundaries of privacy: Dialectics of disclosure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 [2] CHILD J T, PEARSON J C, PETRONIO S. Blogging, communication, and privacy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f the blogging privacy management measure [J].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60(10): 2079-2094.
- [3] LITT E. Understanding social network site users' privacy tool use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4): 1649-1656.

- [4] CHILD J T, WESTERMANN D A. Let's be facebook friends: Exploring parental facebook friend requests from a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CPM)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013, 13(1): 46-59.
- [5] 王波伟, 李秋华. 大数据时代微信朋友圈的隐私边界及管理规制: 基于传播隐私管理的理论视角[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6, 39(11).
- [6] 刘百灵, 董景丽. 基于CPM理论的移动商务用户信息披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2, 12(1): 56-66.
- [7] 唐杰, 张彬. 基于沟通隐私管理理论的移动App用户个人信息授权意愿研究[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6): 1-12.
- [8] 曾秀芹, 吴海溢, 蒋莉. 成人初期人群的数字媒介家庭沟通与隐私管理: 一个扎根理论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18, 40(9): 64-84.
- [9] 申琦. 重“私有领域”轻“个人信息”: 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司法困境[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2): 73-76.
- [10] 潘星容, 黄紫妍. 论大数据背景下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 *行政与法*, 2020(8): 92-102.
- [11] 何金海. 网络时代聊天记录跨场景传播的法律治理[J].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21(4).
- [12] 李欢, 徐偲骥. 隔“屏”有耳? 聊天记录“二次传播”的控制权边界研究[J]. *新闻记者*, 2020(9).
- [13] 张爱军, 朱欢. “截屏”社交的权力异化: 逻辑、风险及其规制[J]. *新视野*, 2021(4): 109-114.
- [14] 胡沈明, 王若男. 聊天记录跨场景传播的意义异变与影响探究[J].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21(1): 5-8.
- [15] PETRONIO S, CHILD J T.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Utility of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20, 31: 76-82.
- [16] TSAY-VOGELI M, SHANAHAN J, SIGNORIELLI N. Social media cultivating perceptions of privacy: A 5-year analysis of privacy attitudes and self-disclosure behaviors among Facebook users[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 141-161.
- [17] 俞立根, 顾理平. 当公私边界趋于消融: 时间维度中的隐私困境与界限管理[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10): 71-78.
- [18] PETRONIO S. Road to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Narrative in progress, please stand by[J].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004, 4(3): 193-207.
- [19] 贺栩栩. 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J]. *比较法研究*, 2013(2): 61-76.
- [20] 郭灿. 博弈与平衡: 论“红旗原则”和“避风港原则”[J]. *法制博览*, 2013(6): 110-111.
- [21] 周汉华. 平行还是交叉: 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的关系[J]. *中外法学*, 2021, 33(5): 1167-1187.

The "Hedgehog Dilemma" of Screenshot Social Networking —The Migration and Reshaping of Privacy Boundaries in the Secondary Dissemination of Chat Records

Dai Yingjie, Pan Ruxu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creenshot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to screen chat content and forward it to others in order to narrow the social distance. Screenshot communication will break the privacy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chat, and make the original private chat records face privacy risks. In this regard, individuals need to keep the boundary sensitivity and reshape the boundary contract. The platform need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strengthen users'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information, strengthen auditing and simplify channels for safeguarding rights. The law should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to application, and work together from the legal level and the practical level to ensure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in screen capture social interaction.

Keywords: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screenshot communication; privacy boundary; right to privacy

台州学院·广文书院

书院简介



广文讲坛专题讲座



《临海剪纸》教学实践

广文书院积极构建“学院+书院”双院联动、师生共同体的育人机制。每一个加盟书院的学生都具有双重身份，学生专业学习和日常教育管理以学院为主，书院侧重于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综合素质提升、个人兴趣培养等方面。书院以“一坊二区三室”（素质能力提升工作坊，学习交流区、图书阅览区，谈心谈话室、师生研讨室、多功能活动室）为空间布局，配备相应的办公、学习、活动设施及硬件设备，营造“温馨、平安、共享”的育人环境，为师生开展课程教学、交流研讨、文化活动等提供场地保障。

书院现有校内导师73名，校外导师7名，学生326名。办院三年来，书院已有两期结业学员157人；书院学生在各类各级比赛活动中获市级以上奖项730项，其中省部级和国家级奖项120项。正所谓：养吾浩气正学读书存种子，育此英才广文开馆有传人。



广文书院第一期学生结业典礼

中国·台州

TAIZHOU CHINA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李钧敏

Editor-in-chief Li Junmi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Postcode 317000

网址

The URL www.journal.tzc.edu.cn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 (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E-mail xbb@tzc.edu.cn

电话

Tel. 0576-85137169

双月刊

1979年创刊

第46卷 第1期

(总第243期) 2024年2月20日出版

Bimonthly Started in 1979

(Issue No. 243) Vol. 46 No. 1 Feb. 2024

封面题字: 沙孟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定价: 12.00元



ISSN 1672-3708



9 771672 370241